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邓小平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序

几年以前，我们在完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书稿的基础上，有人提议是否还可以设计一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新阶段”的研究课题。课题组的同志就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大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海内外学术界议论的热点，但却很少有人涉及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无疑是个难题，但也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在大家形成了共识以后，几位年轻的学者着手设计课题，并抓紧研究和写作。现在，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终于问世了，这当然是值得庆贺的。

相比而言，邓小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涉及和研究，不及毛泽东那样广泛和深入，但诚如这项研究成果所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厚的土壤之中，其思维反映了中华民族深邃的智慧。”“它是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诸如，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已被融化在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伟大事业之中；追求美好理想的传统，已被落实在“三步走”的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之中；民为邦本的传统，已生动地体现在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各项方针政策之中；以和为贵的传统，已被贯穿在民族和睦、“和平统一”、“和平共处”等对内对外的国策之中；实事求是的传统，已被容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中；辩证思维的传统，已被运用于“两手抓”、“求同存异”等指导方针和策略思想之中；义利统一的传统，已被吸收在既注重物质利益原则又提倡奉献精神的政策措施之中；独立人格的传统，已被提升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的气节与国格之中；注重德育的传统，已被制定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四有”新人的目标之中；自强不息的传统，已被集中反映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的精神之中。所有这些都说明，博大精深、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当然也是对世界文明成果的消化和吸取。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使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开放精神。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理论形态的体现。

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上，邓小平没有固执的偏见，不仅能够弘扬其优秀的成分，而且能够清醒地批判其消极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邓小平青年时代留学法国，以后又能关注世界大势，对中西方文明有所了解和比较；而更重要的方面，是邓小平对建国以来，我党在指导思想曾经存在的“左”倾错误有深切的体验和理性的思考，而且亲自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彻底纠正了这种错误。邓小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的批判，也表现在诸多方面：一是批判了它的封建专制性。邓小平强调要分清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肃清个人崇拜、家长作风、官僚主义、宗法观念、等级特权等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而且要改革旧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二是批判了它的封闭性。邓小平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

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从而，为我们的国家制定了一整套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三是批判了它的保守性。邓小平指出，我们祖先四大发明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别国的长处。他多次批评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保守心理，肯定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改革也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由此可见，邓小平批判封建专制性，是为了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批判封闭性，是为了实现对内对外的开放方针；批判保守性，是为了推进改革，加快发展，赶超先进。这就有效地避免和克服了长期封建社会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如果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当然也就谈不上科学地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建设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问题。

一个巨大而复杂的课题，当然不能苛求一举成功。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项研究成果，应当肯定它的开创意义，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尝试。希望课题组的年轻朋友们继续深化自己的研究，也相信学术界一定会有更多出色的成果问世。

王凤贤
1994年11月
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绪 论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的思想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深深烙印。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的时代，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最基卒的原理，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重大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一方面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又使传统的民族思维得到更新。思想文化的发展与改革的伟大实践交相并进，迈开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步伐。

1. 深厚的文化孕育着博大精深的理论

在 1991 年至 1993 年初，本书的部分作者刚刚参与完成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结晶；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是因为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变化要求中国传统的文化相应地发生变革；传统文化在近代的演变和发展，具体表现为汉宋学之争、今古文经学之争以及五四以后的中西学之争；传统文化内在的矛盾运动使得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准备了文化基础。也就是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文比所接纳，并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所以，从文化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有机整合。毛泽东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它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还要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就历史而言，“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正如刘少奇所说，毛泽东思想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其意义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有助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意义。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使中国传统哲学中长于宏观把握、注重主体实践、实事求是和发达的辩证思维等方面得到发展，并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使得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具有了科学意义。其二，亦有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面。毛泽东关于《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思想，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设想等等，都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的特点，正是在这些方面丰富和发

该课题已以著作形式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1·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34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以下该书引文均出自该版本）。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35 页。· 2·

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当然，还应该提到，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缺陷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中国的革命问题，建国以后，他们为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也遭受过重大的挫折。“文化大革命”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果断地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进程，经过艰苦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初步建构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出版，在我国理论界是一件大事。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本集子是邓小平理论成熟时期的结晶。如果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则更为震撼人心，中国社会正在向现代化迈进，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意义深远。

与毛泽东思想一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里的实践，主要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一方面，邓小平孜孜不倦地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另一方面，当他初步建构起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时，该理论本身就具有了中国的文化特色。

江泽民于1993年11月2日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灿烂光辉。”研究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其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也可以说是更深的层次去理解、去把握邓小平理论，并感受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思维、观念得到更新、向前发展的勃勃活力。

2. 文化传统是民族精神的绵延

“文化”可以泛指人类的生活。在西方，“文化”一词的拉丁文同源“*cnitua*”原义是耕耘，它表明“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与自然物相区别。中国古代汉字中的“文化”，意思则要狭窄得多。“文”有装饰花纹之意，与“文雅”、“文字”等相联系；“化”则使人回首向善。所以，“文化”一词的主要内涵是“文治和教化”。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也主要着眼于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精神领域等观念形态，与社会政治、经济相区别。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文化的形成，不是静态的，而是在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相互运动中不断发展的。所以，所谓文化，必然包含着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的意义，而这种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蕴涵着生命的活力。所谓传统文化，“传统”二字，首先表达的就是历史性、或者说薪尽火传的状态。因此，传统文化，指的是某一民族通过漫长积累而不断发展着的观念形态，它具有历史性，它要在历史的时间之流中才能产生、形成，所以它是发展的。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谈的传统文化，并不单单是指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它还包括西学传入并和中国原有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文

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进步文化等内容。所以，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样也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传统文化还具有实践性。一般所说的传统文化，不仅仅存在于书本或讲坛之上，而是生存于多数人的具体生活之中。某种思想、观念，如果成为传统，必定在文化的价值方面，对社会实践发生了影响，所以它又是生动的。通常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一般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见之于典籍的所谓“精英文化”，一是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所谓“俗文化”。以往的许多文化研究，往往偏重于文化经典，而忽视对民众文化的考察分析，这正反映了这些研究者不重视文化的实践性，从而其研究充其量也只是书斋里的学问。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仅重视见诸于典籍文字中的传统文化，而且也十分重视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感情愿望、思想观念。邓小平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他著述不多，言简意赅，思想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思维特征和气质。他特别注意倾听广大群众的呼声，重视群众在实践中的首创精神。

文化传统是民族精神的绵延。离开传统谈文化的发展，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等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当时运动的思想领袖们，把传统文化与“近世文明”直接对立起来，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强烈的虚无主义态度，以及脱离广大民众的作法，极大地影响了这场文化运动的深入。这一点在现在已被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所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在清末处于低潮，在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来，传统文化只是附属于腐朽的政治制度之下的纲常伦理，而其中在中国历史上曾充满生命力的内容在他们眼里被忽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化的更新，这是不错的，但是，文化的更新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不在躯壳而在生命；因此，这场文化运动发生的原因可以是外烁的，它最终的成就却必须是内在的。离开传统谈文化的发展，不是站在完成自己文化的内在发展上接受西方文化，不了解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从而割断了历史，这样西方的先进思想也只能停留在抽象的名词、空洞的口号上。而且，由于西方的先进思想不具有中国民族的形式和气派，所以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只是局限于少数精英分子之中。这显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局限。

有的海外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反传统主义思潮是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的重要原因，这种观点是站不住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周恩来等，不仅早年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且在五四前后与胡适、陈独秀等激烈地反传统的文化观有明显的区别。李大钊说：“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毛泽东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瞿秋白强调：不能“汨没民族的个性，戕贼他的个我，去附庸所谓‘新派’。”他们正是站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点上，以开放的态度吸收西方的新文化，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0页。

毛泽东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信。

瞿秋白：《赤都心史》二九《家书》。·6·

毛泽东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对待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主张全盘西化的错误，他说：“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强调不能割断历史，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优秀文化遗产，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氣派。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推动着传统文化的发展，并成为中华民族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文化看成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其精神就表现为中西文化有生命的真实融台、并为整个民族所掌握、贯穿于人民大众的实践之中。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阶段的表现形态。

3. 传统文化面临新挑战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已经有了 5000 年的历史演进，传统悠久一线而下，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从先秦古籍的炎黄传说到诸子学说的兴起，以后历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近代新学等等阶段，构成了环环相扣、生生不息、不断丰富思想文化宝库。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来有儒、道、释等学说交相并进。在儒学内部，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孔子不同于孟子，孟子不同于荀子，先秦儒不同于宋明儒，宋明儒之间又有程朱与陆王的分别。正是这种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之间的相互桔抗与渗透，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充满生机的矛盾运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点。虽然众多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描述、分析和概括，仍然不可能完全揭示其内容、特点及其精蕴。但是，从一定的角度去描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对于我们的研究是需要的，而这种描述又往往需要同西方的文化相比较。这里我们参考众多学者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试作四个方面的描述。

其一，中国传统的 worldview。西方由于超越经验的宗教背景（如基督教或希腊教）及思辩的形而上学（如柏拉图或阿奎那）都以绝对的意义来分别人与自然。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把人提高到自然之上以控制自然，控制自然的结果导致了科学的发展。当科学发展到令人起敬的状态时，人文主义的价值又受到忽视，所以现代存在主义为强调人的绝对主体性，便滋长了反对科学的情绪。与西方外在的人文主义不同，在中国哲学中，自然被认定内在于人的存在，而人被认定内在于自然的存在。人是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人可以实现在自然中的价值和使自己成为完人。

其二，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在西方，主观与客观相互而别，强调人的抽象和演绎的理解能力，这种抽象的理性能力与经验基本上是分离的。中国的理性主义是从具体的意义来建立理性精神，主客体之间没有原始的划分，“理”直接与人生有关的基本生活经验及其他人和事物相联系。中国哲学不把哲学自身当作一种演绎的理性活动，而是影响和指导人的活动之一综合的道德成就。

其三，中国传统的方法论。由于中国哲学中并不存在着人与神和自然与超自然的二分法，所以它认为实在的每一形式都是一种变的历程和由自然发展的。自然是一种不断活动的历程，各部分成为一种有生机的形式，彼此动态地关连在一起。《易经》充分地揭示了阴与阳的相互变动的概念和道在时间历程中的表现。

其四，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儒家和道家都特别重视道德伦理的修养，儒家的《大学》与《中庸》形成了自我修养的八重步骤，并以世界和谐为其终极目的。此种自我修养和自我实现的主要内容便是“推己及人”和“内圣外王”。中国哲学认为人能止于至善而无须超越他自己所处的世界，从而自我修养就代替了西方宗教的膜拜和至高的神。

上述描述，从一定角度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伦理社会观上的一些特点。“中国传统世界观”，建立在对宇宙“天人合一”的认识的基础之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形成了中华民族“参天地赞化育”，乐天努进，溶小我于大我，以天下为己任，追求“天下为公”的终极关怀的人生信念。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构成了中华民族强调学问见诸躬行，重视身心体履，把世界看成一个阴阳互动、发展和联系的总体的思维特点。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形成了中华民族特别重视个体的伦理修养，推崇道德说教，把它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手段的基本思路。

上述特点自然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强调“天人合一”，塑造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重视道德伦理的修养和礼治，促使了社会与民族的高度和谐；注重实践和发达的变易辩证的思维，不仅在社会伦理上，而且在自然科学方面都曾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并具有灿烂的文学艺术的结晶。在今天，中华民族的思想与智慧，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受汉文化深厚影响的东亚社会的发展令人惊奇，华裔学者在欧美社会的成就也令人瞩目。随着西方社会现代化的高度发展，人们日益感到逻辑与科学不能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也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予以更多的关注。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而且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近代的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人的主体实践、发达的辩证观念和崇尚平等的伦理思想等内容，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充实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多有吻合之处。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等机械唯物主义哲学不同，从人类实践这一个唯物主义根本观点来批判黑格尔头脚倒置的绝对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不同于霍布斯、卢梭讲的自然人，他是有思想的、凭激情行事的。只有通过人们的实践、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类社会内在规律的发展才有可能。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对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关系的执著兴趣，李汉俊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主张物质与精神一体的想法，都表明了他们对人的主观能动精神的重视。

其二，马克思主义既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又摒弃了费尔巴哈的孤立、静止、琐碎的哲学体系，重新肯定并发展了从康德到黑格尔所建立的庞大的辩证发展的历史体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重视和宣传唯物史观，无一例外，正是因为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随着中国革命的兴起，瞿秋白等大力宣传辩证法，表明了应用马克思主义的

需要。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撕下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反映在哲学思想上，就是强调功利、以个人主义为本位。康德哲学对这种哲学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人是目的”的命题，具有极强的伦理性。马克思主义既冷静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又热烈追求高度发达的平等社会，也带有伦理色彩。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给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鼓舞。李大钊把阶级与互助并提、断言一切社会主义都是伦理的，甚至要用伦理去补充马克思主义；李达把社会主义的目的，简捷地概括为经济上的平均和人类的真正平等，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影响力。

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创，固然离不开原先的文化基础，但是，它必然又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自我反省与广泛深刻的自我变革。因为，已经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社会长期封建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所以，这种文化在总体上与以一家一户为社会细胞的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与高度集权的社会政治结构相适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伦理、旧道德的猛烈抨击，就是因为这些内容与“近世文明绝不相容”，“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瞿秋白在强调文化的民族个性的同时，也提出要反对“盲目固执一民族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适应，自疲其个性，为陈死的旧时代而牺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离不开对传统的批判。延安时期，毛泽东一方面提倡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清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缺陷的任务。1940年9月，毛泽东在致范文澜的信中，称赞了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的尝试，并主张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以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进行批评。毛泽东在谈到孔子时，提出要否定孔子的“观念论”体系，一再强调要坚持唯物主义，并批判了孔子为正封建秩序之名的目的。清理旧的传统糟粕和弥补其中的缺陷，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必要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性反思，肇端于近代中国空前深刻的社会大变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并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整合，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使中国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为现代科学思维准备的土壤不足，因而自然影响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所引起的思想变革的深度。而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所面临的是紧迫的政治问题，全部的理论研究和创造都是围绕着革命和战争这个主题进行的，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为核心的更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实践还有待于展开，这样，他们没有时间深入进行经济理论的研究，瞿秋白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时说“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更没有精力去学习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概括这方面的成果，因而马克思主义传入所引起的中国思想变革的广度受到了局限。

建国以后，中国开始了全面的经济建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毛泽东总结集体智慧所

陈独秀答吴虞，《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

《赤都心史》二九《家书》。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3页。·11·

瞿秋白：《多余的话》。·12·

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反映了这场探索的最高理论成果，在经济发展道路和社会矛盾学说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国家学说。但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认识上的偏差日渐严重，酿成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挫折和浩劫。毛泽东试图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上层建筑的“革命”来推动经济建设，最后形成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而从上述思想理论所折射的文化观念看，则带有明显的小农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某些特点。例如，以平均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一大二公”的乌托邦理想模式；政治伦理化，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根据；倡导个人崇拜，追求君师合一的圣人人格等等。把毛泽东晚年错误与产生这一错误的社会土壤作综合考察，可以发现，中国文化要摆脱旧的时代阴影，仍需要艰苦的努力。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就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现代化”这个概念，自本世纪50年代以后在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十分流行，它被用来概括人类近期发展过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的动态，众多的学者为它下了各种定义。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看法，可以认为，现代化所指的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以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为主要标志，涉及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组织和结构等方面的变化，是一场全面的社会改革。

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现代化虽然起源于西方，但这一提法不能揭示社会变革过程的实质，不符合现代化多样性的丰富现实。由于各国的传统体系相互有别，文化背景各异，各国的现代化必然带来各自的个性和特色；后来者借鉴的现代化模式来自西方，但其面临的问题和要完成的任务却在内部。所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必然带来并要求中国文化进行更深刻的变革。

要使中国文化得到创新，以适应当前以新技术革命力特征的现代化潮流的要求，还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精神，以极大的勇气，发展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不再停留在100多年前的水平上。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经过十余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他以独特的魄力和胆略，紧紧抓住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人民群众的经验，逐渐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找到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也使得中国的民族思维走向了现代。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所指出的：“改革和开放，也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九年之所以不平凡，之所以举世瞩目，就是因为许多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新思想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16年了，中国人民在这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思想文化观念所发生的变化，其深度和广度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4. 邓小平的文化观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生于四川广安。原名先圣、学名希贤，后自改名小平。长辈所起的名字，寄托着长辈的期望，要邓小平广读圣贤之书而成为圣贤之人。1909年初春，邓小平不满5岁，就进私塾发蒙，学的自然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等。以后上了初小，也只读了“四书”、“五经”一类的书。1915年，11岁的邓小平考入广安县高小，国文课除了孔孟的“经书”以外，还教授一些《古文观止》上的文章，有柳宗元的，有韩愈的。邓小平在塾师的影响之下，对写字很有兴趣，这使他的书法有了良好的基础，直到晚年他的字依然刚劲有力。

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些志士仁人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在“维新思想”和“洋务运动”的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感到要救国，就必须学习西方。毛泽东曾经说过：“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更是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向传统封建礼教展开剧烈地攻击，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把邓小平接到了重庆，送他走上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道路。65年后，邓小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感到中国衰弱，希望它强大起来；我们认为现代化是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到西方去求学。

早年的毛泽东深受儒学影响，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以后又说：“东方文明要占个半壁的地位”。毛泽东当时已有20年岁，对国学已有相当的造诣。早年的毛泽东对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也怀有积极的热忱，主张“外观世界之潮流，内审自身之缺陷，勉负职责，振起朝气”，在他的积极组织 and 推动之下，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当时全国开展得最好的省份之一。但是毛泽东本人却没有出国。他觉得“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邓小平幼年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国学的造诣虽不及毛泽东深厚，但其一生也是一个“史学兴趣极浓厚的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西的日子里，他除了大量阅读马、列著作外，还读了“二十四史”等中国文化典籍。邓小平尤其善于吸取劳动人民的传统智慧，其著名的“猫论”：“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一句四川俗语。这句四川俗语原出自刘伯承之口，他善于用四川俗语幽默诙谐地说明问题。刘伯承是一位大军事家，“他熟谙兵法，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精华，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

在繁忙的军旅生涯中，他是“勤读不厌的模范”，1951年他捐给西南人民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页。

《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1920年7月。

毛泽东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8页。

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15·

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7页。

同上第186页。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页。

图书馆（现重庆市图书馆）的图书就有 4000 余册，其中有 1171 册线装书，包括“二十四史”、《黄帝内经》、《易经恒解》等。邓小平还指出：“他不但重视理论的研究，尤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他常常指导同志向下层群众去学习，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邓小平与刘伯承自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共事 13 年，相知甚深，以至刘邓不分。从刘伯承、以及邓小平对刘伯承的评价上，可以看出邓小平对于传统文化以及群众智慧的重视。

当然，邓小平的生活经历与毛泽东有很大的区别。自 1920 年 8 月至 1926 年 1 月，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的工厂劳动，了解现代大工业的成就和缺陷，并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的组织。早年经历的不同，也许使得邓小平对于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比毛泽东有更深刻的感受。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与毛泽东又是心曲相通的，他对毛泽东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都颇为欣赏。1952 年，他曾说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1951 年 1 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通篇谈辩证法问题，最后特别提到：“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这年年底，毛泽东在莫斯科评价邓小平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既懂经济，政治思想又强。1972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所作的批示，对邓小平作了简要的评价，其中提到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解放战争时期协助刘伯承打仗，有战功；进城以后，做过好事。由于历史的因缘，毛泽东与邓小平走到了一起，并成为思想、理论上的同道。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邓小平的文化观同样也是毛泽东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邓小平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

邓小平在这里讲的是文艺方针，也反映了邓小平对于中外文化的基本态度。这是我们继承古今中外文化成果的立足点和根本目的。我们继承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不是颂古非今、崇洋媚外，不是把官当作古玩，供人欣赏；而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助于解决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邓小平进而提出了“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的八字原则和要求。通过钻研，把握中外文化的精神与实质；吸收其精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整合，使之成为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改革和创新，使传统文化得到发展，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指出：邓小平的信念，“就是要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集中古今中外一切所长，闯出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

《中国元帅刘伯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41 页。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32 页。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8 页。· 16 ·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10 页。

同上，第 212 页。

同上。

邓小平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他强调要“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他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版《邓小平文集》中所写的序言中写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在致中共中央要求退休的信中说：“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自尊心和自信心，来源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的自尊和自信。如前所述，邓小平是一个史学兴趣极浓厚的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愤怒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毁灭中国的文化机关、焚毁中国的民族典籍等罪行。邓小平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十分重视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邓小平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仅一般地强调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且也包含了独立自主、发挥中华民族的创造性思维的意义。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思维特色。例如他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学风，爱国主义的精神、艰苦朴素、艰苦创业和为政清廉的道德，等等。当国际局势发生突变时，他告诫人们要“冷静观察，韬光养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

邓小平十分强调分清“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鉴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曾出现严重的挫折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历史教训，邓小平特别强调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重要意义。1980年8月18日，他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邓小平还具体列举了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点、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邓小平认为，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改革旧体制，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就必须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这是解放思想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十分重视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他说：“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古代，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伟大作用。但是我们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他认为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3页。

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5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0页。

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对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979年2月，邓小平亲率代表团访问美国，在短短的8天里，他除了在华盛顿同卡特等进行会谈以外，还访问了著名的工业城市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休斯敦国家宇航中心、波音飞机公司和休斯敦工具公司，并同得克萨斯的石油大亨们共进晚餐。哈默博士回忆说，邓小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在利用一切机会了解各国发展经济的经验，以便利用这些经验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邓小平还虚心倾听国外来访的政界、企业界和专家学者等各界人士的建议，特别重视国外的经验。如设立经济特区的做法，已被很多资本主义国家证明是发展经济的有效方法，因此他积极主张设立特区。他认为应该引进外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引进外资，我们为什么不能引进？不仅要引进外资，他还主张利用外国智力。关于启用年轻干部的问题上，邓小平也提到：“这一点，也要学发达国家。有些第三世界国家也解决得比较好。最近我听人讲，好多国家大部分部长是三十几岁。也有岁数大一些的，但比较少。总理岁数可能比较大，一般也是五十多岁。”我们阅读邓小平文选，会感受到他接受新事物新经验的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

邓小平主张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如上所述，他首先提出“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他还特别强调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1984年他在谈到经济特区时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讲话中更明确地指出：“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市场经济理论正是这种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还主张学习国外先进的行政管理经验。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要观点，他认为像斯大林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认为“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所以，1986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应当借鉴和学习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除了适应于现代化社会生产的先进经济管理经验以外，还有具有

同上，第91页。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2页。

同上，第51—52页。

同上，第373页。·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同上。

同上，第336页。

普遍适用性的先进行政管理经验。此外，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借鉴和学习外国的一切进步的 and 优秀的东西，这也是邓小平的一贯观点。所以，对外开放，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建设领域，同时也表现在思想文化的层面。

邓小平反对“全盘西化”。如前所述，邓小平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向西方学习，决不意味着“全盘西化”。他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他强调，在文化交流范围，要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鉴别、批判，吸取有益的文化和知识，抵制腐朽性影响，他批评了一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的倾向。他主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他看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坚定“四项基本原则”，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

邓小平的文化观是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正确文化观的坚持和发展，并提出了“钻研”、“吸收”、“融会”和“发展”的八字原则和要求。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髓，强调走自己的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同时，鉴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出于对国际形势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宏观把握，邓小平特别强调批判封建主义残余和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经验。正是这样的文化观，对邓小平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起了积极的作用，邓小平的理论以及实践又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民族思维的现代化。1985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确实如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页。·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同上，第235页。·22·

邓小平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第一章 实事求是与传统知行观

实事求是，原是中国古代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其内容不断丰富。毛泽东将这一方法予以总结，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它上升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邓小平正是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精髓、并予以发展，从而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事求是，同样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1. “两个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经过艰苦的努力，探索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条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在照搬共产国际、苏联的指示和经验遭到挫折的情况下，从中国实际出发开辟出来的。由于中国革命没有现成的经验，更由于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共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条道路的探索就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早在1929年，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就把了解实际，克服主观主义作为红军党组织的重要任务。1930年5月，他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观点，指出抱住“本本”一成不变，“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而调查研究才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937年7、8月间，他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深刻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奠定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基础。40年代初，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表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集中批判了教条主义，全面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从而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为全党所理解和拥护，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邓小平说：“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¹

建国以后，尤其在50年代后期，毛泽东倡导破除迷信、实事求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文，提出了很好的见解。但是，随之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之后，在“大跃进”运动中，由于急于求成，急于改变生产关系，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造成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挫折；这时，毛泽东又把注意九转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在60年代初，他把阶级斗争问题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斗争，以后发展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酿成了中国社会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文选》的第2卷和第3卷，都反复地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邓小平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

¹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

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走的。”他屡屡提及，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他特别强调：“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说，当我们讨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研究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不能不重视它们的历史背景。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一方面，广大人民欢欣鼓舞，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来；另一方面，“左”倾思想、个人崇拜仍弥漫着中国大地。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所谓“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从而造成了党和政府工作步履艰难、形成了两年的徘徊局面。正像二三十年代一样，不破除教条主义的倾向，中国革命的道路无从谈起；不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迷误中走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将受到更严重的挫折。因此，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怎样理解和评价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决定我们能否走出危机、开创新局面的关键。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都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在1960年，邓小平就提出了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他曾和罗荣桓一起同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进行了斗争。1975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复出、主持全面整顿之际，针对“四人帮”搞个人崇拜，郑重地提出：“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怎样能够抓住一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所以，当“两个凡是”出笼以后，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在致中央的信中提出了“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24日，他在与中央两位同志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正是经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等同志的努力，经过实践标准的大讨论，到1978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2年，邓小平在同金日成的一次谈话中回顾了这段历史，他说：“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4页。

同上，第237页。

同上，第172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43页。

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39页。

同上，第36—37页。

同上，第39页。

见同上，第38页。

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做‘两个凡是’。我说过，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话。以后我从你们那里访问回来，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这个思想路线问题。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2.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如上所述，邓小平在“文革”以前、“文革”之中和“文革”不久，一再强调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首先是不能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割裂，其二是反对只抓住毛泽东的片言只语。这是对林彪、“四人帮”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绝对化的重要批判。自然，这一批判的着眼点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还不可能直接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提出批评。但是，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联系、以及对毛泽东片言只语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内在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性和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区别问题。

到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中最根本的东西；8月在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谈到学风问题时，认为“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9月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随后，邓小平多次阐述，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观点的提出，为完整、准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把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把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正确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当时的现实是，一方面要正视“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一方面又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只有正视“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我们才能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走出来；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才能够肯定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基本的立足点。邓小平指出：“毛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0页。

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5页；

同上，第57页。

同上，第67页；

见上书第114页、126页。

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1981年，在邓小平领导和主持下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出现是因为他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所以其晚年错误“阴显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历史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批评“两个凡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基本完成。

邓小平论述实事求是，特别强调解放思想。1978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有两次集中论述解放思想。自然，第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打破“两个凡是”，从认识上拨乱反正，邓小平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所以邓小平把解放思想提到了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的高度，从而使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第二次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了解决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澄清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促使我国的经济改革模式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强调解放思想，突出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唯物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批判的，实事求是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更何况我们改革开放的事业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所以更要求大胆地探索，以新的思想开拓新的局面。所以，所谓解放思想，一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包括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迷雾中走出来；二是指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因此要勇于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总是强调：思想要更解放一些、胆子要更大一些，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敢闯敢冒，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

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首要特征。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过多次概括，例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同上，第347页。

同上，第294—295页。

同上，第298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

同上，第143页。

同上，第27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0页。

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同上，第242页。

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等。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到，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解放思想首先是实事求是的前提。邓小平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所以，他在以后的回顾中说：“我们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然后深刻地检讨了我们的历史，提出解放思想，恢复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任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解放思想在恢复了实事求是这条路线之后就可以束之高阁了。实事求是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解放思想又是实事求是的首要特征。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指明了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首要特征，所以实事求是内在地要求解放思想。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对实事求是的具体说明；而后两者又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具体说明，所以邓小平时常将实事求是与一切从实际出发联用，而省略其后的内容。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基础，自然也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它与一切从本本出发正相反，强调的是实际和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在多方面丰富着这一思想的内涵。其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独立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前所未有的事，一方面我们必须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同时大胆地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

其二，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是实践第一，真抓实干。在改革初期，邓小平曾说过我们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的探索中前进，以后他又说，“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重要的是过一段时间就要总结经验，有错误赶快改。邓小平还特别反对进行抽象的理论争论，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其三，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经验。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

同上，第 114 页。

《邓小平立选》第 3 卷，第 118 页。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1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54 页。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64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60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3 页。

同上，第 374 页。

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而不能用本本、用框框去主观地规范群众的言行。邓小平多次提到，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其四，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我们工作是否得失的标准。实践是检验人的主观认识（知）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唯一标准，生产力尺度是检验人的实践活动（行）是否能符合人的主体需要（通常所说的价值论）的标准。生产力标准是建立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这一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它反对一切主观的教条。1962年，邓小平说“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以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发展生产力为尺度来灵活地决定生产关系的形式，而不固守某种形式。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又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从而使我们大胆地迈开脚步，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建设。

邓小平反复地说，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他一再说明，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自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由上可见，邓小平不仅坚持了实事求是，而且还从多方面丰富了实事求是，使得这条思想路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带有邓小平独特的个性特点。正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邓小平开创性地提出并在多方面展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十四大报告认为：“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3. 对传统知行观的发展

邓小平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实事求是，原出《汉书·景十三王传》，其中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特点是从儒学经义的字义入手，进行训诂、考据，以恢复经义的本来面目。它反对的是西汉今文经学派，用六经的微言大义牵强地附会现实政治的做法。因为它所依据的是所谓先秦时期的古文，所以又称古文经学派。但是，其精神不是致用，只是求实。以绝对的态度求实，又会忽

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

视对义理的追寻，放弃对历史现象的总体把握，会导向小枝末节的雕琢。

宋代理学将说经与明道结合起来。从“汉学”的烦琐考证，到理学强调明道，开始带有普遍的抽象的含义。但是，理学的明道也不在致用，是专注于“心性”、“理气”的“内圣”之学，同时明道仍依赖于对经文的注疏。

当时主张事功的永嘉学派批评理学，叶适认为，圣贤相传之道不在心性，而是慎观天道以措置天下之民，是“措物以成治”；道不能离开器，“物之所在，道则在焉”（《习学纪言》），即是说“道”是在致用中体现的。

陆王心学从另一个角度对程朱理学提出批评。他们反对朱熹于心外求理，更反对守书本、泥语言。王阳明说：“道无方体，不可执着。却拘滞于文义上求道，远矣。”（《传习录》下）他提出良知为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他主张简易工夫，强调着实就身心上体履，创“知行合一”之说。

明末清初，学者强烈否定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空疏之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都十分强调经世致用，颜元、李恕谷更是反对读书、注书，强调实用、实践。但是，由于政治等原因，乾嘉之际，一批治学者以“汉学”或“朴学”自诩，标榜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埋有故纸堆，进行文字的烦琐考证，失去经世之义，是谓“乾嘉学派”。有鉴于此，鸦片战争以后，龚自珍、魏源以今文经学为旗帜，再度强调经世致用。康有力更是以今文经学为根据，通过对微言大义的解释，提出社会改良的纲领。

曾国藩调和汉宋之学，对乾嘉学派提出批评，对实事求是作出新的解释。他说：“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书学案小识后》）这样，实事求是的意义，就从文字考据的单纯求实，扩展为重视“义理”的求是。曾国藩还特别强调“经济”（经邦济国之谓），当然，他“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在当时和后世影响甚大。

五四前后，西方新思潮大量涌入，提倡“科学”。以实验主义为代表，西方工具理性的方法论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认为，儒学的经义或时兴的“主义”都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是因具体的时事而起的，这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有重要意义；它强调实验和实践，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从而，“科学”成为时代的强音。但是，实验主义在方法论上有着致命的弱点，缺乏辩证法的精神。瞿秋白曾嘲笑这种“不是那个，就是这个”的“‘西洋’笨逻辑”。毛泽东也指出了五四时期坏的一切皆坏、好的一切皆好的形式主义倾向。

治学方法以及治学与践履（即“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重要的内容，对中华民族思维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则使实事求是的民族思维，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

毛泽东早年深受儒学影响。尤推崇曾国藩，他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认为曾比康、梁更有本源。他在《体育之研究》中还推崇顾炎武、颜元和李恕谷，重视实践和实用。他的早期文章还带有阳明心学不拘泥书本、

《曾国藩伍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5页。

瞿秋白：《赤都心史》四五《新的现实》。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832页。

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

重视身心体履的痕迹。所以，毛泽东所接受的实事求是，决不是烦琐考据，而强调“义理”和“经世”。李锐谈到：早年毛泽东“不究心于雕虫小技、奇闻轶事，不劳神于烦琐的考据工夫，而是一贯地研究心、物、治、乱、圣贤、不肖、修身、治国等大道理”。这是有根据的。

毛泽东还受到五四“科学”思潮的影响，组织过“问题研究会”，主张“踏着社会人生的实际说话”。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囿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正是怀着对“义理”的兴趣、探求“大本大源”的热忱，使毛泽东具有接受唯物史观的可能。

执着于“汉学”的实事求是，反而会走向教条主义。因为它以对经义的注疏为目的，以烦琐考证为特点。胡适十分赞赏清代汉学的考证方法，认为符合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如前所述，实验主义与“汉学”一样有着烦琐支离之弊，只能“安于琐屑的应付”，不能“彻底的改造社会”。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可以结盟，甚至从实验主义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他在1922年5月所作的《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的演讲中用“自然科学的证实归纳法”来概括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强调马克思主义实用的方面，这失之偏颇。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公式套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理论与实践难以统一，从而走向取消主义。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的学习。1939年1月他在一封信中谈到：“我的工具不够，今年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延安整风开始后，他建议从政治局做起，“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建国以后，毛泽东更是多次强调哲学是一种方法，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意义，这与中国传统思维重视“知”、“行”关系和治学方法有关。

1937年间，毛泽东在抗大发表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矛盾论》是该提纲中最能体现毛泽东哲学特色的两个篇章。《实践论》从“知”、“行”关系入手，系统阐述了实践第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矛盾论》重点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两论奠定了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以后，毛泽东说，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

实事求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中国化的概括和表述。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应该“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

拙文，《毛泽东早年思想与阳明心学》对此有专门论述，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3卷。

李锐：《早年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

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7—178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6页。

见《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1期。

见毛泽东1960年3月在天津会议的讲话和1964年8月在北戴河关于哲学谈话。

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37·

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有的放矢”，强调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关于实事求是，毛泽东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显然，这与河间献王的本意已有很大差异。第一，实事求是不是局限于“本本”（经义），重要的是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现状和历史，以后又发展为“群众路线”的认识方法；第二，实事求是不仅求实，而且具有强烈的经世意义，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有的放矢”，以后毛泽东有时也把实事求是与“不尚空谈”联用；第三，“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是规律性，这决不是“汉学”的烦琐考证，在一定意义上更接近于“宋学”的“义理”，但这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客观真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求”就包含了辩证法的基本方法。陈云在延安曾反复考虑实事求是的含义，他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全面，比较，反复”15个字，正包含了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

所以，学习与研究毛泽东思想，应着重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陈云认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李达也指出，学习毛泽东思想，首先要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要有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然后进一步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即学习他的关于认识论的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李达对毛泽东1958年的“大跃进”等作法提出了真言不讳的批评，认为这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对于林彪的“顶峰论”更是认为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窍不通。可以说，李达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论，实际上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作了区分。

可见，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论述，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真谛。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之一的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有着深刻的理解。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十分欣赏邓小平。甚至在毛泽东晚年，毛、邓在基本政治路线上发生了重大分歧之后，毛泽东仍然感到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确实，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重视知行关系、注重实践、突出人的主体性的特色，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所以，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坚持，其核心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是我们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十几年过去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业已成熟，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的基本经验就是坚持了毛泽东提倡的实事求是原则。

见彭真：《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另外，毛泽东给《七大纪念册》的题词是“实事求是，力戒空谈”。

《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38页。

《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38—743页。

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6—147页。

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

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简而言之，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上看，晚年毛泽东日益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严重；从理论形态上看，晚年毛泽东的错误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论断。既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同时充分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地位和意义，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丰富。

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毛泽东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时。他还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例如关于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小生产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他执着地坚持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念，捍卫一大二公平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空想模式，以此来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显然，毛泽东囿于政治意识形态和伦理的判断，从而不能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这种思维特点，多少带有中国传统哲学如程朱理学特别重视政治伦理价值的某些痕迹。

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拘泥于“本本”，不固执于姓“资”姓“社”的抽象的意识形态争论，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和反对本本主义的意义。这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及中国传统知行观的重要完善。

还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即使在他的“左”倾错误日惭严重之际，仍多次强调实事求是。1961年，他还曾呼吁搞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但也未能从根本上纠正其“左”倾错误。所以，仅仅从思想方法论本身进行探讨又是不够的。毛泽东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强调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经验和主观能动作用，但是，在他的晚年，其认识论、方法论与唯物史观有所脱节，也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过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实用的缺陷。

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在社会实践中的意义。他说过，他最早就是从阶级斗争的理论中，“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认为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根据唯物史观，马恩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于当时阶级斗争的普遍存在，这一理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所以十分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给科学社会主义所下的定义就“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也就是阶级斗争学说。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更重要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原因。阶级斗争只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产生的社会现象。强调阶级斗争，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建国以后、尤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开始以后，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通过人们的政治热情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必然严重地扭曲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

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最终落实在生产目标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3页。

准的基点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唯物史观的新的体认和正确概括。由此构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各方面，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新的论述，同时也扩展和丰富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所以，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实事求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党的思想路线。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世界观得到高度统一。这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中国传统知行观的重要发展。

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第二章 生产力标准与传统价值观

邓小平 1977 年复出以后，在重申真理的实践标准的基础上，多次强调指出，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邓小平之所以把发展生产力提到这样一个高度，在直接意义上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的，是以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增强其吸引力为目的的，而其长远的目标，则是要逐步创造日益增多的财富、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当我们深入考察邓小平生产力标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时，就会发现，事实上，这一原则的确立，正是邓小平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提升，它在彻底恢复和弘扬了唯物史观权威的同时，还引发了当代中国思想领域中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

1.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完整意义上的唯物史观通常被概括为一个由三对矛盾、两种力量构成的辩证系统。三对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矛盾双方虽互相制约，但整体上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种力量是：阶级斗争和科学技术。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科学技术在历史上是起革命作用的力量。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总是有时强调一个侧面，或另一个侧面，这就使一些人产生误解。后来，列宁、斯大林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各有侧重，各有发展。总的说来，列宁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而斯大林则比较片面。斯大林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特别强调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作用，以至于在相当时期内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唯物史观就是强调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进行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公认的。但在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问题上，也存在类似于斯大林的片面性。特别是在党的“八大”以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群众需要，本来应该强调发展经济，强调发展生产力，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可是，毛泽东很快背离了“八大”决议，一方面强调阶级斗争，使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挫伤了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阶级斗争引向极端，使国家濒于崩溃边缘；另一方面又强调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大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穷过渡，使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损失，酿成了一个历史的悲剧。

邓小平重新考察了唯物史观的物质基石，深刻地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的这段活，既切实地抓住了唯物史观的根本，又对自己的一贯思想作出了新的概括，从而为他明确阐发生产力标准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生产力标准思想的确立，还来自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已有一百多年了，相应地，人们对它的认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阶

段。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一靠唯物史观的确立，二靠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按照马、恩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必须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必须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充分发展基础上。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生产力还不够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不够十分激化，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可能性还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还不成熟。

列宁在生产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领导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无疑，这是列宁的伟大功绩。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又领导苏联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但是，一因在生产力落后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还没有经验；二因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有些僵化，且又只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三因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四因忽视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五因过份强调阶级斗争，混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结果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时起时伏，时快时慢，曲折发展，总是没有很好地搞上去，人民生活也没有得到很好地改善和提高，这就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种子。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生产力更加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无疑，这是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但是，一因毛泽东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二因学苏联也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三因不断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四因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大二公，因而，使社会主义社会曲折发展，生产力发展不快，人民生活贫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思了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邓小平认为，搞社会主义，关键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这个问题过去长期没有解决好。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实践，要想认识这个问题，会有极大的困难和阻力。”文化大革命”集中力量抓阶级斗争，搞继续革命，使中国几乎走进死胡同，几乎葬送社会主义的事业。这就促使人们反思，正本清源，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之后，邓小平不只一次地强调：“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以纵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方式，更加明确地阐明了他的生产力标准思想。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邓小平向以务实著称。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邓小平一贯重视发展生产，并强调在此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在长期的实践生活中，邓小平深深地意识到，只有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才能落到实处。否则就是无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违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也就丢弃了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所以，把发展生产力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邓小平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必然结晶。

2. 生产力标准

所谓“生产力标准”，指的是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标准的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40年以后，邓小平就特别强调发展生产，强调注意人民生活。1943年7月，邓小平给延安《解放日报》写了题为《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提出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的观点，特别重视经济的发展。

差不多五年以后，1948年6月6日，邓小平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一文中，在总结新区所犯的急性病的错误时，深刻指出，这是新区违背了中央的工商业政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怎么办呢？邓小平在谈到如何调整工作时，提出11条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为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以便保障人民生计和支援战争，必须注意领导人民加紧生产，不误农时，不荒地，防止地富怠工和破坏；必须坚决执行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纠正相当普遍存在的轻视城市、放弃城市工作领导的错误倾向。”在这里，邓小平再一次具体地强调了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计对于建设新区，支援战争的极端重要性。这无疑是他日后确立生产力标准的深厚的思想基础。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设取代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首要任务。此时的邓小平，更是把努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摆到了重要的位置。1950年5月16日，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新闻工作如何为新时期西南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主题报告。在谈及调整城市工商业以便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时，他说，“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里，邓小平虽然只是局部地谈论到发展工商业的问题，但他把“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提到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则的高度，则不能不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进一步看，联系到邓小平以后有关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论述，应该说，邓小平生产力标准的思想此时已具雏型。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当时已经成为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的邓小平，在肩负着组织、协调社会主义建设重任的情况下，生产力标准的思想日渐明朗。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而要面对国家的现实，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要面对群众的需要，就要积极改善人民的生活。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国家遭受严重灾害的1962年，为了克服严重的困难，渡过难关，全国有不止20%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对此，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79页。

同上，第120页。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48页。

同上，第261页。

党内外都有不同的看法。当时，邓小平认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引用了刘伯承在打仗时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此来说明把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判断农业生产关系好坏标准的道理，这就是后来人们常常提到的邓小平所谓的“猫论”。尽管从党的方针、政策的角度讲，“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但就邓小平个人而言，不难看出，其生产力标准的思想是比较明朗的。可惜，在这以后，由于毛泽东一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被淹没了，甚至还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975年，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全面主持“文化大革命”后期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这是他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的一次实践。为了迅速扭转社会生活严重混乱，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局面，邓小平在反对派性，整顿和恢复安定团结局面的同时，紧紧抓住大力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大局，针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领域的混乱、停滞局面，大力整顿。并以经济工作的整顿带动科技、文教事业整顿的展开，领导和推动了全面整顿的深入进行。结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为上升，动乱后期的中国呈现出一线生机。这一实践的过程和成果充分展示了邓小平统揽全局的治国才华，同时也更坚定了他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是解决一切问题基础的信念，从而为不久以后明确提出生产力标准提供了更直接思想和实践基础。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邓小平他一出来工作，就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面对整个国家百废待兴，问题堆积如山的局面，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入手。继明确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反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之后，又大力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理论上解决检验真理标准问题，推动了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然而，思想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并不纯粹是一个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问题。在邓小平看来，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不仅要从一般的唯物主义原则即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从社会历史性质中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出发，从生产力的发展，从物质文明的建设出发，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立足于社会历史实践，“实事”才是根本的实事，“求”出来的“是”，才是揭示历史发展规律，顺应人民群众普遍的、深远的要求的“是”。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许多场合，邓小平才在大力恢复倡导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多次强调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我们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落脚点，进而明确提出并阐发了生产力标准的思想。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听取了吉林省委常委的工作汇报，在谈到如

何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问题时，他说，“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而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乃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好一些。”在这里，邓小平不仅从根本上把努力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联系起来，而且还具体地把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程度作为判断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以及政治领导正确与否与成果大小的标准，这表明他的生产力标准的思想已经具有了较之以前更为丰富、深刻的内涵。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在这个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的报告中，邓小平具体地提出了衡量经济战线党委领导好坏的六条标准。他说，“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邓小平在此针对经济部门提出的这些具体指标，实际上已经蕴含了生产力标准的主要内容。只是，就思想的理论概括性而言，它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所以，通过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成了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同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致祝辞时再次强调，“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既然如此，“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如果我们注意到，在邓小平的论著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含义常常是相通的，而且实现四个现代化最根本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发展生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

同上，第150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

同上，第182页。

同上，第208—209页。

同上，第209页。

产力，那么，就可以认为，邓小平此时已基本明确地提出了生产力标准。

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后，邓小平生产力标准思想的表述更为严谨。从 1982 年 9 月到 1987 年 10 月，邓小平多次在与来访外宾的谈话中用生产力标准考察社会主义，宏观地从社会进步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

1984 年 6 月 30 日，邓小平在一次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下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在此，他除了重申以前已经阐述过的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而外，还首次把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现实水平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明确地从社会进步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

1985 年 4 月 15 日，邓小平在再次重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时，进一步指出，“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显然，这里的“社会主义要求”是依据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而提出的。

1987 年 4 月 26 日，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他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正是这个“事实上不够格”奠定了同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础。而这个“事实上不够格”乃是邓小平运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考察当前我国国情的结果。

根据邓小平上述一系列论述的精神，1984 年 10 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则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而，“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十三大报告在列举了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十二个观点后，立即强调指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推进，以至共产主义的实现，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和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3—64 页。

同上，第 116 页。

同上，第 225 页。

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标准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离开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对整个社会基本矛盾，报告指出：“只有在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承认生产力是根本标准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保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能够真正适应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而不致陷入主观随意性”。至此，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史上最终形成了“生产力标准”这一概念，并得到了明确而完整的表述和阐发。显然，这是对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和总结的结果，也是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1992年初，邓小平针对当时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左”的倾向，风尘仆仆地视察南方，沿途发表了一系列事关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重要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继续发挥他的一贯思想，以纵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方式，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社会主义中国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从而再次重申深化了关于生产力标准的思想。同年9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把它概括为九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第三条，并作为根本的理论依据贯穿九条的始终，特别是把它作为党的章程的基本内容载入新的党章，进一步用科学权威和组织权威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

3. 对传统价值观的发展

邓小平生产力标准思想的确立，固然彻底地恢复和弘扬了唯物史观在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的权威，但更重要的是，它还以崭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尺度对以往一切违背生产力标准的旧观念、旧道德、旧尺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此，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其意义不仅在于标准本身，而且还更在于它引发了思想领域中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思想革命，目标在于破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陈旧观念，树立起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崭新观念，因而，这是继实践标准大讨论之后，我国思想领域中又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一）生产力标准是对传统的“制度”标准的否定

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和评判社会生活？这是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倍感困扰的问题。建国以来，我们已经比较习惯于用“制度”的标准来衡量现实的社会生活。所谓“制度”标准，即凡事都要问一个姓“资”还是姓“社”。在这种标准之下，凡是社会主义的都是好的，凡是资本主义的都是坏的；进而，凡是社会主义的都要坚持，凡是资本主义的都要反对。于是，是不是姓“社”，坚持不坚持姓“社”，就堂而皇之地成为衡量社会主义时期一切思想、言论、行动的根本标准了。

客观地说，所谓“制度”标准，并不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才有

的。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有着自己漫长的历史。在历史上，人们往往习惯于用理想的社会“模式”来框套现实，裁判生活。这种思维方式正是现代“制度”标准的雏型。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人们世世代代都在勾画着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怀念的是西周“均于贫”的井田制度，老子崇尚的是“小国寡民”的理想境界，历代农民起义军所追求的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天国”境界，并企图把这种“天国”再现于人间社会。在西方，柏拉图曾描绘出以善的理念为指导的理想国家的图像，托马斯·莫尔则构想出“乌托邦”的社会方案，在“乌托邦”中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压迫，也没有饥饿贫困。近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又把这些理想社会的蓝图进一步精细化、理论化，创造出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并把理性与永恒正义这些抽象原则当作衡量社会是否合理，是否进步的标准。当他们用是否符合于这种理想社会模式去裁判社会生活时，他们所使用的正是以“模式”为标准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在当代中国，突出“制度”、以“制度”作为最高标准的思维方式有两个重大的误区：第一，它把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凝固化了。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以后，苏联实行了以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还有了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等的创造。就马恩的设想而言，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当代社会条件的变化，尽管它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但其中仍不免有一些同当代现实相脱离的东西。至于苏联模式，则是基于马克思早年设想，也基本上同时代相背离了。但是，“制度”标准式的思维方式却把马恩的早期设想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早期模式当作千古不变的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第二，它把对那种凝固化了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坚持看作是比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事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根本上也要看它能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无论如何更带有根本性。所谓“制度”的性质，本质上说来是由生产力的性质所规定的。因此，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应该说比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性质更具根本性。而在本质上，这两者又是一致的。一切有利于主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应该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用抽象的“制度”原则来判断发展生产力的措施中哪些是社会主义的，哪些是资本主义的，倒是要用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标准来检验一下我们过去固守的“制度”原则，哪些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哪些是带有空想因素的。但是，“制度”标准式的思维方式却认识不到这一点。依据这种思维方式，社会主义时代的各种社会现象，不是姓“社”就是姓“资”，凡是姓“社”的，无论如何也要加以坚持，而凡是姓“资”的，则要绝对地加以排斥。以商品经济为例，早在建国初期，它就被戴上了“资本主义”的帽子。此后，凡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横遭排斥。多年来，商品流通受到限制，民间集市被取缔，个体贩运被称为投机倒把，甚至农村小商品生产也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一割再割。在“文革”期间，甚至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荒谬绝伦的论调。这种对于发展生产力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位置关系的颠倒，实在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

对于用姓“社”姓“资”一套来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阻挠改革开放的谬论，邓小平曾多次依据生产力标准的思想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在视察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对这种论调作了鲜明、透彻的分析，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精辟论述既是对“制度”标准式思维方式的有力批驳，又对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赋予了更加明确、更为深刻的含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先验”的理想模式，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合的合理社会形式，它建立在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在于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凡是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路线、政策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它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探索就失去了目标和方向。正因为如此，是否符合生产力标准，应该成为判断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这一根本符合唯物史观基本精神且又极明确的论断，对于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抛开以往的历史包袱，弄清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为探寻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模式指明了道路，也根本否定了那种用几个所谓的“原则”来框套社会主义现实，纠缠于姓“社”姓“资”，而又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生产力毫无兴趣的“左”的倾向。

（二）生产力标准是对传统的“道德”标准的否定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人们除了比较习惯于用“制度”标准来评判现实的社会生活之外，通常还喜欢运用道德的尺度。所谓“道德”标准，严格地说，即把道德看作是评判各种社会现象的最高尺度。在这种标准之下，凡是符合于人们头脑中“道德”规范的，都是好的，都应大力提倡；凡是不符合于这些规范的，都是坏的，都应竭力排斥。

把“道德”作为评判社会生活的最高尺度，是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色。早在春秋时期的“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之说和“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之说中，“德”已经被显著地置于首要的位置了。而儒家的学说，则把这种对道德的重视更加强化了，主张对人民要“约之以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汉代董仲舒则进一步把“三纲五常”伦理道德归结为天意，提出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试图使这种道德永恒化。宋代朱熹更给这套封建道德观披上了精致的理学唯心主义外衣，他将“天理”与“人欲”相对立，主张要“存天理、灭人欲”，使这种理学思想继续作为封建统治的核心思想延续到中国的近现代。毛泽东曾深刻地把这种封建道德宗法思想形容为束缚劳动人民的“五条绳索”，鲁迅则一针见血地揭露出这种封建仁义道德的实质就是“吃人”。也正因为这种封建道德观念以及道德裁判所严重地压抑了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它对于造成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和封闭状态是难逃其咎的。

20世纪以来，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冲击和荡涤，这些封建道德已经呈现衰败之势。然而，长期历史形成的道德观念，并没有随

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展开就完全被扫除干净，许多陈腐的封建道德观念，至今仍然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更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用“道德”作为最高尺度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裁判社会生活的传统思维方式，依旧顽固地存在着。建国以后，由于对社会主义理论缺乏系统地理解，由于历史传统观念的潜在作用，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一直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往往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合乎传统的“平等”、“平均”道德观的理想社会境界。因此，在对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制定社会主义路线、方针、政策上，往往带有明显的“道德”标准的痕迹。例如，在对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不是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去积极探索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途径，而是以“平等”、“平均”为尺度，试图建立一种符合人们道德理想的模式。于是，多年来，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总是离开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盲目地去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能体现“平等”；在分配问题上，不是按照按劳取酬的原则去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是以“缩小收入差别”、取消“资产阶级法权”为名，搞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又如，我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道德观念，历来崇尚“重义轻利”，排斥商业活动和商人行为，把“重利”与“奸商”相联系，即所谓“无商不奸”。这种观念反映在对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看法上，则是长期把商品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排斥，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结论后，仍然有一些人视商品经济为异端，继续批判“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哀叹所谓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失落。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归根到底受制于一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世界上既没有抽象的道德，也没有永恒的道德，道德是时代的产物。随着生产力发展要求和时代特点的变化，那些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背离时代特点的陈腐道德观念必然逐渐被抛弃，而适应于时代要求的崭新道德观念也会不断产生出来。因此，对于各种道德观念，应该用生产力标准进行评判，看它是否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绝不能用道德作为最高标准去评判和裁剪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在道德观上的根本界限。

可见，邓小平生产力标准思想的确立，破除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以“道德”为最高标准来裁判社会生活的传统观念，从而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道德已经丧失了作用。事实上，在规范人们的行为和关系时，道德仍然在特定的范围内有着它特定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反复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作用和范围无限制地扩大，并且包括道德观念和道德评价在内，最终仍然要受到生产力标准的检验，这是防止道德观念的僵化与道德评价的滥用的有效保证。

（三）生产力标准是对传统的“政治”标准的否定

建国以来，在我们的社会中，曾经有过不少人除了习惯于用“制度”和“道德”的标准来评判现实生活之外，还十分喜欢运用“政治”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或一件事。所谓“政治”标准，即把政治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在这种标准之下，是否“突出政治”成了衡量一切人和事好坏的根本标准，甚至是否符合自己的政治观念、政治利益与政治派别也成了用人和衡量人的思想行为的主要标准。

“突出政治”以及以“政治”为标准，也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它的原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突出的特点是把政治看作帝王将相的职业，他们从事的是政治统治，研究的是政治统治术，争夺的是政治统治权力，政治始终在封建统治阶层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而从事经济、文化、科技则几乎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因而，历代统治者都是把是否符合自己的政治观念、政治利益与政治派别当作用人和衡量人的思想行为的主要标准。这种将政治与经济分离，重政治、轻经济的思维方式，无疑对现代中国政治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由于它领导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在此期间，政治似乎一直发挥着超越经济的巨大反作用，由此形成了“政治高于一切”这一长期支配人们的观念。建国以后，这种观念仍然十分流行，“政治挂帅”、“政治决定一切”的观念被广泛地宣传，而主张重视经济作用，主张发展生产力，则被当作“经济主义”、“唯生产力论”来批判。于是，政治被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是否“突出政治”成为衡量一切工作好坏的根本标准。相应地，政治标准也成为评价一个人、一门艺术、一种学术思想、一部文学作品等等的尺度，甚至还出现过用政治去粗暴地干顶科学的闹剧。

突出政治，以“政治”作为最高标准的思维方式，往往以革命导师的某些言论作为最高标准，把革命导师的本本与条条看得至高无上，奉为金科玉律，习惯于用本本框套实际。在一些人看来，凡是导师讲过的都是绝对正确的，应该无条件地执行。当本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不是以本本服从现实，而是要现实服从本本。这种本本主义的态度同中国传统唯书唯上的思维方式紧密相关。孟子曾经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之言、畏圣人之言。圣人的书，一个字也改不得，违背了古训则大逆不道，人们只能去诠释、考据、服从。这种思维方式长期禁锢着我国人民的思想，也是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多次出现“左”倾思潮的主要思想根源。在“文革”期间，突出政治，个人崇拜，用导师言论衡量一切的作法更是被推到了极端。那个时候，是否突出毛泽东思想成为是否突出政治的集中表现，于是，“大树特树”、“一句顶一万句”、“句句照办”、“紧跟不走样”便成了人们言论和行动的准则，毛泽东的话被当作“最高指示”，“语录标准”成了衡量一切是非好坏的绝对标准，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仍然有人提出“两个凡是”的标准。这种“左”的教条主义倾向，严重背离了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是僵化与保守的思想根源，它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突出政治，以“政治”作为最高标准的集中表现就是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50年代中后期，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上占据主导地位，“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就成为当时所通行的最高标准。根据当时所宣传的理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一切工作的总纲，做任何工作都要把阶级斗争当作总纲来抓，抓住了纲，各项工作自然而然就带动起来了，正所谓“纲”举才能“目”张。因此，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衡量每一项工作成绩的大小，都要看是否突出了阶级斗争这个总纲。只要是突出抓了阶级斗争，工作做得再糟也是好的；相反，工作做得再好，只要不提“阶级斗争”这个纲，也会被宣判为不突出政治的坏典型。对人们的思想行为的评价也是一样，每一个人的一切言论行动都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都要上纲上线，看它“对哪个阶级有利”，而不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种阶级斗争标准严重地扭曲了政治与经济

的关系，它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来讲“政治”，讲“阶级斗争”，其结果只能人为地扩大阶级斗争，激化社会矛盾，严重干扰和破坏社会主义正常的经济建设。

唯物史观确实承认，政治对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或曰反作用，而且这种反作用在历史变革时期尤为明显。但是，唯物史观同时也坚决申明，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在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在理论上说恐怕已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基本原理。而邓小平生产力标准思想的确立，其重要的意义不仅在于使人们从理论上承认了经济是社会存在和发展基础的唯物史观思想，而且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最高标准，把以经济为本的思想贯注到一切社会认识 and 实践中，彻底破除了传统的以政治为本、空谈政治的思维方式，它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进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标准”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邓小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深刻把握。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作为 20 世纪的伟大事件，日益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面貌和时代的进程，加速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使得人们以从来未有的速度，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认识论的拓展。价值认识已成为认识论的重要内容。当今人们的认识活动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对客体的认识，不仅是求真，而且还要求其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价值认识的导向性日益突出。正因为价值导向认识的导向性的强比，使以往实践的标准，不言而喻是政治性实践的标准（制度与价值又是以政治为其核心的），转向以生产力为核心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标准，这就是邓小平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和提高。所以，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标准”思想的提出，既强调和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又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认识论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第三章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传统治国之道

邓小平坚持生产力观点和生产力标准，根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逐渐地形成了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思想。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对于这条基本路线作了概括，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特别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所谓基本路线，就是说它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是指导各项工作的总路线、总方针，因此，也就是我们的“治国总纲”。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这条基本路线的核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认为，“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以后，他还多次阐述了这条政治路线。他说：“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我们制定出来了。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这样表述我们的这个总任务，或者叫总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政治路线的确立，是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使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发生了重大的飞跃。

1.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即向全党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性任务。把经济建设作为一项极重要的任务。到1953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其内容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的同时，经济建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上来。并于1958年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出，符合人民的普遍愿望，但是却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由于这是建立在唯意志论基础上的所谓“高速度”，结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8—24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

果遭受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

另一方面，1957年6月出现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随后，9、10月间，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断然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作出了将主要矛盾与总路线的二元选择，导致了在实践中运用阶级斗争的惯用方式，诸如“插红旗、拔白旗”、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式等等，来解决经济问题，直接加剧了经济建设的挫折。而更严重的是，毛泽东固执于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念，在“大跃进”以后的经济调整过程中，于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所谓“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把阶级斗争进一步绝对化和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了经济建设中心，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党的工作重心的偏置，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最深刻的教训，它使得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沿着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在不断的政治折腾中越陷越深。邓小平说：“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重了。”又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在战争年代，邓小平对经济工作就十分重视。1943年，他写了《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其中提出：“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

经过“大跃进”的挫折，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时期，邓小平对当时出现的“包产到户”采取支持的态度，认为要以“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标准取决定生产关系的形态。把经济的发展置于首要的地位。

“文化大革命”时期，邓小平被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而遭到猛烈的批判。邓小平后来说：“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1973年，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并于1975年担负起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重任。邓小平毅然提出推行全面整顿。他要求以毛泽东当时在不同场合提出的三项指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还是安定团结好）为纲，实际上试图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把“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总揽各项工作的纲。

显然，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由来已久，从而，在他的主持下，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这是历史性的伟大转折的主要标志。

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动摇。1980年，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79页。

同上，第32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7页。

他在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说：经济建设这件事，“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1987年初少数人闹事，党内人事变动，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这对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会有任何影响，“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我们的改革和开放都将继续下去。”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邓小平坚定地说，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没有错。我们要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1992年初，邓小平针对由于苏东局势剧变国内“左”思想抬头的倾向，更进一步地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邓小平说过：“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和实质。坚持了这个中心，也就从根本上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

“一个中心”也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是为“一个中心”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强大的政治保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为经济建设提供发展动力和外部条件，并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两个基本点共同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2. 发展是硬道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建立在对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正确认识基础之上的。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一思想既是对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相统一思想的恢复和发展，也是对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分析社会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把工作着重点用来解决主要矛盾思想的恢复和发展。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1页。

同上，第307页。

同上，第371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

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决议还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针对“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这种在理论上较完备、较准确的论述；另一方面还提出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论断。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思想 and 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从人与社会、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人与物这样两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提出的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提法、不同表述。毛泽东的思路，是以社会基本矛盾为前提，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总题目，来说明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任务。遗憾的是，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逐渐出现了偏差。

邓小平在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从而再一次明确并发展了八大以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相统一的正确思想。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如前所述，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从社会主义本质的角度，不仅强调发展生产力，而且还强调解放生产力。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或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邓小平不仅仅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条政治路线，不仅仅确定了通过改革开放推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而且还从政治角度，从宏观上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战略。1979年，他在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指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意味着“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

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以后，又多次深入地谈这个问题。1984年，他说：“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1987年以后，邓小平又明确把上述内容概括为“建国一百周年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从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将近九年时间，算是第一步。第一步原定的目标，是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第三步是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目标大体上是人均达到四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水平。”邓小平的这一设想，是根据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而制定的，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蓝图。

邓小平在提出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策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抓住时机发展经济，争取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上台阶”策略的实质，就是正确处理好稳定与发展、速度与效益的问题。邓小平根据我国近年通过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根据国际竞争越来越是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较量、越来越是综合国力的较量的现实，以及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了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强调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就是要通过“上台阶”的发展策略才能得以实现。

邓小平说过，“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邓小平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意义重大。这是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基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大势的深刻把握。这一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确立，可以说从根本上提出了治国总纲，相对于“文化大革命”而言，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并且，从实践上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的历史历程。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明确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始终不渝贯彻到底的根本方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业。

3. 对传统治国之道的发展

中国古代，治国安邦历来是政治家和思想家所讨论的核心问题。记载着夏、商、周三代史料的《尚书》中，就集中了大量关于治国安邦的思想言论。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其争论焦点就是治国安邦之策。所以，《论语》、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7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6页。

同上，第375页。

同上，第77页。

《孟子》、《荀子》、《韩非子》、《墨子》和《吕氏春秋》等书的主要篇章都是政论。《老子》一书虽谈“玄”，但“其本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史记·自序》），“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恃，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艺文志》），其政治意义也高于哲学意义。秦汉以后，绝大多数思想家、史学家也都把治国之道当作其著书立说的基点的。贾谊的《新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如此，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如此，王安石、朱熹、顾炎武、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集也莫不如是。

正如前面所谈到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别重视政治或伦理的价值判断，因此，作为根本的治国之道，也特别重视政治与伦理的关系。其核心就在于如何处理好君、臣、民的关系问题。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把“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作为为政的根本。所以儒家主张道德教化，施“仁政”，这称之为“王道”。法家走向另一极端，主张以严刑峻法治民，“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韩非子·奸劫弑臣》）这称之为“霸道”。韩非还总结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的理论，主张法、术、势的结合。他说：“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韩非子·八经》），“法者，编著图籍，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难三》），统治者在政治上一般是王霸并用。

为了安民，政治家和思想家们一般也都主张富民。所谓“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管子·版法》）。所以，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充实财政，也是历代统治者的重要政治方针。但是，这是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为其根本目的的，所以，中国历史上，除了少数贤明君主尚能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外，更多的统治者则动辄大兴土木，滥用民力，耽误农时，穷兵黩武，使得民不聊生。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必然结果。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曾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放在一个极重要的地位，他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取得过显著的成就，并且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进行过有益的探索。但是，毛泽东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之道，毕竟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曾提出了“向自然界进军”的口号，但出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又逐渐把兴奋点转移到与人斗争上来，要继续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他希望通过政治的运动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所谓“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但是，在遭致“大跃进”的挫折之后，他更极端地执著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以图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通过七、八年来一次的政治运动和思想革命，“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联系到毛泽东早年“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的倾向，分析“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法家的赞赏，以及特别强调人的道德领域的“斗私批修”等做法，可以认为，毛泽东在根本的治国之道问题上，明显带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过于注重政治和伦理领域的痕迹。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性》，1917—1918年。

邓小平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是毛泽东关于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上来，关于“四个现代化”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这一思想直接把握了经济这个中心，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贯彻。邓小平历来强调，“共产党就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他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可见，邓小平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既是对“左”倾思想的拨乱反正，也是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重大飞跃。

鉴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长期以来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至今在一部人中仍具有相当的影响，为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条政治路线，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深刻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表现就在于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所以，剔除中国古代过于崇尚政治、伦理的传统意识，破除“左”的思维定式，这是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一项极其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48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5页。

第四章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传统义利之辨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革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调动广大人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直接联系于对幸福生活的追求。邓小平在 1978 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思想，肯定倡导了责任制的新形式，从而使中国社会的经济改革开始起步。

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提出，纠正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平均主义“左”倾空想的错误，对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是个突破。

1.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社会革命运动，如果从南斯拉夫 50 年代的改革算起，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探索试验已经有 40 多年历史了，但走过的道路却是非常的曲折坎坷。在科学社会主义还停留在纸上没有付诸实践时，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使预言：社会主义可以实现社会平等，消灭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恶果，但它同时也就取消了为个人利益而奋斗的动机，难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因此，社会生产就会停滞不前。前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使国家经济一直为生产率低、怠工、旷工等所长期困扰。前苏联最终走向解体，及在体制上深受其影响的东欧国家的剧变，给我们在这方面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平均主义当作社会公平，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同步富裕来作为社会进步追求的目标。以“一大二公”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同步富裕这种平均主义的公平观找到最合适的载体，使其更加制度化和合法化。毛泽东晚年，甚至认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跟旧社会没有差别”，提出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对物质利益的排斥造成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在各地区之间搞平均主义。这种做法极大地挫伤了个人、企业和地区的积极性，也削弱了先进地区和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实际上起了打击先进鼓励落后的作用，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像邓小平指出的那样，“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沉重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度里，幻想在同一时间以同样速度一起富裕起来，既不合国情，又有悖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更不符合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事物发展的不平衡规律。那么，探求新的发展道路就势在必行了。邓小平明确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走向“共同富裕”这一主张，并在实践中把这一主张系统化。

1978 年 12 月 13 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闭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71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55 页。

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劳动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并且强调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其实早在60年代初，邓小平与刘少奇、陈云等就主张搞“三自一包”，实行多劳多得，适当拉开收入上的差距。但这一主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来被错误地指责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他们的一大“罪证”。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又提出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主张允许有适当的物质鼓励及根据贡献不同待遇上应有所差别。这年8月在国务院讨论加快农业发展问题时的谈话中，他指出：“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我党“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和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全党对本国国情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又多次在不同场合讲到他的构想。

1980年1月，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总结当时的形势后肯定他说：“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

1983年1月，邓小平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1986年3月，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他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并认为“这个路子是对的”。同年8月，在天津视察时，他又反复强调这一构想。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开始对沿海实行政策倾斜，实施优先发展沿海并逐步带动内地发展的地区发展战略。这正是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构想的具体化。1979年4月，当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提出广东经济发展可在地区优势上做文章时，邓小平当即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

同上，第30—31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同上，第155页。

区。” 1984年2月，在视察了几个经济特区之后，他重申：“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1987年6月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他高兴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 1988年9月，他又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视察，他回顾了“共同富裕”构想的形成：“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中国改革的实践走的正是这样的一条道路。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农村改革首先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地结合起来，克服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端，也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正如邓小平在回顾1984—1988年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时所说的那样，“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这个期间我们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农村改革的成功，鼓舞和增添了全国人民走改革开放之路的信心。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逐步建立企业内部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并在生产、销售、劳动管理、工资、奖金等方面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以沿海先发展来带动内地发展的经济战略也在大步前进中继续完善。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984年5月又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上海、宁波、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初，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三角地区被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第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批准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1988年1月，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根据这一批示精神，1988年初，国务院决定开放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这样，我国就形成了由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三角地区、辽东半岛、河北、广西等7个沿海经济开放区组成的沿海开放带。

回顾16年来我们所进行的改革，无论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无论搞

转引自《邓小平特区建设思想与实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2页。

同上，第239页。

同上，第277—278页。

同上，第373—374页。

同上，第237—23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8页注99。

特区，还是开放沿海、沿边地区，这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无不贯穿着邓小平提倡的让一部分人、企业、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贯穿着他适当拉开差距，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在全党形成共识的基础上，这一战略思想载入了党的十四大报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2. 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

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构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走向富裕；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不会导致两极分化。这三部分内容是相互联系，前后相应，互为前提的。

（一）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走向富裕。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描述未来社会时，总是忘不了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讲到，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消除了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障碍”、“浪费”和“破坏”，“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建国前，革命战争和国内外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使得革命导师们在如何发展生产力以改善人民生活这一问题上的关注相对较少。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对什么叫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整整二十年里，把主要精力去搞阶级斗争，忽视或贬低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意义。这是指导方针的失误。尤其是十年“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利用这种失误，用他们的所谓“革命”来破坏社会生产，使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说：“‘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多年来，邓小平反复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1992年初视察南方途中又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力学说的全面发展，它具有多层次、多方面的深刻而新颖的内容。

首先，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走向富裕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2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同上，第373页。

想和最终奋斗目标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使命直接联系起来。他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这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最初阶段，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最终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创造物质条件。1985年8月，他会见津巴布韦领导人时，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986年9月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他再次表达了这一内容并指出：“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这些思想的表述，是对“四人帮”荒谬鼓吹的“穷过渡”的正本清源，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发展生产力而在现阶段建设富裕的社会主义、在未来实现极大富裕的共产主义。

第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走向富裕的思想，其更直接更具有现实性也是最主要的含义，则是反映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众所周知，马恩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达到很高的社会主义，总体上并不存在消灭贫穷、摆脱贫穷的问题，但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将长期不同程度地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上处于相对贫穷落后的地位，因此需要经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消灭贫穷，走向富裕，最终赶上发达国家。只有在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之后，才能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因而，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第三，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走向富裕，这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和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优越性问题。他反复阐明这样一个道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82年9月他与来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谈话中说：“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1987年4月又谈到：“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同上，第171—172页。

同上，第10页。

同上，第25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页。

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这而且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存亡极为严峻的现实问题。近几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充分证明了邓小平上述思想是非常正确、非常有预见性的。

（二）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但其实现是个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波浪式前进的逐步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我国的国情，决定了走向共同富裕必须实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原因有四个：首先，同步富裕不可能，平均主义不能导致富裕。同步富裕是小生产者的幻想，这种幻想在现实中表现为平均主义，其结果只能是普遍贫穷。

其次，我国地域辽阔，既存在着地理和自然差异，又存在着经济文化的差异，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我们只能从这一实际出发，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帮助、支持不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的发展，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走向共同富裕。

再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生产者之间按照优胜劣汰的规则进行竞争，各劳动者之间、各企业之间、各地区之间在收益上必然出现或大或小的差距，先富后富、富多富少不会完全一样的。

最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我国生产力多层次、非均衡的特点使得地区之间、部分之间、企业之间经济发展差别显著，劳动者由于劳动条件、劳动技能和劳动态度的不同，所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也存在差别。因此，在收入分配上必然反映出这些差别，使得部分地区、企业、个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落后地区和人民的发展走共同富裕之路的论述，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内容：第一，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要靠勤劳致富与合法经营，是“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是由于“为国家创造财富多”而个人的收入多一些，集体福利搞得更好一些的。第二，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和通过技术转让等方式，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邓小平在1990年12月提出：“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能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第三，先富起来的地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基础上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要掌握好时机，“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吃‘大锅饭’”。“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三）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不会产生两极分化。

同上，第225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同上，第374页。

“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的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这一思想是邓小平经常强调的，它在理论上严格划清了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一个社会，社会成员的生活贫富差别状况如何，是反映一种社会制度实质的具体表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反映在分配上，就表现为一部分资本家凭借手中的生产资料，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大量攫取社会财富，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则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处于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的状况之下，这样便造成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而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优越性的最突出表现，“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所以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的高度重视，也是出于对中国国情和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刻认识和正确选择，即中国必须也只能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在他看来，其一，只有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才能解决拥有十一亿多人口的中国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的发展问题，即共同富裕是国家富裕起来的基本条件。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绝大多数人摆脱不了贫穷状态。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其二，只有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才能保持拥有十亿多人口的中国社会的安定团结，才能解决中国的稳定问题，并在稳定中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指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因而，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应该避免两极分化。但是，在现阶段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会不会导致贫富悬殊、而极分化呢？对此，邓小平很有信心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而极分化。”因为我们采取了如下强有力的措施：

第一，提倡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在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下进行的。邓小平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

同上，第 265 页。

同上，第 110—111 页

同上，第 364 页。

同上，第 111 页。

同上，第 139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64 页。

同上，第 374 页。

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是因为“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第二，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提倡的是靠勤劳致富、守法致富，也就是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在我国，任何公民、企业和各地区都有按政策和法律努力争取先富的权利，但必须以不损害国家、集体、他人的利益、不妨碍实现共同富裕为前提条件。也即邓小平所说的“勤劳致富是正当的”。

第三，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的，就是要用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先富帮后富，走向共同富裕。邓小平多次明确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第四，党和国家在提出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的同时，还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邓小平说：“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具体政策诸如：“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还有如加强和健全集体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对自然条件恶劣、经济文化发展不很落后的一部分老、少、边远地区和其他贫困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并给予必要的物资技术支援，等等。

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要体现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它指导我们在现阶段科学地理解和贯彻按劳分配，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而且还直接涉及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其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都是重大的。

3. 对传统义利观的新思维

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令世人瞩目。来访的外国客人也多次提到这个问题。1985年，美国时代公司总编格隆瓦尔德对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一直教育人民要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现在经济改革，你们教育人民要致富……”。1986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同上，第123页。

同上，第23页。

同上，第111页。

同上，第155页。

同上，第139页。

同上，第172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同上，第148页。

士在采访邓小平时也提到：“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并且他认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这与毛泽东的主张不一样。确实，邓小平的这一观点，在中国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个大胆的、颇具魄力的新的思维。

在具有伦理特色的中国思想史上，义利关系成为许多哲人关注的问题，从春秋战国直至近代，义利之辨源远流长。“利”的原始意义是以刀割禾，表示收获。“义”，繁体作“義”，上羊下我，“我”为兵器形，可理解为杀羊。儒家又说，“义者，宜也”（《中庸》），据考证，“宜”是在砧板上切肉。《庄子·大宗师》中有“万物而不为义”，这是反话，一般见解应该“万物”为义。“”，按《说文通训定声》说法，是“细切匀之有叙也”。可见，“义”的本义是杀羊分肉，“细切”是为了“均匀”。后来，“义”的意义有所引申，分配就是义；再引申，合理分配就是义；再引申，合理的就是义，就下限于物质分配了。

在孔子那里，义已经超出了分配的范围，包括了人际关系的各方面。孔子说，“礼以行义”（《左传》成公二年），义就是合乎礼。孔子重义，“君子之化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也不否定利，但主张重义轻利，“义然后取”（《论语·宪问》），“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西汉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下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对重义轻利的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强调，对后世影响很大。宋代，理学家则将义利对立起来，二程说，“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遗书》卷11）；而且把义利问题看成公私问题，“义利云者，公私之异也”（《粹言》卷1）；义利还相对于理欲，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所谓“灭人欲”，并不是绝对不要物质利益，而是指不要不合理的利，但是，这一命题的提出，仍具有绝对性，容易导致禁欲主义。

另一方面，也有主张义利统一的。如北宋王安石认为“义者，利之和，义固所为利也”。明代李贽强调人心就是私心，“无私之说，画饼而已”。清代颜元更主张“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宋以后，一些思想家一反过去重义轻利的观念，这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

义利观，虽说是道德伦理领域的范畴，正如义的本义是物质的分配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仍然离不开利益分配这一焦点。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根据自己的观念来设计理想的蓝图，《礼记·礼运》关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表达了中华民族对人类发展前景的根本愿望。董仲舒为救治因统治阶级重利轻义、宫贵不仁而产生的社会矛盾，提出了“调均”的政治方案。他在《春秋繁露》中引孔子语“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则第一次表述了分配领域中的平均思想，开启了社会的又一道智慧之门。《墨子·尚贤下》言：“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则从另一学派的立场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老子》对入道提出了悲愤的控诉，从反面张扬了平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兵书《尉缭子》言：“共寒其寒，共饥其饥。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饭，有子一人不损一饭。”我国先秦

同上，第171页。

同上，第174页。

参见周桂钊：《中国传统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233页。

学术枝蔓，由有“九流十家”之称，但在平均这个问题上又是如此不约而同，可见中华文明自有一中心在，与世界文明的该心息息相通。

先秦时期的平均理想，影响深远。它日后主要在两个领域表现出来：一是被视为“道统”、被社会所敬仰、与政统相抗衡的正统思想体系，其代表就是张载等人的平均理想。张载主张均田，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明末清初的唐甄说：“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潜书·大命》）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更是描绘了没有私产、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人间天国的大同境界。第二条线索是民间宗教与群众运动。宫的理论框架虽然极不周全，但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至为巨大。东汉道教重要经典《太平经》说：“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灭食，此太仓之粟，并非独鼠有也。小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恶当从其取也。”呼吁皇宫的财物都可以任旁人取，也是大胆到了极点。黄巾起义就是在《太平经》的影响下兴起的。唐懿宗时期浙东裘甫起义，以“平”号召农民。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天补均平大将军”。王小波声称“吾疾贪官不均，今为汝均之”，打出“等贪贱，均贫富”的斗争旗号。凡此种种，无不共同体现了人类对于理想的不懈追求。

且莫因为当代对平均主义的反复批判而抹煞了平均理想的深远意义。实际上，平均仍然是人类今后勉力追求的根本目标。而从历史来说，平均理想不啻是一剂除腐生肌的强烈解毒剂，尤其是当一个朝代到了晚期，兼并剧烈，民不聊生的时候。古代中国从未有过天赋人权的思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一般说来是被默认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自然也存在许多特权，而这些特权发展到后来都会无限膨胀，导致财富聚敛、贫富悬殊。在这个时候，平均理想就会赐予人们斗争的利剑，在这把利剑的指挥下，人们去奋斗、去流血，铲除旧的不平等，当然结局往往是产生新的不平等。

追求平等的理想是崇高的，但人们采取的手段往往失误。先秦诸家并没有发现切实的平均途径，农民起义则常常挂着平均的旗帜而无法推行平均的政策，或者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而无法应付平凡的现实，张载和康有为的平均，实近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蓝图，描绘得具体细致而更流于无意义。在分配领域强调平均，无益于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社会财富也就无从充裕；在生产资料（如土地）上强调平均，囿于现实的种种限制，在古代中国也从来没有做到过，共同富裕的理想毕竟不过是理想，人们还得在现实中痛苦地生活。但也正是因为有理想的存在，人们还能在黑暗中蹒跚求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可以说使中国人的几千年来梦想第一次得到了实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取得胜利后，在农村深入广泛地进行土改，打倒地主阶级，团结中农，依靠贫雇农，将生产资料进行了平均分配。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保卫新政权的积极性，中国健儿“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军民一起，迎头痛击了美帝国主义，以胜利的捷报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土地改革也为新经济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出发点，其规模之大，行动之彻底，远超历史上任何类似之举动，全面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我国由农业国向现代化强国转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平等理想的举措，举世无与伦比。

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消灭剥削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白毛女》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的一部好教材，它指出农民的贫困是地主的剥削造成的。因此，我们必须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而消灭剥削，自然会得到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拥护，但不可能是和平土改。共产党人清醒地看到，即使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土改仍然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行将灭亡的地主阶级绝不会自动放弃剥削和支出土地财产，因此，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由他们自觉行动起来，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就使历史上一些善意而无法行动的思想家相形见绌。他们或寄希望于皇帝的一纸诏书，或寄希望于财主的良心发现，这种空想式的愿望在现实面前必定碰得粉碎。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又坚持不走极端，从 1951 年起把以前的打击富农改为中立富农，没收地主的财富，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也分给同样的一份，使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做到消灭剥削阶级，但对不罪大恶极的则不消灭他们的肉体。到 1952 年底，全国共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的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三千万吨粮食的苛重地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平等理想作出的重大贡献。

但是，毋庸讳言，一个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难题总没有那么容易在一夜之间豁然解决，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土改，但也开始了在充满真理和谬误的漫漫路途上的痛苦求索。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也是为解决贫富矛盾而为的一个伟大的尝试。土改以后，由于经济条件上的种种差别，农村开始出现新的贫富悬殊。当时人们把这看作新的两极分化，认为新的剥削又开始了，于是，消灭剥削、共同富裕的口号又重新提了出来，实现这个方针的途径便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总的来看，农业合作化运动有巨大的成果，但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左”的错误，追求所有制的越公越好，造就了平均主义的泛滥，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至于“大跃进”时代，则更无需赘言。只是必须提到，在当时，党中央领导层内存在着一种认识，即“趁穷过渡”，认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应趁穷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如果农民收入提高了，超过了工人收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反而困难得多。这是趁穷合作化思想的延续。毛泽东就这样认为穷好，因为穷，就要于，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土改后，农民不敢“冒尖”，以穷为荣，以富为过，这是一个好现象。到“文化大革命”颁发“五·七指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平均主义发展到了极端，同时强调“斗私批修”，连共同富裕都被认为是修正主义了。

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真正、透彻地了解邓小平理论中这方面内容的伟大历史意义。邓小平不仅承认且高扬平等的伟大理想，他还为实现这个伟大理想初步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这种貌似悖论的做法才真正体现了社会现实的运动规律。承认人的动机背后的经济原因，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观点。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只是从伦理的角度去批判资本主义、去描述未来的社会理想。所以，空

参见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中郑谦文，春秋出版社 1989 年 1 月版，第 221 页。

参见同上书石仲泉文，第 159—160 页

想者明于人类的理想，但却昧于现实而找不到实现其理想的现实道路。邓小平则以其独特的现实感，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理想的实现指出了一条切实的路径。这是理想与现实的高度结合。

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概念。邓小平关于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以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是基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实际。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全民范围的道德建设，就应当肯定由此而来的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的扶贫济困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而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

诚如精神文明决议中已经提到的，邓小平关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以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决不是提倡唯利是图的腐朽品质，它反对“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提倡勤劳致富，主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并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要求。

总而言之，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以走向共同富裕的思想，是一个大胆的创新。同时，这一创新又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思想的提出及其实践，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崇高理想，又为达到这一理想找到了一条现实的途径。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则在新的意义上使传统的义利之辨得到了总结，走出了小生产浓重的平均主义狭隘氛围，为几千的大同理想开辟出了一个新的境界。

第五章 对外开放与传统社会发展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基本方针指导下，破除了长期以来的封闭观念，以全新的姿态向世界开放，并在改革开放、走向世界使中国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邓小平不断强调、并作了系统阐述的对外开放思想，正日益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崭新的观念。

1.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邓小平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

“开放的世界”，是指各民族、各国家全面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世界“一体化”趋势。这种趋势形成于近代。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开拓了一个国际交往大发展的时代，它使世界越来越趋于开放。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注意到了这一趋势。他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各民族之间交往的普遍增进，“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代替了。”这样，“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马克思认为，作为结果的世界历史一旦产生，就又成为原因，使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更加趋于全球化和普遍化，它把一切古老而缓慢发展的民族都推上世界竞争的舞台。由此，马克思强调，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原先孤立存在的民族只有逐步摆脱其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尽可能利用这种全面的生产来发展自己，才能获得生存资格。

历史的发展充分证实了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在当今世界，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其层次在不断扩大，节奏在不断加快。从古代战争交往、血缘交往等一直发展到当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等全面交往，形成了交往的“系统值”，并产生了规模更宏大的世界市场、国际联合体以及全球循环的物质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从而大大地增强了当代世界各个社会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使得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更加不能孤立于世界的进程之外了。

对外开放，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之所以能使一个国家或民族得以发达，是因为在人类社会存在着交往或交换行为的相加效应规律以及封闭行为的重复效应和衰减规律。交往或交换行为之所以产生相加效应，是因为进入交换过程的往往是人类的最有用的成果，用富余的东西去交换自己短缺的东西，等于自己增长了一种新的东西，同时还促进了富余之物的生产。这样，进入到交往之中的民族或国家就可以与全人类共享最新成果，避免了重复劳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9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同上，第25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

动的的时间耗费以及失败的消极后果，从而使不同的民族能以人类已取得的成果为起点，不断创造更新的东西。闭关自守的民族或国家则完全不同，由于缺乏信息，很少甚至没有外界交往，因此，它们往往重复劳动，把别人走过的艰辛之路重走一遍，表面上“创新”，实际上浪费人类的智慧，仍是历史的落伍者。因此，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进行国际交往，以便中国能以跳跃的发展形式走向现代化。

邓小平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世界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历史作了全面总结和反思后得出的结论。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文明的进步通常是在人类交往的发展中取得的，古代希腊所以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不朽的足迹，原因在于他们善于开放与交往。“世界历史”形成以后，由于交往打破了区域性的限制，西方绝大多数民族都被卷入物质和精神交往的序列之中。在交往行为相加效应规律的作用下，以跳跃的发展形式进入到世界的先进行列。

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相比较，中国的封建社会所以繁荣兴旺，就是缘于不断的民族交融，对国外也有较多的开放性，甚至到了“明朗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也还算是开放的”。然而，明朗中叶特别是清朝康熙以后，中国开始了约二百年的闭关自守的历史。恰在此际，世界资本主义又开始进入急速生长的大变革时期。由于失去了与外部世界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机会，中国不可避免地落伍了，而且落伍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只是对原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后，由于片面理解以至严重曲解“自力更生”，结果导致了“非开放”的局面。但就是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时期。由于喜一次失去了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机会，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又重新被拉大了，而且拉大得令人痛心。这种情况再一次证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语重心长他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而且，邓小平还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否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后中国能否在与世界的密切交往中吸取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作为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认识到，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和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并在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新的创造，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高于资本主义，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邓小平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是对世界大势的深刻把握。

一个民族、国家的对外开放与国际交往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该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而且还取决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在“毛泽东时代”并没有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

同上，第90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

同上，第78页。

真正实现对外开放，重要原因就是 50 年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处于“冷战”对抗状态，对外开放条件不成熟。

进入 80 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东西南北”与“和平和发展”，这是邓小平对当今国际政治新格局以及当今世界主导趋势的正确概括。在邓小平看来，“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正是因世界大势的这种变和国内诸多有利条件，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的大好机遇。

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正是建立在以上的背景、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它是在邓小平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逐步形成、逐步完善的。而其中的许多观点，则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以前。

譬如 1957 年邓小平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一文中指出，我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工业国，我们还是小学生，为此，他提出了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面，我们也要学。他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会上的祝词》中，提幽了“我们要学习世界各国人民的长处。”在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中，也体现了某些开放思想。1962 年，他再次肯定了从国外购置生产资料和设备的做法。1973 年，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出席了联合国第三次特别会议，在大会发言上他明确提出，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各国在尊重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在 1975 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已尝试把对外开放作为政策付诸实践。他在《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的主张，并具体提出了出口煤炭引进技术设备这类补偿贸易的设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观点，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和对历史经验的反思，已逐渐形成了思想体系。

1978 年 3 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再次重申：“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这里他不仅强调了向外国学习的观点，而且还提出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此后，他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强调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提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5 页。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261—264 页。

同上，第 279 页。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9 页。

同上，第 91 页。

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时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取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对外开放的任务，而且提出了对外开放的一些措施和方法。这些思想、观点的提出，表明了邓小平已把中国的对外开放放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的位置上。至此，改革开放，作为党完成新时期总任务的根本方针和政策正式确定下来。在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又有了许多重大的发展，并使这一思想日趋完备。

2. 对外开放是一项根本方针

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目的。他说：“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第二，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条件，邓小平早在50年代就提出学习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一切先进的经验，他在各种场合又多次强调：“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并把其放到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位置上。他是从现代化建设与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的相互关系角度，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搞现代化建设。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的制度，闭关自守、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段话的一个重要含义，即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的，因为社会主义要从世界各国吸取进步因素，才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邓小平说：“外国人担心我们的开放政策会变，我说不会变，”“因为现代任何国家要发展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尽这苦头，”“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第四，对外开放的任务，在于扩大国际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加强国际经济、文化的全面交流。1975年，邓小平就提出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出口。1985年在谈到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时，他认为要发展生产力，第一步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要达到这二步目标，“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定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

同上，第127页。

同上，第127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

同上，第137—138页。

同上，第64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

同上，第29页。

国际交往 ,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 ,是不可能的。”

在扩大国际贸易上，邓小平早就给予相当多的关注。在 1978 年 10 月访问日本时，他提出当时中国和日本间签订了一个长期贸易协定还不够，为此在扩大国际贸易上要和日本竞争一下。在此后的许多场合，邓小平从引进技术设备、多出口创汇，从中国当时外贸额只占世界贸易额的很小比重，从实现翻两番需要扩大国内外市场，从增加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外汇等角度，论证了扩大国际贸易是个战略问题。

在扩大国际贸易的具体对策上，邓小平在几篇文章中也提出了一些设想，譬如 1975 年他提出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出口一些；工艺美术品能出口的，要千方百计多出口；化工产品、煤炭等也要考虑出口。1979 年他提出开办经济特区。他还强调要掌握了解国际市场情况，以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此外，他还主张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进一步改革外贸体制，在这一政策下给各省、市、自治区以更多的外贸自主权。

在利用外资方面，邓小平提出了引进外资的观点，改革以来，他多次强调了要积极利用外资。他认为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为此，他指出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邓小平对外债问题也作了理论分析，他说：“对借外债要作具体分析。有些国家借了很多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他们由经济落后的国家很快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要借鉴两条，一是学习他们勇于借外债的精神，二是借外债要适度，不要借得太多。要注意这两方面的经验。借外债不可怕，但主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

为了扩大利用外资，邓小平不仅提出要广泛利用国外资金，而且提出要制定一套政策，如特区实行某些灵活优惠政策；并要健全法规，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并要眼光远大，不光看到外资赚了中国人的钱，还要看到“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

在引进技术设备和人才方面，邓小平多次讲过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学习国外的管理经验，引进外国智力。

在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上，他的一个主要理论基础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认为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而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为此要努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尤其是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使其差距缩小，以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

引进人才，则是引进技术的一个重要保证，也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一个有效途径。邓小平为此把利用国外智力放到扩大开放的角度上对待。1983 年他就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7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5 页。

同上，第 193 页。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88—91 页。

各方面的建设。”同时，他提出要扩大对外技术合作，他说：“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在加强国际交往方面，邓小平认为，提倡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展正常交往，这对于加强我国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是必要的，对于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也是必要的。邓小平所指的国际交往，不仅是指经济交流，而且也包括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不仅指政府间的合作，也包括民间友好往来。

第五，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率先实验区。对外开放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但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以及中国自身从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尚未完成，这使得中国要在短期内全面对外开放还不具备条件。因此为全国全面对外开放取得经验的局部开放的试点，就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大政方针实施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开办经济特区的构想。

邓小平提出，“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这里的经济特区，是指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特区，是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而设置的。

关于经济特区的作用，邓小平作了科学概括。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

对建设经济特区，邓小平从最初取名到后来的规划、发展，都给予相当多的关注和重视。1984年，他提出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1985年他提出我国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要从内向转到外向的建设方针，把特区建成我国的出口基地；1987年他充分肯定了海南岛经济特区的实施；90年代又是他大力支持上海浦东的开发，他提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到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放，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正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和关注下，我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的发展格局。1980年我国开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在邓小平扩大开放思想指导下，我国又进一步开放了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半年之后，我国又把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页。

同上，第32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9页。

同上，第51—52页。

同上，第51页。

同上，第13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6页。

我国对外开放就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带——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由外向内、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格局。党的十三大以后，中央又制定了沿海地区加快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从而加快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3. 对传统社会发展观的发展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正是在此意义上，邓小平把改革也看成是开放，是对内对外开放，因此，这一思想具有极鲜明的时代特征。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世界性的适应现代科技、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的经济运行机制，不仅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继续发挥其作用，而且也在社会主义的不发达的中国显示其强大生命力。对外开放，作为中国选择市场经济和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由之路，其巨大的积极作用也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对传统社会发展观的变革是巨大的，而且还使得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观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有着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由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使得整个社会很自然地打上了这种经济基础的封闭和保守的烙印。老子所描述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典型地反映了小生产者封闭的心态。同时，占主流地位的“农本商末”的观念及其“抑商”政策，也遏制着社会的开放程度。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开放的时期，中国是个疆域广大的国度，由于政治、战争、经济与文化的综合因素，历史上出现了多次民族大交融时期，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并使得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历代统治者，对外也采取较开放的政策。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第一次打开了中国西部陆上“丝绸之路”；唐代中国的对外大开放，不仅使对外贸易有很大发展，而且在文化交流上也广泛进行；元朝的东西交往也十分活跃，海外贸易发展达到了较高水平；明初的中国，有郑和七下西洋，标志着海外贸易和国际交往的发展。

但是，建立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开放与交往，毕竟是有限度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如宣扬天朝大国的国威。因此，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在新的经济刺激下崛起，对中国逐渐产生了一定程度威胁。明清以后，尤其是清朝进一步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这样更造成了中国的停滞倒退，落后又招致挨打、丧权辱国。

在惨痛的事实面前，当时也有不少仁人志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也认识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提出过诸如“师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不仅看到了学习西方以抵制外来侵略，而且认为这是发展经济和强国之需，具有积极意义。以后，孙中山等民主革命的先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也都主张对外开放，认定这是强国之路。

毛泽东十分重视向外国学习的问题。早在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他就提出了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的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号召。他认为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一个民族要发展必须取长补短，为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

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而且凡是好的经验，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都要学习。毛泽东还认为，向外国学习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向外国学习应采用多种形式提出了要有分析、批判的观点。

当然，毛泽东关于向外国学习的问题，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没有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这一高度进行把握；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采取的计划经济形式，还保留着许多自然经济的特征，因此，并没有感受到对外开放的迫切性。特别是在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观点后，许多过去正确的观点得不到坚持和实行。林彪、“四人帮”更是在“自力更生”的幌子下，反对与西方国家一切交往，反对所谓“崇洋媚外”、“里通外国”，造成了新的闭关锁国的局面。

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是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放、进步的一面，继承了毛泽东正确的思想，同时批判闭关自守的陈腐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他特别注意吸取历史的教训。1984年，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谈话中指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

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对毛泽东思想和传统社会发展观的发展，其突出表现，在于他把向外国学习先进的东西，赋予了社会经济发 展的新时代主题。向外国学习，从一个国家发展的角度看，就是要善于学习外国成功经验。第一，提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利用外资的构想，并把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资作为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付诸实践。第二，提出了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 经营方式，管理经验，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他认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从而在经济体制角度向外国学习提出了全新的看法。第三，从对外开放的体制接轨角度，不仅提出要搞市场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而且从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及当时体制状况出发，正确提出了对外开放从特区试点起步，逐步扩大开放发展外向型的正确策略。第四，提出了全面开放的构想，他认为开放不仅要 对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对其他国家也要开放，从而把我国对外开放的视野拓展到全世界。

由于对外开放思想本身包含着对外文化开放的内容，所以这一思想的提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更新具有巨大的影响。它是邓小平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在文化观念上的具体化，促进了中国文化在哲学、伦理、政治、经济、科学等领域的思想观念的全面发展。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40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4 页。

同上，第 90 页。

第六章 市场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思想

邓小平的市场经济观，是其思想中最具时代活力的部份，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正确观点，不仅解决了改革的核心问题，即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取向的目标；而且使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出现了质的飞跃，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变革起到了科学导向的作用。

1. 市场经济是经济建设的方法和手段

由于受一些旧的经济理论或观念的禁锢，人们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正宗，而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随着改革的推进，理论界较早提出了市场经济的问题；当然一开始还是以市场调节、市场机制、价值规律等提法来认识市场经济的，并把其放在计划经济的从属地位。邓小平早在改革之初的1979年，就大胆提出了市场经济的观点，当时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说明一个全新的概念要使全党全国人民作为一种共识来加以接受，确实需要一个过程，而邓小平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谈话时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在公开场合对市场经济发表的科学见解，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自他提出市场经济观后，一直坚持这一科学观点，并不断加以丰富、发展。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过去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提问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1987年2月6日，在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的观点，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再次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页。

同上，第148—149页。

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1991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进行视察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市场和计划是手段的观点，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1992年的视察南方谈话中，他再次重申了他的市场经济观：“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从以上的观点内容及提出的时序来看，邓小平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长期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及基本经验的总结，从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要求出发，突破了长期形成的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其理论勇气、创新精神都是前所未有的，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确实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力。

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所作的诸多论述中看，关于市场经济观的思想内容为：

第一，目的论。

邓小平是从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必须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的。在他看来，中国选择市场经济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加快生产力的发展。世界经济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证明，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是人类历史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全新的社会制度。但这一基本制度确立之后，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在经济体制上大胆吸取发达国家成功的做法和世界一切文明成果，其中市场经济及其运行方式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成功经验，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观点从提出到完善，贯穿着一条极其重要的生产力主线，邓小平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学习外国先进经验中探索加速发展生产力之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中，他多次提到了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就是为了解决加快经济发展的问题，他提出：“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第二，手段论。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同上，第367页。

同上，第37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同上，第203页。

同上，第364页。

邓小平提出并论证了市场和计划是方法、手段，并不反映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

在《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一文中，邓小平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他在上海视察中又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在视察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在以上这些论述中，邓小平正确地指出了计划和市场是配置资源、发展经济的手段。手段论的提出，以全新的观点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关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框框，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制理论的重大创新，也为社会主义能够利用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第三，异同论。

邓小平的市场经济观中，还正确地地区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点，他所建构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是基于市场、计划都是手段、方法，从而把市场经济同社会基本制度区分开来，以利于用这个有效的方法达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之目的。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异同时，他根据市场是手段的观点提出了市场经济为谁服务就是谁的属性的新见解；在经济运作方式上，二者基本相似，为此应大胆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同时指出了区别点，在邓小平看，最根本的在于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不同，在中国是公有制，“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用这种方法为社会增加的财富归社会所有，归全民所有。”

从邓小平对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异同的论述来看，既体现了他对市场经济一般属性的科学概括，又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属性的准确把握，从这些观点中我们还可以清楚看到邓小平市场经济观与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紧密相关联的，也即他所指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的市场经济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坚持公有制不动摇的，最终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达到共同富裕。

第四，开放论。

在邓小平的市场经济观中，还包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即开放论。在邓小平看来，搞市场经济就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是构成邓小平的完整的市场经济观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所主张的对外开放，是从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与世界经济沟通、接轨的要求相联系而提出的。在1988年，他曾提出我国价格改革最终要达到面向世界市场。1989年他在谈到计划和市场关系时强调：“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封闭性的国家。实行闭关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1992年他又指出：“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这些论述表明，他提出的对外开放，是中国搞市场经济必须面向世界市场的必然结论。

第五，改革论。

《邓小平文选》第3卷，306页。

同上，第364页。

在邓小平思想体系中，以市场取向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论，则在其思想体系中又处于关键性的地位。在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上，他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在所有制结构上，他提出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多搞点“三资”企业也不要怕；在利益关系上，他坚持要讲按劳分配，重视物质利益，反对平均主义，在坚持共同富裕前提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企业改革上，他强调要解放思想，大胆冲破老框框的束缚，采用更有活力的形式，鼓励企业搞横向联合；在金融体制改革上，他要求“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在论述市场经济时又一再强调“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观点。总之，邓小平的改革论，核心问题就是要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

2. 确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邓小平提出的市场经济理论，不仅冲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为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历史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确立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并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角度，来正确认识邓小平市场经济观的重要意义。

第一，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主要体现在：

——提出了社会主义存在着商品、货币、市场关系的观点。马恩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并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但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在生产力落后国家进行的，限制或否认商品经济与生产力发展滞后直接相关。邓小平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中把社会主义经济界定为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进而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商品、货币、市场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肯定了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的应有地位，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增添了全新的内容。

——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要以市场为基础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观点。在马克思经典作者原来的设想中，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在计划调节之下，整个社会经济就如同一个大工厂那样，是有计划生产、有计划分配的运行模式。我国长期以来也是照搬苏联模式，形成了以指令性计划为主、企业没有多少自主权、市场机制作用甚微的运行模式。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要以市场为基础的要求，以及他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都表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势在必行。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改革目标的历史性选择，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开辟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新天地。

——提出了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所有制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2、193页。

同上，第366页。

结构的观点。传统的经济理论十分重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错，但把所有制问题与生产力发展分割开来、孤立起来，主要从政治和价值评判角度来强调公有制，甚至作出“一大二公”等错误判断，自然就使传统的所有制理论失去了完整的科学性。邓小平坚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根据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实际情况，在正确提出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我国正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在其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构建中，打破了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模式的旧框框，正确提出了新的所有制结构的观点，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实践和有利于生产社会化、经济市场化的发展，重构微观组织形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全新见解。邓小平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史以来，对社会主义本质最为精辟的一次概括，其不仅内涵丰富，既包括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手段，又包括消灭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而且大大拓展了社会发展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视野。

——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前进的一般原理，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情况出发，正确提出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观点，他纠正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动力观”，提出了改革动力论，指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

——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观点。这是从分配上承认市场供求和价值规律作用，改革分配上“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做法的需要，也是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旧的分配体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多种分配机制共同起作用，这种改革思想的体现。

——提出了社会主义必须吸取全人类文明成果的观点。中国搞市场经济不开放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科学技术和资金不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应该说是借鉴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因此，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在对外开放中，大胆吸取全人类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从而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在不断丰富和充实自己过程中，使社会主义更好地发展成长。

第二，为我党确立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

正是在邓小平市场经济观的影响之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向世人宣告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邓小平认为这“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重申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内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页。

同上，第91页。

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邓小平在此期间，又多次论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论证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在 1990 年底至 1992 年初，他在多次谈话中系统阐述了他的市场经济观，其中核心的问题则是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应该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这样，邓小平以其市场经济观，为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在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促进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迅速发展，发挥了理论指导实践的巨大作用。

邓小平的市场经济观，既是对实际的理论概括，又是指导实践的科学指针。特别是经过 15 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的市场经济观是科学的。其一，有力地指导了中国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集中型向市场导向型的转换。这是坚持邓小平市场经济观、坚持改革开放的结果，并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

其二，在对外开放中促进了我国经济外向度的提高和外向型经济的成长。

其三，在中国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国力有了较大提高基础上，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保持着强劲的高速增长势头，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摒弃了教条主义，又防止“左”的盲目冲动，将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置于中国改革的指导方针的地位，从而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路子越走越宽，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也起到了科学导航作用。

3. 传统经济思想的根本变革

邓小平早在 1979 年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在当时，原有的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刚刚开始改革，人们开始感到我国原先照搬苏联模式的体制必须改革，但从何处改，怎样改，确实心中无数。一些理论家和领导人，对于这场前无古人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也是见仁见智，难以形成一致的看法。因此，改革中是放权让利还是市场取向，是一步到位还是逐步推行，是单项突进还是综合配套，一直成为人们所争论的问题。至于改革最后要达到什么目标，人们往往在纷纷议论中达不成共识。

由于习惯势力的影响，人们对市场经济长期持有偏见。即使那些颇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为了避讳，也往往以价值规律、市场机制来代替市场经济的说法。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经济体制的关键问题上，也即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把市场置于从属的地位。

邓小平自 1979 年提出关于市场经济的观点后，一直不懈地坚持，并就这些理论问题多次论证，在各种场合广为宣传，到了 1992 年春天，视察南方讲话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才开始逐渐理解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的道理。这样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上，

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中国改革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全党的共识，而且也为全国人民所认可，逐渐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邓小平，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才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这本身也说明了这一思想对于传统经济思想的根本性变革的力度；而且，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改变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揭开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新篇章，也必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与此相应，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就开始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商鞅变法，主张治国“能事本而禁末则富”（《商君书·壹言》），“本”者为农，“末”者指工商等经营活动，他明确认为“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商君书·外内》）。荀子也认为“工商众则国贫”（《荀子·富国》），提出“务本禁末”的口号（《荀子·君道》）。《管子》书也主张“务本而去末”（《管子·禁藏》），这一思想风靡战国时期，从而形成一大经济思潮。

重农抑商、事本禁末的思想及其政策，在封建社会的初期确有其积极作用。它反对农民弃农从商、舍农游食，对于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为新兴封建统治者牟取霸业创造物质条件是有意义的。但是，重农抑商，限制了社会经济活动在流通领域的发展，因而强化了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和保守性。然而，由于把农民固定于土地之上是封建剥削的基本条件，历代统治者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这一政策及其思想与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相结合，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所起的消极作用越来越大。

宋以后，商业逐渐发展，农商皆本的思潮也有所抬头。到了明清江南社会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在此时，西方世界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随后又发生了产业革命，为寻找海外市场的需要，不允许中国社会按自身的逻辑缓慢地发展，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

一些志士仁人在民族存亡之秋，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从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等都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甚至提出以商为本的口号，以图富国强兵，与西方列强抗衡。但是，在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举步维艰。

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雄心勃勃的中国工业化建设道路。必须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民族工商业十分幼稚，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的，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所预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它不存在商品、价值、货币、市场和竞争，基本的经济体制就是计划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依据的是马克思的设想，所学习的是苏联高度集中的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计划经济模式。毛泽东对于照搬苏联模式，“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决心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通过调查研究，1956年4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主张工

农业并举，主张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是，随后的探索却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推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作了这样的解释：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同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毛泽东在推崇人民公社之际，还曾号召人们读《三国志·张鲁传》。三国时代的张鲁，曾在陕西汉中地区建立一个农民政权，在社会制度上实行某种程度的公有公享，设置“义舍”，“义舍”置“义米”、“义肉”，行路者量腹取食。张鲁政权存在近30年。毛泽东赞扬说，他搞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由来已久了。显然，这种体制，就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推行的平均主义，当然排斥商品和价值规律。

为了说明毛泽东对商品和价值规律的态度，有必要指出他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看法。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际，毛泽东提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观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即毛泽东在世时根据当时的译文所称“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因为这个原则和资本主义商品的等价交换中的等量劳动决定等量价值的原则是同一个原则，都体现了交换双方的平等权利，并不意味着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毛泽东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不仅反映了他对商品的强烈排斥意识，而且还加以误解，把这种抽象的资产阶级权利同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模糊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同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的本质区别。正因为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倾向，使得陈伯达、张春桥等更极端地提出了废除商品和货币的“左”倾主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挫折使毛泽东对商品生产和交换、价值规律有了新的认识。为纠正1958年的“共产风”，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现在有些同志，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他还指出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阐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他批评“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指出要“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要整得头破血流”。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在修改刘少奇的工作报告时，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上述认识虽然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毕竟是向前走出了一步。

但是，不久毛泽东的兴奋点就转移到阶级斗争问题上去了，而且在他胸中所酝酿的，反映在“五·七指示”中的社会图景，亦工亦农亦军，过分强

调要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自给自足，集中反映了他否定商品分工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强调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他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对马克思关于计划经济思想的教条化、绝对化，又反映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根深蒂固的事本禁末的观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割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限制商品流通的发展，造成了我国经济体制高度集中，条块分割，效益低下，缺少活力的僵化模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空前发展，在中国几千年的经济思潮中更是亘古未有的，这是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根本性变革。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根本性标志，并将引起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的变革。

第七章 “第一生产力”与传统科技观

邓小平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中，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深刻研究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趋势，研究当代社会生产力构成的深刻变化以及中国社会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从而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思想的同时，极大地突破了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关科学技术的传统观念。

1.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唯物史观历来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总结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和19世纪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明确指出：“生产力当然包括科学在内。”他在《资本论》中，一再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他写道：“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有这样一句名言：“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他说：“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在唯物史观看来，科学究竟是怎样被“包括”在生产力之内的呢？众所周知，生产力是指人类在劳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影响自然的实际能力。通常，唯物史观在理解生产力这一范畴时，把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理解为构成生产力的三个物质实体性要素，而把科学技术，管理者的劳动积极性等，理解为生产力中的非实体性因素或“智力因素”。在现代科技革命发生之前，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理解为“一般的生产力”或“精神生产力”，科学本身还不属于“直接的生产力”或“物质的生产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要从“一般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要经过生产力系统中实体性要素的中介，主要通过四个途径：把科学知识物化到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上，改变生产资料的性质和水平；把科学知识物化到劳动对象中，改变劳动对象的状况和范围；用科学知识武装劳动者，提高并强化劳动者的智力和生产技能，把科学知识物化或对象化到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中的过程，也就是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与此相同，还要把科学知识转化到生产组织管理的手段上。上述四个方面的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5页。

机结合就使生产力呈现出新的结构，使生产过程不断地从较为简单的劳动过程转变为日趋复杂的科学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党和政府充分注意到了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和飞跃发展的时期。但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党内和社会上的某些“左”的思想，也在不同时候、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决策，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而阻碍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速度。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根本方面：一个是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另一个是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全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国防事业的全面展开，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需求非常迫切。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两项重大部署，一是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二是制订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对待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和轻视科学技术的倾向，深刻阐述了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明确指出“科学是关系我国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并且强调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领导。不久，周恩来又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现代科学大进军”的号召。1956年的这两项重大部署，给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惜，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曲折，党内和社会上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倾向又一度滋长。党中央不得不于60年代初，再次调整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

1962年，全国科学技术会议在广州召开，周恩来、陈毅、聂荣臻、陶铸等领导亲自出席会议，周恩来作了《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根据周恩来的嘱托作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为纠正当时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思想作了巨大的努力。不久，周恩来在向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1963年、在我国制定第二个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前夕，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毛泽东也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他还说：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只可惜，这些关于发展科学技术和对待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和主张，在以后的一段时间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所影响，甚至这种影响愈演愈烈，不仅使当时对待知识分子和发展科学技术的一些“左”的们差未能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反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占了上风，从而使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出现了不应有的严重曲折。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赞同并坚持了党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正确主张，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政策，并在实际工作中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页。

转引自江泽民：《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年5月24日。

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特别是 1975 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支持下复出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他领导的各项工作的整顿中，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了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9 月 26 日，他在亲自听取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汇报时，针对“四人帮”破坏科技工作的谬论，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气魄肯定了“汇报提纲”中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观点，强调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

1977 年邓小平再次复出以后，自告奋勇分管科学、教育方面的工作，把重新审查和确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列为他最为关心和直接指导的重要问题之一。从 7 月到 9 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对建国后十六年科学、教育两条战线的估计问题。他指出，“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还指出，知识分子“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并且号召全党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些讲话，揭开了科技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序幕，粉碎了“左”倾思想强加于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的沉重枷锁，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澄清了全党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的认识。

1978 年 3 月，在我国科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终于召开了，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从理论到实践，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我国科技事业的现状，阐述了科技在实现四化的伟大事业中的地位 and 任务，阐述了知识分子在向科技现代化进军中的重大作用，再一次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这篇重要讲话，对新时期全国科技工作的蓬勃发展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2.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传统表述已经不足以概括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不足以概括现代生产力和社会经济运动的本质特征了。因而，邓小平没有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现存观点上，而且还追踪现代科技革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也包括科学”的观点。

1978 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在现代，“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 年，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作用做了新的概括：“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在视察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再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道，“经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49 页。

同上，第 50 页。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87 页。

同上，第 87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75 页。

济要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那么，科学技术为什么说是现代第一生产力呢？

按照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科学技术在现代之所以是第一生产力，本质上是由于科学与技术、生产形成的一体化过程使得科学成为了现代社会生产的带头因素和动力基础，也就是说成为了现代社会生产中最重要因素所致。综观人类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我们看到，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主要依靠某一要素。从整个社会生产力角度看，一定历史时期相对突出的要素，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或者说，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第一”生产力。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第一”生产力。例如，在渔猎采集和农牧手工业的自然经济时期，人们主要是以体力与自然进行直接交换，或者依靠畜力、水利以及手工制作的工具进行生产实践活动。这一时期，第一生产力是自然力。17—19世纪，工业生产实践成为人类的重要实践活动方式，人类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伟大的变革。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是文明所创造的生产工具占主导地位，于是，大机器动力取代自然力成为第一生产力。在这一时期，虽然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生产力之中，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从科学发明到生产中的广泛运用仍然要经历很长的间歇，因此，科学技术还没有成为第一生产力。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科学已成为“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运行中最重要的部分。科学，首先是某些基础研究，成为技术和生产工业中某些最重大、最根本变革的根源，决定它们的性质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没有现代科学的发展，便没有现代技术、生产管理的产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正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准确反映。此其一。

其二，科学技术之所以是第一生产力，除了因为科学是现代社会生产中最重要因素之外，同时还取决于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周期的不断缩短。一般来说，科学是指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理论体系，它所反映的是客观对象和过程的本性，是客观事物“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而技术则是指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生产中介系统，它所解决的是人们在实践中应当“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例如，日心说、牛顿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都是反映对世界规律性认识的科学进步，而古代的石器制造、青铜器和铁器的使用，近代的蒸汽机、电力的出现，现代的电子计算机、激光技术、核能、航天工程等，则都属于反映生产技术不断完善的技术进步。在人类历史上，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尽管多次发生，但它们几乎都是平行发展而分别发生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加强，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的周期不断缩短，以至于科学和技术已经趋于一体化了。依据大量历史资料的统计，在18世纪，科学的发明到投产往往要用近百年的时间。例如，蒸汽机是1680年发明的，但直到1780年，它才正式试用。在19世纪，从发

同上，第377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7页。

明到投产的节奏开始加快：电话 56 年（1820—1876 年），电子管 31 年（1884—1915 年），汽车 27 年（1868—1895 年）。进入 20 世纪，情况发生明显变化：雷达从发明到投产用了 15 年（1925—1940 年），电视机用了 12 年（1922—1934 年），晶体管用了 5 年（1948—1953 年），原子能利用从发现原子核裂变到第二台原子反应堆只有 3 年（1939—1942 年），激光从实验室发明到工业应用仅用了 1 年，而近年来在微型计算机领域仅隔 6 个月就有新一代产品问世。所以，邓小平指出：“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儿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在当代，由于从科学发现到技术生产应用的周期不断缩短，节奏日益加快，以至于我们可以把科学看作是直接的生产力了。

其三，科学技术之所以是第一生产力，还由于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大。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地以科学“物化”的形式改变着生产力各要素的质的构成，它既延长了人类的四肢增加了人类的体力，也延长了人类的感官，延长了人类的大脑，从而全面地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正如邓小平所说，“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在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根据历史资料统计，在刚刚进入现代科技发展阶段的 20 世纪初期，科学技术在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仅占 5% 至 20%，到五、六十年代，其比重已上升到 50% 左右，而到 80 年代则高达 60% 至 80%。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现代科学技术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生产力。

其四，科学技术之所以是第一生产力，从更长远的眼光看，还因为科学技术水平是当今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它是今后国际间竞争的关键。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应用，一方面固然使世界性的交往和联系空前增强，但同时，它也加剧了国际之间在各方面的竞争。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主要是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而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又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谁掌握了现代化的先进科学技术，谁就会在竞争中取得主动权，处于胜利者的地位。毫不夸张地说，当代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成就，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且也是军事竞争的威慑力，政治竞争的影响力，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它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能力，是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目前，有许多资料表明，在 90 年代后期至下个世纪初期，将再次出现新的世界性的科技革命浪潮。在这次浪潮中，科学技术将会更加迅速地发展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以高科技为核心的科技竞争也将愈演愈烈，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说，将成为一种“新的生死存亡”之争，法国总统密特朗把它比喻为“现代战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则称之为“和平的战争”。邓小平也敏锐地指出：“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因此，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制定高科技发展计划，如美国的“SDI 计划”，西欧的“尤里卡计划”，经合会的“科技进步综合纲要”，日本的“振兴科技政策大纲”等，把发展科技放到了首要位置，极力促进它的发展。为了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中

参见陈志良、杨耕：《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第 178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88 页。

同上，第 87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79 页。

不至于落后，我们就必须顺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紧紧抓住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进行全民族的动员和长远的布局。“任何时候中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否则，就会失去时间与机遇。

邓小平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上述评价，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而且还从根本上澄清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时期对发展科学技术和对待知识分子的许多模糊认识，为我们党的正确思想同党内“左”的思想在这些问题上的长期争论作了历史性的结论，从而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扫除了思想政治上的障碍，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当然，邓小平对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关注，没有满足于他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作的理论阐释。事实上，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和实干家，邓小平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亲自领导和实践我国科学技术的变革和发展上面。在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科学技术又是第一生产力之后，为了使“第一”生产力的现实作用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战略思想，这些战略主要包括：明确肯定科学技术主要掌握者、运用者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各行各业都要关心科技进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造就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改革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引进外国的先进科技成果和科学管理方法，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正是在邓小平上述理论和战略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使我国科技事业获得了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根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开始引入科研工作，扩大了科研机构的自主权，改革了科技经费拨款制度，开放了技术市场，实行了科技成果商品化，创办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扩大了同国外科技界的交流。“七五”和“八五”计划、星火计划、“863”高技术发展研究计划、火炬计划、基础研究计划、攀登计划以及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等一系列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相继实施并已取得初步成效。核能研究、航天研究、超导研究、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农作物优良品种研究、生物和医药技术研究、工业技术研究、通信技术研究、磁流体发电研究、决策科学研究等重要科技领域取得重大成就。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回收、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的建成开放、超导材料的理论研究等一大批高科技领域还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极大地显示了“第一”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作用。实践证明，邓小平在倡导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开拓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新视野，其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3. 对传统科技观的发展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和实践，固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学说，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它还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关科学技术的传统观念。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撰写了七卷二十册《中国科学技术史》煌煌巨著，他感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把对于自然界的种种假设加以数理化，及其对先进技术的全部潜在影响，只是像晨星般地升起在伽俐略时期的西方呢？”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我们拟从科学技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中国科学技术的基本观念这两个角度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伦理主义倾向，“崇德”是最基本的特点。

春秋之际，有“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左传》文公七年）之说，正德为端正品德，利用为便利器用，厚生为丰富生活。“利用”，也可说是科学技术。《易大传·系辞上》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墨子更是在科技和生产工具的领域见长：“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鞮、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子·节用》）。但是，道家却持相反的观点。老子虽主张“甘其食，美其眼，安其居，乐其俗”（《老子》八十章），但不主张使用和发展新的工具，“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同上），庄子更认为“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庄子·天地》）。

对中国思想发展有着更大影响的儒家，虽不似道家那么极端，却也强化了道德。如孔子把“民信之”看得比“足食”更为重要，若在“信”与“食”之间去一个，那么就“去食”（《论语·颜渊》）。因此，儒家在对“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和”“日切磋而不舍”的同时，荀子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即使对自然的评价也贯穿鲜明的伦理原则。董仲舒说：“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地，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之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耻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必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春秋繁露·五道通三》），这里把人间道德赋诸天，又强调了人之德受于天，宋明理学更是强调“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朱子大全》卷四十）。

儒家不仅轻视对自然知识的探究，而且还把从事生产和工艺者视为“小人”之事。所谓“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主张“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乐记》）。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就是说，劳心者的君子关注的只是信义礼，以治小人；这样“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生产是小人的事，当然“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从而形成了鄙视生产和科技的心态。

第二，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观以实用为其发展目的。

中国文化贯穿着鲜明的“实用理性”精神，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除了具有满足现实社会的直接需要这一属性外，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以农为本”的观念指导下，总是局限于围绕农业生产的恒利和生活的实用目的而展开。贾思勰撰写《齐民要术》，声称“起自耕农，给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齐民要术·序》），甚至数学家也认为“术虽居六艺之末，而施之人事，则最切务”（李冶《益古演段·序》）。所以、天文、历法、算术、医药、农学等与农业生产和生活实用密切相关的

方面在中国古代有较高的成就，但纯粹的理论科学没有取得独立发展的地位，因为其与民生日用不直接相关而被作为“无用之辩、不急之察”、甚至是“奇技淫巧”而受排挤。正如章太炎所言：“我国民常性，所察在常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驳建立孔教论》）法国哲学家列·卢宾也指出：“就我们所知，东方的科学在它存在的这许多世纪之中，甚而至于和希腊哲学接触后，都从来没有超出实用的目标，以达到纯粹的思辨和演绎普遍原理的阶段。”由于研究目的、研究领域的狭隘，加之逻辑建构和演绎方法的欠缺，显然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难以跃升到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唯物史观认为，道德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是时代的产物。对于各种道德观念，应该用生产力标准进行评判，看它是否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绝不能用道德作为最高标准去评判和裁剪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而科学技术既然是一种生产力，那么，它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为了“崇德”才去“利用”、“厚生”，而是在“利用”、“厚生”的过程中去“立德”去“正德”。另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也表明，那种对科学技术所采取的狭隘的、短视的“实用”观点，往往会扼杀那些与民生日用不直接相关或暂时不相关的科学学科和科研项目，从而造成基础理论薄弱，发展缺乏后劲。

邓小平以生产力标准思想为根本前提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从根本上破除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观那种以“崇德”为价值取向，以实用为发展目的的陈旧模式。它在积极继承了传统科学技术观强调科学技术应当服务于生产发展，服务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合理成份的基础上，综合地考察了生产力的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以及生产力各要素的全面发展，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科技进步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例如，在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问题上，邓小平曾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对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观是一个质的飞跃。

转引自《哲学与文化视野中的科学》，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3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79 页。

第八章 “三个面向”与传统教育理论

邓小平十分重视教育。1977年5月，他在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1983年，他在为景山学校的题词中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1988年，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自然更是重视教育问题，把教育置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战略地位。邓小平的教育思想内容丰富、意义深远，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思想，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使中华民族的教育思想具有了崭新的特征。

1.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0年编辑的《邓小平同志论教育》，开篇是邓小平1951年1月18的一次讲话，其中指出：“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教授有威信，解放以后就需要有本事、能为国家建设做事的人，民主教授就不够了，北京就有这种经验。今后为国家建设服务依靠学本事，因此要解决学校问题，基本在于能否团结大量有学问有能力的教授，这是检查学校工作的标准。”他主张，“真正有本领的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医生，以及其他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工资待遇，应该提高。”1958年，邓小平在当时勤工俭学、职业中学大量发展的形势下，强调了教育的提高问题，他指出，学校劳动，不能影响学生的学习，并提出：“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有批学生基础课学得好，否则将来要吃大亏。”上述论述表明，邓小平很早就重视教育问题，尤其强调人才和知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重新出来工作以前，与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强调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后，他反复地强调这一观点。1984年10月，他在谈到当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他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

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以后，“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对教育问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页。

同上，第275—276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第2页

同上，第5页

同上，第18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92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8页。

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977年8月4日至8日，他亲自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9月19日同教育部主要领导谈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问题；在他的建议下，1978年4月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以后，他始终对教育领域有着特殊的关怀。他表示，“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他还多次表示“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

邓小平在教育领域大刀阔斧地就一些方针性的问题作出了重要的决策：

第一，果断否定“两个估计”，开始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领域备受摧残。1971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由迟群起草，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会议纪要荒谬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是所谓的“两个估计”。“两个估计”的出笼使教育事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和教师队伍受到严重摧残，它使得广大知识分子成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学校教育强调上阶级斗争主课，批判所谓的“智育第一”和“师道尊严”，造成了“读书无用”的不良风气。

邓小平在1977年8月8日的讲话中首先提出了关于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领域的估计问题。他说：“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9月19日，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并批评教育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号召他们要敢于讲话。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决定撤销1971年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等文件，推翻了“两个估计”的错误结论。

第二，立即恢复高考制度，掀起学文化、学知识的热潮。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全国高校招生停止了6年之久。到1972年全国大多数高等学校恢复招生，招生对象是“具有2年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0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1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9页。

同上，第67页。

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不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生方法取消了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招生条件把“政治表现、路线觉悟”放在首位，重视实践经验，甚至把交白卷的树为英雄。这样，形成了鄙视文化学习的社会风气，造成了人才奇缺，后继乏人的严重局面。

1977年8月，邓小平果断地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呢，邓小平认为：“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到大学以后，重点是结合学习搞对口劳动。”关于招生条件。邓小平的意见是：“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从而掀起了学文化学知识的热潮。邓小平还指出，对考试也要进行改革，他说：“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完善起来。”

第三，关心教师的生活待遇，以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

“文化大革命”时期，“两个估计”把知识分子定性为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高级学者更是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成为打击的对象；在学校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号召学生“反潮流”，大批“师道尊严”，教师几成为一种人人鄙弃的职业。

邓小平指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认为：“就今天的现状来说，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所以，“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恢复职称，在邓小平看来，是一个很大的决策，会引起震动，他指示：“大专院校也应该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他还特别重视提高教师的生活待遇问题，他指出：“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限于国家的经济力量，我们一时还难以较大地改善教职员工的物质生活待遇，但是必须为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5页。

同上，第67—68页。

同上，第69—70页。

同上，第105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9页。

同上，第49—50页。

同上，第109页。

同上，第70页。

积极创造条件。”

第四，抓重点学校建设，以推动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办重点学校，是建国后我国在教育工作中所采取过的一项重大措施。195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工作，经毛泽东提议，会议决定，“要办重点中学”。1953年6月，教育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全国重点中学194所，占全国中学的4.4%。

1958年以后，毛泽东为了加速发展教育，又提出了采用群众路线的“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其内容有正规学校与非正规学校并举、学校教育 with 自学并举及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等办学并举等等。其内涵非常丰富，概而论之，一是“使文化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强调教育的普及方面；二是使理论与实践、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三是使社会与学校融为一体。这一设想是很有意义的。但是，1958年至1960年一哄而起的群众办学，降低了教学质量，也超越了国民经济的负担能力。

60年代初，教育事业处于调整阶段。当时教育部主张有重点地办好一定数量的全日制中小学，以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强调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拔尖”学校。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也走向了极端，进而否定了重点学校建设的设想。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中主张把社会变成一个大学校，人们在这个大学校中“亦工亦农、亦文亦武”，从而必然导致取消或轻视学校教育。林彪、江青等更诬蔑“小宝塔”是“资本家开学店的翻版和发展”，办重点学校“无非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一批用起来得心应手的精神贵族”。重点学校受到了摧残。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即《七二一指示》）中指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指示，这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学办学的方向。文化知识的学习，尤其是基础理论的研究受到严重的削弱。

针对这一现状，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确地去理解。七二一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各省自己去搞，办法由他们自己定，毕业生不属国家统一分配范围。但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恐怕不能这样办，并不是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邓小平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不仅要重视与生产有直接联系的理论，而且还要重视基础理论。所以，邓小平在谈到“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时，强调的是提高，主张办重点学校。他说：“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大学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在大专院校中先集中力量办好

同上，第109页。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年），第167页。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

1967年7月28日《人民日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8页。

同上，第40页。

一批重点院校”；“为了加速造就人才和带动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的建设，尽快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并提出，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

第五，提出教育必须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观点，把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以后，他又说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正确地阐述了教育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但是，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出现，在教育工作方面往往突出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而忽略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所以，长期以来，国家的计划工作中，经济发展的投入与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的投入比例失调，限制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极端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教育领域首当其冲受到这场运动的冲击，备受摧残。

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所以，他自告奋勇地抓教育工作。显然，邓小平十分重视教育和经济的关系。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论述了关于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我们培养训练专门家和劳动后备军，也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周密的计划。我们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这里，邓小平把“培养训练专门家和劳动后备军”作为教育的最基本的职能。因此，“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这也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根本要求，“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关于教育事业计划的制定，邓小平也有具体的论述，他认为要扩大农业中学、中专、技校的比例，要研究高校的专业结构，要重视现代化的教育手段，要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学校的建设等等。可见，毛泽东关于“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在邓小平这里有了新的意义。

教育必须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这就必然要求把教育的发展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在谈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时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因此，他说，

同上，第54页。

同上，第108页。

见《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第39页[注]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6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8页。

同上，第107页。

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以后邓小平还多次强调要从战略高度考虑教育问题，他指出：“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更是把教育的发展置于一个首要的地位。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精神，1982年，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1987年，党的十三大更明确指出要“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2年，党的十四大继续强调“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现代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基于这样的认识，党和政府对教育事业比较重视，虽然财政困难，仍千方百计增加教育经费，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第六，提出了培育“四有”人才的要求。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期间，由于简单地把教育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单纯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的一个方面，忽视文化科学教育，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对“智育第一”、“师道尊严”，崇尚“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所谓“反潮流”精神，不仅造成了大批文盲，而且也使社会道德普遍沦丧。

邓小平主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教育的任务就在于培养人才。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鉴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关于“红”与“专”问题上的思想混乱，邓小平首先强调“红”必须体现在“专”上。他说：“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

“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所以邓小平强调：“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

鉴于“‘四人帮’对教育事业的破坏，不仅造成科学文化的教育质量惊人下降，而且严重地损害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败坏了学校纪律，腐蚀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风气”的情况，强调“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他说：“我们要大力在青少年中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0—121页。

同上，第275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3页。

同上，第104页。

同上，第92页。

同上，第94页。

同上，第262页。

同上，第105页。

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成为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志地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

根据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新特点，邓小平提出了培养“四有”人才的目标。1980年5月26日，他在书赠《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时提出：“希望全国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这年12月，邓小平论述了精神文明问题，他认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的关系，等等。”他强调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根据邓小平的论述，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培养“四有”人才的目标。邓小平说，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方面就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以后，他又强调：“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

邓小平关于培养“四有”人才的论述，是毛泽东关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2.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邓小平1977年重新工作以后，自告奋勇抓教育，作出了一系列的决策，并形成了较系统的教育思想。他在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原则、师生关系、教学法和办学方针等方面，都有全面的论述。

邓小平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科学技术要由人来创造发明，更要由人来掌握使用。这就需要教育，需要通过教育把科学技术转化为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更高了，不仅要求劳动者掌握基本的劳动技能，还要掌握现代生产技术，而且脑力劳动在现代化生产中的比重将会不断增加，必然对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教育的目的，首先是为现代化的建设提供人才。邓小平说：“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的任务。”在首先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的同时，邓小平也重视教育的道德教化功能。他要求思想品德教育从小学开始抓起，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全面发展的新人。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6页。

《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第111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

同上，第36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

同上，第110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1页。

从哪些人中培养“四有”人才呢？关于教育的对象，邓小平首先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忽视科学文化知识，极端重视“政治”、尤其是阶级成份的“左”倾做法，主张看本人表现，通过文化考试择优录取，把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作为学生入学的重要条件。邓小平还主张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以适应高科技发展的社会要求。

以培养“四有”人才为目标，教育内容自然也包括红与专两个方面。循着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他首先强调的是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并认为自觉、刻苦地学习科学文化是政治觉悟高的重要表现。同时，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他提出，“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要求整个社会都来关心青年的思想政治进步。他在阐述“四有”人才的过程中，逐渐提出了理想教育、纪律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艰苦奋斗教育等行为规范的教育内容。

如何培养“四有”人才，在教育原则上，核心是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以致用、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同时，他又指出：“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他认为最根本的是要使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才能学以致用，调动学生学习和劳动的积极性。

在教学法问题上，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教师地位低下的现状，首先提出了尊师重教问题。他认为，“尊师爱生，教学相长，这是师生之间革命的同志式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强调要重视教学法，要研究如何提高教师的水平，加强师资培养，要重视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此外，还提出“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的作用完善起来”的任务。

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邓小平提出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战略和办学方针。其一，邓小平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坚定信念出发，强调了我国现代化的建设，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发展必须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的观点，所以，要求整个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各级领导要从战略高度重视教育问题，改进教育的投入；其二，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在当前的条件下，“为了加速造就人才和带动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的建设，尽快提高它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其三，主张多层次有计划地办学，适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多层次的专门家和劳动后备军，在当前的条件下，要努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多方面的要求。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5页。

同上，第107页。

同上。

同上，第109页。

同上，第55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5页。

同上，第105页。

同上，第108页。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题词，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辟概括，同时，也指出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战略方向。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这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新时期教育改革的根本任务。首先，这要求教育为现代化服务，这是生产力标准的历史观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在教育思想上的具体体现。邓小平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对象直至办学方针等等思想，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展开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培养人才来为现代化服务的，教育要为现代化服务，这就要求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在质量、数量、结构上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其一要培养足够数量的具有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这是现代化建设的最基本的要求；其二，不仅要为物质文明建设服务，而且要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这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其三，在传授新的科学知识的同时，努力发展学生的能力，尤其是创造能力和学习能力，这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条件下的必然要求；其四，还要培养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人才，使人才结构适应于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对人才的需要。针对上述要求，邓小平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论述，这也是目前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面。

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了教育本身的现代化问题。邓小平说过，要“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还要求“制订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现代化的教育包括现代教育观念、思想，现代化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以及现代化的教育设施。只有现代化的教育，才能很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教育改革的基点。

教育要面向世界。这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特点在教育思想上的体现，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也是目前教育改革的基本要求。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以改革、开放为其动力和条件，为现代化服务的现代化的教育，必然是面向世界的教育。邓小平首先比较了美、苏两国和我国科技人员数量的悬殊差距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注重教育的事例来说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性。他十分注意借鉴国外的经验，例如，1977年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讲到：“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邓小平教育思想本身是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体系。

面向世界的教育，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就是要培养能参与国际竞争的现代化人才。这样的人才应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适应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世界大势；应有正确的开放态度，善于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应具备与外国人交流的能力，如熟练地掌握外国语等等。

面向世界的教育，从现代化教育本身的要求来看，还要从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等方面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敏锐地了解国际上关于教育观念、目标、课程和方针等方面的改革趋势，例如在教育观念上的教育先行、个性发展、高质量教育、终身教育。教育信息化、教育国际化等思想，以推进我国的现代化教育。教育内容上也要善于吸取国外的先进知识。邓小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4页。

同上，第108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9页。

平说：“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因此，这就要求加强学术上的国际交往、交流、合作，采取互派教师和留学学生等方法，以加速我国的教育发展。

教育要面向未来。这是高科技社会对教育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并且是目前教育改革要十分重视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教育“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教育必须考虑到未来科技、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尤其是未来科技发展的特点。他说过：“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现在起就要开始搞。”所以，“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邓小平教育思想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战略设想。

面向未来的教育，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就是要求教育为未来的发展储备人才，使人才有充分的能力适应未来科技与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更新、激烈竞争的趋势。近几年来，国外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和教育家纷纷认为，即将来到的21世纪，将是教育的世纪，各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实质就是教育的竞争。所以，自本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世界各国相继掀起了教育改革的高潮。所以，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必须重视教育，必须从现在的娃娃抓起，必须要求教育以最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和更新受教育者的知识和智力结构，使受教育者具备适应高科技社会发展的各项素质和能力，以及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全面发展的新人，支撑未来的社会。

面向未来的教育，从现代化教育本身的要求来看，不仅要求优先发展教育，而且还要求教育的发展要有超前性，要加强对教育未来学的研究，强化教育顶测和教育规划，促进教育的改革，适应未来社会的要求，推进教育的社会化和个别化，如终身教育，回归教育、成人教育等，使人们能不断丰富和更新自己知识和智力结构的需要。

1986年，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等人时指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把教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系着民族的存亡和盛衰。我们应该深长思之，邓小平的教育思想，指导着我国新时期的教育实践，推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为我国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与改革提出了战略方向。

同上，第158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8页。

同上，第10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4页。

同上，第274—275页。

3. 对传统教育观的发展

中国自古重视教育。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被描述成我国最早的教育家。《孟子·滕文公上》中提到，中国远古时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教育已有一定规模。《礼记·学记》中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大学》中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基础就是“格物致知”，因而必重教学。儒家认为“内圣”（道德修养）和外王（事功）的入手之处就在于教学，所以，传统教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具有自己民族的独特的特点。在古希腊，教育所重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东，教育所重视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在中世纪的欧洲，教育也从属于宗教。中国传统教育，自古以来，就重视人与人的关系。

《论语·子路》中有樊迟学稼的故事，孔子的态度明确表明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重视。孔子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他认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论语·先进》中还有季路问事鬼神的故事，表明了孔子对“事鬼”和“知死”的宗教内容的淡漠。

所以，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关于教育内容，其核心是政治道德伦理。“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教人以学文修行而存忠信也”（朱熹《论语集注·卷四》），学问的根本在于道德。

关于教育目的，在于培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君子，其境界是“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培养君子，服务于社会政治。

关于教育对象。孔子说：“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这里所谓的“类”是指贵贱、尊卑的等级类别。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孔子时代，“学在四夷”。“有教无类”的实质，把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了平民，所以，孔子的学生成分是复杂的。孔子以后，中国的私学、书院，甚至私塾和科举等，没有严格的等级身份限制。

关于教学原则。孔子认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历代学者多有阐发。如朱熹的“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王夫之的“力行而后知之真”，颜习的“习行”等等。都十分强调实用和实践的意义，只是程度或角度不同而已。

关于教学法，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提出了启发式教育、因材施教和教学相长等观点，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学记》中谈到，“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学记》中还提出：“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关于教学法及其师论，我国历代教育家都有大量论述，具有极丰富的内容。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传统教育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斯诺在《革命在继续》中提到：“毛泽东说他的一生是从小学教员开始的。”毛泽东早年在康

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下，深信“以教育为主脑”之说，主张教育救国，并选择了师范学校作为自己职业的起点。五四前夕，毛泽东组织了新民学会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但在1918年8月11日，他在致罗学瓚的信中谈到：“弟与蔡（和森）君等往返商议，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可见，这是毛泽东没有与蔡和森等一同赴法的原因之一。他留下后，先后在修业和一师附小任教，这就是他所说的一生的开始。以后，毛泽东虽然放弃了教育救国的主张，转而信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但在革命时代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仍一直关注着教育问题，几乎没有终断过他的教育实践活动。把教育看成是革命和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也反映了传统文化所谓“治国君民，教学为先”的重教的特点。

毛泽东十分重视传统教育思想。1921年，毛泽东在他所拟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指出新式学校的三大缺点是：一、师生间没有感情；二、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三、钟点过多，课程过繁。而中国传统书院虽然研究的内容陈旧，但从研究的形式看，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其好处是：“一来，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建国以后，毛泽东仍然肯定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1958年8月16日，他在审阅陆定一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时，增写了一段文字，其中强调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第一个例子就是孔子的有教无类；8月22日，他在致陆定一的信中指出：“中国教育史有好的一面，应当说到，否则不全。”1964年2月13日，他在春节谈话中再度肯定孔子教育思想中有好的一面，并提出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了。

毛泽东教育思想多方面吸取了传统教育思想的内容。例如，关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教育内容上重视德育教育、要求处理好红与专的关系，在教育目的上明确了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任务，在教育对象上强调为广大工农子弟的入学创造条件；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教育原则上强调实践和功用的意义，在教育方针上主体德、智与体的结合；关于启发式教育，在教学法思想上更是主张师生的平等，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的发挥；关于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要求把正规学校教育和非正规学校教育结合起来等等，都明显反映了传统教育思想的特点。当然，毛泽东教育思想不是传统教育思想的一味承袭，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对传统教育思想进行了改造，例如马恩等关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论述，关于工厂教育中教育与生产结合的未来学校萌芽的论述等等，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毛泽东对传统教育思想的缺点也进行了批评。例如，毛泽东多次批评了孔子对于樊迟学稼的态度。所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既是中国传统教育原则思想关于“知”与“行”的关系理论的发展，同时也纠正了传统教育内容思想中轻视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的知识的学习和传统教育目的思想中轻视体力劳动者的缺陷。

必须提到，毛泽东晚年在“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教育革命”则走向了极端。德育被归结为“上阶级斗争主课”，不仅智育受到贬斥，而且造成了道德水平的下降；关怀工农子弟入学变成了唯成份论，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理论联系实际走向了轻视书本知识；主张师主平等变成了反对“师道尊

严”；“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变成了以非正规学校取代正规学校。上述错误源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也典型地反映了传统教育思想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在社会政治中的首要意义的思维定式以及过于重视直接经验和直接功用等弱点。

邓小平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继承。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想，认为红与专要统一起来、红要体现在专上；认为恢复高考有利于多出人才、早出人才，政审不搞唯成份论；认为要提高教师的地位，要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认为大学不能办成技校，要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等等。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精华，认为教育方针仍然是德、智、体的全面发展，政治思想教育仍然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认为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相长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等等。

邓小平教育思想对于毛泽东教育思想有了重要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第一，邓小平不再执著于教育的政治伦理意义，而强调教育的经济价值。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而教育是科技发展的基础，所以，他把教育看成是经济发展的重点。第二，邓小平没有固执于教育的抽象平等，而是强调教育的效率。他主张“为了加速造就人才和带动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的建设，尽快提高它们的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第三，邓小平在师生关系与教学法思想上，既重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十分强调教师教学的主导性意义。他特别强调尊师重教，强调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第四，邓小平既重视劳动技能的教育，又重视基础理论的教育，他认为在当前的高科技时代，基础理论的学习是极重要的。他主要是从培养劳动后备军的角度来论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并主张多层次办学，使教育事业的计划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结合起来等等。这些方面是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邓小平教育思想也是传统教育思想的升华。他关于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观点，其重要的文化意蕴在于弘扬了传统教育思想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学问见诸于躬行和启发式教育、尊师重教等长处的时候，突破了传统教育思想中以伦理为本位的思维定式，克服了忽视书本知识、过于重视直接经验和直接功用的小生产时代的局限，从而为我国的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7页。

同上，第68页。

同上，第54页。

第九章 “二为”方向与传统文艺思想

一般说来，科学求真，道德求善，文艺求美。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教育自然是科技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教育还包括着思想道德的教育，这也是邓小平所历来强调的。文艺能唤起人的审美体验，使人的整个心灵得到深刻的触动、强烈的影响和全面的滋养。邓小平说：“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一直关注着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在新的历史阶段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学艺术创造的指导方针。邓小平的文艺思想，是建立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它纠正了一度出现的“左”倾文艺路线，使毛泽东文艺思想得到健康的发展，并使得传统的文艺思想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1. 重视文艺工作，尊重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

邓小平对文学艺术有相当程度的爱好。据老同志回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时，在身边带有一些法文原版小说，如罗曼·罗兰、巴尔扎克、雨果等人的作品，战斗间隙就拿出来欣赏。70年代初，在下放江西期间，当他得知《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四大古典名著重新出版时，甚感欣慰，马上购来阅读。而且，邓小平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从事过不少与文化以及文艺有关的工作，如留法期间编辑出版《赤光》杂志，30年代前期先后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红星报》主编、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还担任过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务，在这些工作中，他的文艺思想直接地或间接地反映出来。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形成具有历史的延续性。

早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邓小平就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赤光》杂志的编辑，从撰稿、编辑到刻印，邓小平都热情认真地干。这份杂志在注重理论宣传以外，也充分利用了文艺形式，发表了一些诗歌来歌颂革命浪潮。30年代初，他在担任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时，对文艺也很重视，专门设了文艺副刊《山歌》、《红军歌曲》等栏目。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在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中，开始对文艺的作用进行了论述。1938年初，他在一篇关于新兵政治工作的文章中指出，征兵工作做得较好的地方，一个“可贵的经验”就是“在那里，进行了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了各种宣传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的飞行演讲、个别谈话等等方法，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和生路，揭露敌人的残暴。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地激发起来，自动加入军队的踊跃，是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

1941年6月，邓小平发表的《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这是一篇重要文献。在这篇文献中，第一，邓小平提出：“要同一切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

曾克：《信任与力量——琐记刘邓关心知识分子的事迹》，《红旗飘飘》第28辑，中国青年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页。

轻视文化工作的倾向作斗争”，他批评某些单位“对文化工作者的创造性发挥得不够，同时对后起的文化工作者的培养工作也做得不够，致使今天部队有文化干部荒的现象，使连队文化宣传工作受到影响。”

邓小平十分重视文艺工作，并充分尊重和爱护文化人。据回忆，抗战胜利后，新建立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在选配干部时，刘邓特别欢迎知识分子干部去工作。在欢迎作家时，邓小平称晋冀鲁豫缺少知识和知识分子，是贫瘠的地方，欢迎文化人来此垦荒，播种。他诚恳地希望作家们把自己的想法和要求说出来，表示凡能办到的事，决不吝啬。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邓小平在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一份文件中，针对忽视宣传文艺工作的现象指出：“历来的经验证明，展开充分的宣传活动，扩大党的全部正确政策的宣传，揭露敌人的欺骗和罪恶，首先在群众中建立和占领思想阵地，这对新区战胜敌人与发动群众关系极为重大，而我们则相当普遍地忽视了宣传工作。比如我们在大别山，不是加强宣传队、剧团、文化工作的组织和领导，而是把这些机构的干部分散去进行土改工作，以致失去或减少了他们的作用。”

第二、邓小平指出，文艺工作者要“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在此立足点上，邓小平要求“应克服文化工作不大众化的现象”，他指出：“文化工作者不够群众化，尚缺乏部队工作和群众工作的经验，致使文化工作被限制于狭隘的范围中，不能为大众所掌握”，“不为群众所熟悉所喜闻乐见”。要使文艺大众化，就“要将自己的作品就教于大众，顺听大众的意见”，“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大众化”。邓小平还认为，“采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因旧形式在民间具有根深蒂固的潜势力，深为群众所喜爱，且其本身亦有可利用的价值。”

第三，邓小平认为，“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所以，“文化工作者要不断加强自己在政治、文艺方面的修养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只有提高政治素养，才能提高对文化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丰满的现实性之艺术品，才能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这里，邓小平强调了文艺离不开政治，但是并不忽视文艺的艺术性方面，并且他把政治素养统一到高度的艺术价值上来，这一观点是值得重视的。

建国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前，邓小平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不多。但是，他十分关注文艺领域的发展，对文艺领域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批评，并在实际工作中做了纠“左”的努力。

自1958年以后，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文学艺术领域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首先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充满幻想的“新民歌”风靡一时，在此背景下，1958年春，中国作家协会提出了文学跃进计划，提出过高的创

《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128页。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13页。

同上，第25页。

同上，第26—27页。

同上，第28页。

同上，第27页。

同上，第22页。

同上，第28页。

作指标，强调配合中心任务。这一年还开展了对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大批判。1961至1962年上半年，随着“大跃进”以后经济政策的调整，在周恩来，陈毅等同志的努力下，也进行了文艺政策的调整，但好景不长，1962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阶级斗争作了更严重的估计。1963年，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对以建国前和以历史题材为内容的作品加以否定。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写了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指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写下了第二个批示，更加严厉地批评文艺界，他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此后，对《李慧娘》、《谢瑶环》等许多戏曲，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许多电影，对所谓“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等文艺理论观点，公开进行政治批判。到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在“文革”期间，文艺领域更是重灾区。1966年2月，林彪请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作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断言：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从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政治批判，大批的文艺工作者遭到了残酷的打击。而且，在江青的把持下，由于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文艺园地上除了几个“样板戏”之外，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几乎都被当作“封资修”的毒草禁闭了，形成了一片荒芜的景象。

建国之初，邓小平先在西南局主持工作，1952年调中央。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1956年春天，毛泽东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文艺与学术的指导方针，邓小平坚决支持。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周恩来、陈毅等主持文艺政策的调整，邓小平也是赞同的。关于创作题材，周恩来说：“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但有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人民创造了许多他们理想的人物，如武松、穆桂英等，还有不少神话，都可以写。”并且认为，“演历史剧也可以表现时代精神”，这是对只强调标语口号式的反映中心任务倾向的批评。1962年9月29日，在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扬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编一点历史戏，使群众多长一些智慧。1965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纠正北京大学社教运动试点中的“左”倾错误的会议上讲到文化思想领域当时的状况，说：现在人们不能写文章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页。

同上，第411页。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2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8页。

《周恩来论文艺》，第112页。

见戴知贤著《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被打倒。1973年重新恢复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要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所主持的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也包括文艺工作。1975年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说：“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针对“四人帮”践踏“双百”方针的行径，邓小平说“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这一年，在邓小平的亲自干预下，电影《创业》和《海霞》由禁而放，同时还亲自批准解放了一批被江青一伙长期禁锢的影片。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在原有基础上，尤其通过对“文化大革命”包括1958年以来“左”的文艺方针的深刻总结，和对新的时代条件的敏锐把握，而日趋成熟。1979年，邓小平在其所作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一文中，就重视文艺工作、尊重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随后，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针对文艺工作中的各种问题，邓小平又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使他的文艺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2.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针对文艺作为文化现象特别是审美文化的特点，从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文艺建设需要出发，阐述了文艺的社会作用、价值取向、内在规律、发展条件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较系统的文艺思想。

第一，文艺工作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

邓小平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这番话就是在四届文代会祝辞中讲的，文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的触角伸向文化涉足的每个领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着社会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族的精神、风貌、情感的变化，并对整个文化结构起调节作用，促进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所以，邓小平指出：文艺工作者要“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文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文艺具有认识功能。文艺通过生动具体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并且可以反映人们难以亲临其境的各个角落。人们能够从中扩展视野，启迪智慧，增强文化素质，提高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能力。文艺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认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2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页。

同上，第37页。

[注]：本节论述，参考了《邓小平文化思想研究》一书的有关内容，见《邓小平思想研究》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1—808页——特注。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

同上，第209页。

识社会，还能够帮助人们认识自身，认识自己的思想、灵魂、自己的内部世界。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生活、民族心理发生了种种变化，社会及人生的种种问题需要人们认识和思考。文艺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参与社会、思考人生的渠道。

其二，文艺具有教化功能。艺术的教育作用主要是对情感的升华作用，人们通过欣赏文艺作品，以自己的情感体察别人的情感，从中不断地丰富和充实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种种感受，使自己的情感不断加深，境界不断提高，胸襟更加开阔，并获得人生哲理的启悟。邓小平说，“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他还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

其三，文艺具有娱乐功能。娱乐作用是文艺所特有的社会功能，文艺作为艺术家所创造的一种艺术美，它能给人们以精神上的愉悦，因而也就具有一定的娱乐价值。文化娱乐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它能够使人从中得到充满欢愉的休息、抚慰心灵的创伤、丰富社会知识，对于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以，邓小平认为：“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

第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出，蕴含着邓小平等同志对几十年来我国文艺发展曲折道路的沉思。在1979年以前，根据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一般都提“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在五、六十年代，由于政治上的失误，“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副产品，演化为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文革”结束以后，党和文艺工作者开始重新思考文艺方向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经过半年的讨论，1979年10月，胡乔木在一次讨论第四次文代会的会议上，建议不要继续采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10月30日，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祝辞》中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他说，“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210页。

同上，第209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

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2期，第72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3页。

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显然，这里没有再用“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提法。

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谈到文艺问题时，又说，“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5月，王任重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说，“关于文艺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怎么提法的问题……如果说得扼要点，是否就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党中央正式确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这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社论说，“最近，党中央提出，我们的文艺工作总的口号应当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是在文艺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总结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工作指出了正确方向。”社论对这一口号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为人民服务，就是为除一小撮敌对分子外的全体人民群众，包括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干部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热爱祖国的人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根本需要服务，在今天，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服务。”

“二为”方向为文艺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1981年，胡乔木说过：“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二为”方向的提出，种种清规戒律被破除了，艺术家们的积极性、创造力，勇气和责任感空前提高，新时期的文艺取向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宏观性、历史感、恩辩性和开放性。1983年，邓小平谈到：“文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艺术的表现力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诗歌、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各个方面，都出了一批优秀作品。”

“二为”方向虽反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同时也不意味着文艺可以脱离政治。邓小平说：“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首先，“二为”方向反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特别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要求文艺坚持社会主义总的政治方向 and 基本原则。当前最大的政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为”本身蕴含这种总的政治方向。邓小平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四个现代

同上，第210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5页。

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2期，第72页。

《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32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9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5—256页。

化的建设做出贡献。其次“二为”方向反对脱离现实和历史的政治观念的图解，而要求文艺真实地描写政治生活。一些作品之所以引人注目，固然有其艺术魅力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它富有深沉的政治社会学意蕴。再次，“二为”方向反对远离于文化大系统的革一的、孤立的政治选择，而要求文艺反映整个社会生活。可以是政治斗争，也可以是经济生活，也可以是道德冲突。而且，只要不违背国家法规，那些思想上无害、艺术上可取、能给予人们的艺术享受和娱乐的作品都应允许存在。最后，“二为”方向反对无限夸大文艺的社会功能，只能赋予文艺能够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能给文艺加上它不能负担的任务。所以，“二为”方向，也是对近年来出现的“离开政治越远艺术性就越高”的“艺术至上”倾向的批评。

“二为”方向既强调了文艺工作者主体性，又加重了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邓小平说，“文艺界刚开了文代会，我们讲，对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就加重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对自我的要求。”针对自由创作环境中，文艺界出现的不顾社会效益的倾向，邓小平指出：“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他还对“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的现象提出了严肃批评。“二为”方向，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使社会主义文艺成为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扩展人们的视野，提高人们的精神品位，振奋人们精神状态的文艺。

第三，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邓小平进一步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思想，提出了“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这一观点。他指出：“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艺术家就必须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邓小平说，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艺就必须充分地表现和歌颂人民。邓小平说：“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但是，有人“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国的就是‘自我表现’”。文艺不等于现实，是艺术家的创造，它当然离不开“自我”，但是，文艺如果成为蛰居于“自我”小

同上，第 209 页。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55 页。

同上，第 256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2—43 页。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11 页。

同上。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11—212 页。

同上，第 209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3 页。

天地的个人渲泄，这就不对了。长期以来，文艺只能按照“总的精神”来图解政策，艺术家的创作个性，自我感受完全被抹煞殆尽。“文革”以后，艺术家们自然会强烈地要求充分发挥他们的创作主体性。但是，把“自我表现”推崇为文艺的最高目的，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艺术家应当把自我融合到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中去，他的喜怒哀乐、抑扬褒贬也应与人民息息相通。这样，他要表现的“自我”，也就是人民群众的“自我”的具体的、个性化的表现。

人民是艺术工作者的母亲，艺术就应当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邓小平说：“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当前文艺工作者需要确立人民是文艺的主人的文化观念，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标准，为人民提供更多的优秀的精神食粮。

第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鉴于历史经验，邓小平一再强调“双百”方针。1978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1979年3月，他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强调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不允许有丝毫动摇”。1980年1月，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在批评文艺创作中的错误倾向时，仍一再强调“双百”方针是不会改变的。

“双百”方针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邓小平说，“‘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双百”方针的具体内容，也就是“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它是艺术之花的争奇斗艳，是艺术理论的平等论争，而绝不仅仅是“香花”与“毒草”之争，“真理”与“谬误”之辩。正是在此意义上，“双百”方针才真正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

“双百”方针发挥艺术工作者的创作个性。邓小平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邓小平还指出：“列宁说过，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双百”方针，给文艺工作者创造了一个能够充分展示艺术个性及独创精神的良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5页。

同上，第183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6页。

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6页等。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页。

见上，第213页。

见上，第210—211页。

好环境。

“双百”方针适应了人民多种文化的需求。邓小平说：“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传统文化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的一切进步的 and 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这就为文艺创作在“双百”方针指引下，充分满足人民丰富多彩的文化需求指明了方向。

“双百”方针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邓小平指出：“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双百”方针的应有之义。关于文艺批评的目的。邓小平说：“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的动力。”所以，“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关于批评的原则。对艺术作品要进行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分析。“双百”方针必须坚持“二为”方向。1981年，他对批评《苦恋》明确表示了支持态度，认为《解放军报》批评《苦恋》“是应该的”，他指出了有的作家的言论和作品，实际上是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他强调：“要求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双百’方针当然要为这个利益服务，而决不能反对这个最大利益。”

关于批评的方法。邓小平说：“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他还说，“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邓小平还指出：“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这就改变了以往靠某个领导个人来“钦定”文艺作品成败乃至生死的现象，提出了“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的原则。这就为实行正常的文艺批评，创造了条件。

3. 对传统文艺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页。

同上，第392页。

同上，第212页。

同上。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0页。

同上，第256页。

同上，第390页。

同上，第392页。

同上，第213页。

同上，第212页。

中国古代的文明非常灿烂，其中文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周代的贵族教育以六艺分门别类，乐在礼后，占第二位。春秋以来，作为整体的乐开始分化，孔子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诗与礼、乐鼎足三分。儒家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肯定文艺：“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所以，《毛诗序》言：“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种看法对后世影响极大，唐代的新乐府运动、古文运动，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都要求文以载道，正是这股思潮的延续。《梁书·文学传》序云：“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莫之能易”。

魏晋之际，由于世乱纷亟，人生无常，关于文艺的另一种观点逐渐抬头。文艺的“风动教化”被抛开，吟咏情性被当作文艺的主要功能。如萧纲所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所谓“放荡”就是要放开去，摆脱礼教的重重束缚，专门吟咏自己的情性，使文艺成为纯文艺。这种思潮对于中国古代文艺的发展也有甚大的影响，如唐诗、无曲、明清小说的发展。

中国古代文艺思想，重视与生活的关系。刘勰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从宋元以后小说、戏曲看，文艺来源于生活的结论就更趋明朗。曹雪芹在其巨著《红楼梦》第一回中明言：“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

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也重视与民众的关系。唐诗流传社会各阶层，宋词流传范围也非常广，柳永词号称“有井水处皆能歌”。至于小说、戏曲，本就是写给广大群众看的，王骥德说：“世有不可解之诗，而不可含有不可解之曲”（《曲律·杂论》）。

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特别重视与政治的关系。上文提到文艺在中国古代所处的重要地位，就是因为其与政治的紧密相联。白居易言：“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白居易集·策林·议文章碑碣词赋》）中国古代，特别强调文艺的教化功能。《史记·乐书》云：“礼以异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好。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国民心而出治道也”。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一位艺术家。他的古诗词创作成就非凡，书法艺术更是独具雄凤。在文艺思想方面，他也吸取了古代传统文论的一些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加以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宝库。其代表作是形成于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文艺与生活。跟传统文论以个人经历证明文艺源泉是生活的方法不同，毛泽东从哲学高度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引该文均略去出处）所以，文学艺术得依赖于生活。“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

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文艺的作用就在于使社会生活典型化，比普通的社会生活更带普遍性。毛泽东说：“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主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要创造“更带普遍性”的文艺作品，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毛泽东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并且，通过深入生活，使“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从而，大大扩展了文艺源于生活的内涵。

关于文艺与群众。传统文论最致命的缺陷，便是根本不了解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因此只把他们看成碌碌无为的群氓，是有待教化的愚民。毛泽东关于文艺与群众的观点，是建立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历史唯物主义的認識之上的。所以，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要将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首先是普及，然后才能提高，“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文艺的提高，……只能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毛泽东进而指出了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与人民群众感情相近，使文艺作品大众化，真正为群众所欢迎，所接受，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关于文艺与政治。古人强调文艺的教化作用及与政治的联系。但文艺与政治的更紧密的关系是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近代以来，因民族危亡的刺激，国人不得不以救亡为第一要务。梁启超因而大力宣传小说的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到五四时期，文学以唤醒国民为己任。大革命后，则“革命文学”兴起，李初梨言：“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并且不可逃避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

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国新大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卷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1页。

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所以，毛泽东又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毛泽东在此还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以政治标准为第一位。这些观点，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反映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时代要求。

毛泽东在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群众和文艺与政治的内容上明显地反映了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密切联系，并且又用马克思主义加以了极大的发展。邓小平文艺思想，尤其是其中关于文艺来源于生活，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艺不能脱离政治的观点，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带有中国传统文论的特点。

邓小平对“二为”方向的倡导和对“双百”方针的坚持，具有新的意义。

前面曾引用了胡乔木的一段话：“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诚然。毛泽东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是时代的产物；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有它的合理性，一切工作都应服从于革命与战争这个中心，文艺直接为革命和战争服务，不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在革命和战争的激情中，涌现出了大批优美的作品。但是，这一观点仍然具有其理论上的缺陷，强调政治、淹没了文艺主体美的追求。因此，当中国社会从革命转入经济建设以后，这一缺陷的消极作用就开始显露出来了。其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轻视甚而否定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主体性。文艺从属于政治，由于把一切形式的文艺简单地当作政治的图解形式来看待，要求文艺工作者围绕着临时的、直接的、具体的政治工作来进行文艺创作，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主体性无从发挥。“大跃进”时期，甚至出现“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的说法。一方面，领导可以随意干涉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活动，文艺只能按照“总的精神”来图解政治政策，根据领导意志来赞美“现实”，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自我感受完全被抹煞殆尽。而且，在政治又被片面地理解为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还导致了严重的文化专制主义。1961年，周恩来在有关文艺座谈会上曾批评所谓“五子登科”的领导作风：“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右倾’、就断定是‘右倾’。……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还有挖根子。”使文艺工作者噤若寒蝉。另一方面，从机械的反映论出发，片面地理解文艺源于生活的理论，强迫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和工厂劳动锻炼，挫伤了文艺工作者的自尊心和创作的积极性。这显然，不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

“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

其二，文艺作品日益丧失作为艺术审美价值，缺乏生命力。由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由此导致了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丰富多彩的生活在文艺中不能再现，文艺与生活的广阔联系变得狭窄起来，而政治又被理解得偏激、狭窄、简单化，许多作品在当时虽起到过宣传鼓动的作用，但时过境迁，便失去了价值。李准曾以自己的创作经历谈到我国文艺作品受到庸俗政治干扰的结果，他说：“我写了十几个电影，现在重新复映的只有三四个，还是凑凑合合拿出来的。人没死，作品已经死了，或者上半年写的，下半年就死了”重要的原因是把“文学作品堕落为政治口号的图解”。

其三，文艺领域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焦点和发源地。文艺从属于政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指导下，文艺就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循着这一思维，文艺领域也就成了阶级斗争的焦点。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借用康生的话：“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批判小说《刘志丹》，以说明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从1963年起，文艺领域的大批判运动风起云涌；对小说《海瑞罢官》的批判，直接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上述现象的发生，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以政治为核心、政治伦理化的特点所生发出来的强调文艺教化功能和文艺政治化的思维特征。而这种思维倾向必然导致文化专制主义。1950年，邓小平说过，“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之一是“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的作风”。所以，虽然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了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正因为文艺的政治化和政治的阶级斗争绝对化，由于“四人帮”等推波助澜，必然导向文化专制主义。

邓小平对“二为”方向的倡导和对“双百”方针的坚持，既是对毛泽东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念的纠正，同时也反映了新的时代对文艺的新的要求。这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尤其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偏狭政治，已经不是人们社会生活的核心。中国人民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还需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文艺不仅仅是某种社会运动的工具，而且它日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所以，文艺主体美的要求得到了强调。现在，当我们讨论文艺的社会功能时，就不仅仅局限于其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而且还强调文艺的娱乐功能。所谓娱乐功能，当然不再局限于寓教于乐的狭隘认识。国外有人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观念是重视文艺的政治功利性，而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核心观念是“重视娱乐性和艺术性”。这一说法过于极端。但也反映了国外学者对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文艺思想上差异的敏感。

邓小平倡导和坚持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在重视文艺的社会效益的同时，对文艺主体美的强调，纠正了毛泽东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狭隘观念，克服了传统文艺思想过于强化文艺的教化功能、文艺政治化和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3页。

《文艺的社会功能五人谈》，《文艺报》1980年第1期。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4页。

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

见《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

文化专制主义的根本缺陷，这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完善，也是对传统文艺思想的重要发展。

由于对文艺主体美的强调，内在地规定了对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的尊重。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尊重文艺工作者的主体能动作用，给文艺创作以广阔的天地，文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在新的历史时期，虽然也经受过各种倾向的侵蚀，但是通过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出现了文艺的繁荣景象。

第十章 精神文明与传统伦理思想

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的。”文化建设指的是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见，科学、教育与文艺，主要属于精神文明的文化建设内容。”

精神文明还有属于“思想建设”的内容。邓小平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

邓小平更多地是从“思想建设”的角度来强调精神文明的建设的，并且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四有”人才要求。“四有”，可以认为这是对新的历史时期道德伦理的新的要求和概括，这一概括，既体现了邓小平对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思想的继承，也反映了对它的更新和发展。

1. 高度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

精神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了科学的阐发。他们肯定了摩尔根对人类史前时期的研究成果，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并以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基础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用物质生产来说明精神生产。马克思指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也就是说，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马克思还认为，精神生产对于物质生产有着能动的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批判其所带来的弊端和祸害，并且阐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人类更高层次文明的发展趋势及其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风貌。

毛泽东尤其强调思想政治工作。革命时期，靠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全党、全军和广大群众中树立起了坚定的革命信念，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铁一样的革命纪律，从而由弱到强，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邓小平深有体会地说：“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

建国后，党又强调反对腐败，防止官僚主义，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整顿社会秩序，提倡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提倡为人民服务，提倡无私奉献，涌现出一大批精神文明的典范，雷锋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邓小平说：“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

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1957年以后，毛泽东开始形成“左”倾错误，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特别强调人的政治觉悟在一切工作中的首要地位，片面夸大了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而且这一思想又与他所强调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左”倾思想相联结，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走向反面，导致了整个社会思想道德水平的下降。例如出现了派性林立、纪律松弛、走“后门”之风盛行，甚至信仰危机的现象。

邓小平果断地停止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方针，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他十分重视使社会风气好转的问题，尤其多次强调：“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

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大量的新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出现，如从国外引进资金、科技和设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等；国内出现了承包制、股份制、个体经济，形成了金融市场、劳动市场和股票市场等。这一系列重大变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无不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发生竞争观念、赚钱观念等观念变化，如何把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更新观念结合起来，如何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合理地统一起来，这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外开放的扩大，外国社会一些消极腐败的东西也会夹杂着传入中国，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会使一些传统腐朽思想重新滋生，这都造成社会的腐败现象。诸如以权谋私、徇私在法、贪污受贿、官倒权倒等现象屡禁不止，相当严重。这不仅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而且毒害人民，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人民的不满。还出现了在中国业已绝迹几十年的如吸毒、贩毒、卖淫、嫖娼、抢劫、假冒伪劣商品、黄色书刊等社会丑恶现象。因此，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新观念的同时，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就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逐渐展开之际，就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邓小平开始阐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要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同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祝辞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又作了多次阐述，尤其强调了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内容。

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并指出精神文明还包括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要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公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

同上，第379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5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

明的支柱。1983年4月，邓小平强调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全国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985年，邓小平又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他说，这四条当中，理想和纪律最重要。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没有这两条，就无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制定并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总结了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把精神文明建设以党的决议形式正式列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1987年，中共十三大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写进了党的基本路线，从更高的层次上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2.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可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途径等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首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是它的经济基础及其所要求的上层建筑的具体历史的统一，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统一体。

社会主义社会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还包括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换言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之一。我党十二大报告一改我党历史上讲社会主义特征时，只重政治的局限，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其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者，社会主义制度能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它为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打下了基础，提供了保证。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政治经济等方面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产生、发展和完善提供可靠有力的保障，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丑恶现象。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36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页。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26—27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

地发展生产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体现，二者，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设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精神文明。邓小平视察南方时，有一段对广东同志讲的话：“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我们如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不下大决心不花大力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全面地发挥出来。

再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之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乃是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它包括物质文明的现代化，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1979年10月，邓小平就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的要求。“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论述系统地概括了邓小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把精神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一样，看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三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全党同志必须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从这个“一个中心，三个坚定不移”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来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动和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二是推动和保证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工作，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一件大事。

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个根本的战略国标，对于物质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则为物质文明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保证其正确的方向。邓小平说：“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他还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这些深刻的论述，说明在重视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同时精神文明又是民主建设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而要充分发展民主和健全法制，需要人民有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健全的法制观念；人民要行使民主权利，不但要有一定的政治觉悟，而且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否则就会制约民主的发展。列宁曾经说过：没有文化就没有政治，而只会有流言蜚语。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

同上，第37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

同上，第154页。

也明确指出：中国所以还不能实行更大范围的普遍的民主选举，“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因此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战略目标也是民主建设发展的迫切要求。

最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又是实行改革开放的需要。精神文明建设对改革开放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推动人们观念的变革、更新。用新的知识、新的信息、新的思维去破除旧的传统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切障碍，去迎接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只有人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才有可能大胆地接受新事物、形成新观念，造成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社会氛围和环境，促进改革开放。同时，另一方面，也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人们才能自觉地区别和抵制改革开放所难免带来的一些消极的东西，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和顺利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为了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因为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效果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精神文明建设战略能否落实到实处的问题。

培养“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简言之，就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培养“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要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要创造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没有人的素质的提高，没有造就一支真正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没有全体劳动人民政治理论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劳动者是生产中首要的能动因素，劳动者的素质状况，特别是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状况，直接决定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直接影响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与速度。培养“四有”新人，又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和目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的发展的最终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也必须在社会主义阶段把人的发展提到战略地位，把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四有”新人的培养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从而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因此，“四有”新人的培养，既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要求。

邓小平对“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四有”思想作了详尽的阐述。所谓“有理想”，主要指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理想是人们信仰、向往和追求的目标，它是人们的社会政治观点和世界观的集中反映，是支配一定社会的人们行动的强大精神力量。邓小平指出：“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有道德”，主要指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它包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它还包括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为世界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公而忘私，无私奉献，勇于献身的精神。只有全体公民都有了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我们的社会才会美好，才会不断健康向前迈进。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0页。

同上，第2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有文化”，就是指掌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所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革命离不开文化，没有文化就不能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就不能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和纲领。毛泽东曾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离不开文化。离开文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都将成为一句空话。

“有纪律”，就是指具有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法制观念，自觉地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和法律，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邓小平认为：“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纪律和法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有了铁一样的纪律，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才会有秩序，整个国家和民族才会步调一致，才会有力量，中华民族才有希望，我们的事业才会实现。邓小平明确指出：搞现代化建设，“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没有纪律不行”，一语道出了纪律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在“四有”当中，邓小平又特别强调理想与纪律。邓小平说：“‘四有’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这是因为理想是力量的源泉，它既是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力量源泉。理想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理想是人们自觉抵御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它一切腐朽思想的精神武器。有了理想才有铁的纪律，这是因为铁的纪律必须建立在共同的理想的基础之上。而纪律则是国家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前提，又是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的重要保证。因此，理想和纪律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来说，显得格外重要，邓小平认为，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

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原则和途径。

其一，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四有”新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邓小平多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指导思想，这是我们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真正优势”。《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也指出：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离开了这一条，精神文明建设就将失去社会主义性质和正确的方向，而走到邪路上去。

其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确定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明确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始终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就是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所以，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1页。

同上，第112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

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其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始终贯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这是邓小平始终特别强调并关注的问题。坚持两手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关系上的一个重要方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是相互依存的，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两手硬，两个文明建设才能相互支持，协调发展。邓小平反复指出，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也可以说是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中再一次强调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邓小平坚信，只有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其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中共十四大报告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这个建设是全局的，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文化艺术。在思想道德方面，报告指出，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激发广大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各行各业都要重视职业道德建设，逐步形成适合自身特点的职业道德规范，坚决纠正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业不正之风；搞好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的建设，进一步开展军民共建、警民共建文明单位等群众性活动，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城乡基层，等等。这是对邓小平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思想的具体化。

3. 对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

在前面我们已多次谈到，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有关道德伦理的思想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所以，中国人伦思想特别发达，哲学、学术及社会教育，都与人伦思想的阐发及人际关系的观察处理有直接关系。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对道德伦理的强调，首先基于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强调。因此，在重人伦的同时，有着轻鬼神的特点。“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他重视的是现实和人事。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孟子提出“天人合人”，都表现了一种人与天地生，生生不息的精神。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对道德伦理的强调，还表现为对教育与文化的特别重视。《礼记·学记》中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大学》还指出：“古者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必重教学。所以中国古代教育十分发达，先秦“私学”的出现，到了宋代更是书院遍布，打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出现了“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师有学”，“虽穷乡僻壤，亦闻读书声”（《宋文鉴·八二·南

宋军学纪、湖田书院记》)的景象。这是中国思想文化薪火相传,不断发展的基础。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对道德伦理的强调,在政治上就表现为重德治、重教化。这也表现为对民的重视。儒家以仁政为本、主张政在得民。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甚至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梁惠王下》)的观点。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强调道德伦理思想,从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优良的道德传统。诸如古文献中所阐发的自强不息、刚健奋进、威武不屈的精神;“天下为公”的理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爱好和平,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压迫的爱国主义精神;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尊师重教、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的道德风尚等等。这些内容也是我们今天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但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有将道德伦理绝对化的唯心主义特点。如前所述,孔子重德。但孔子很少谈论天道,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重视的是人道,他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是说道是原则,德是道的实际体现,仁是最主要的德,艺(礼乐)是仁的具体表现形式。董仲舒将天道与人道合一,他说:“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地,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之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耻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春秋繁露·天道通三》),更强化了道德伦理的地位。宋代,出现了“道器”之辨。理学家无论对“道”的解释有多大分歧,然而把“道”看成是“天理”则是一致的,而“理”的内容,不外是道德伦理原则。“天不变,道亦不变”,道德伦理就进一步绝对化了。

道德伦理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及其规范。在政治上,儒家认为,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居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重统治者的以身作则,重道德教化。而在另一面则突出了人治的意义。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根据中国历代政治统治的实际,指出了这是一种封建的特权人治。在经济发展上,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也是显著的。

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思想,强调道德伦理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循着中国哲学对道器论和体用论的思辨,可以发现如何处理好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难点。到了近代,由于西方物质文明粗暴地撞开中国的大门,一些开明之士提出了“中体西用”的观念,也就是试图以中国的道德伦理为其根本、采用西方的物质技术,以图富国强兵。这条路失败了,以至五四时期,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提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制度,而且还要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而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则以吾华精神文明优于泰西的物质文明为由,抵制向西方的学习。这就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割裂开来了。

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思想,由于是建立在宗法封建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在内容上也存在着封建性的糟粕和旧的落伍的东西。比如“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观念和“尊尊、亲亲”的宗法思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伦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特权思想等等,理应加以

批判。此外，还有一些内容还需要仔细鉴别，剥取其合理的内核，加以改造，赋以新的内容。

邓小平关于建设精神文明的思想与毛泽东重视人的精神因素、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一样，很显然，与中国古代特别重视人的主体作用，强调道德教化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把人的现代化看成是四个现代化的基础，把精神文明的建设置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地位，这使得传统的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了时代的特征。而且，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对世界的现代化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而且，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思想，还包含了对传统道德伦理思想内容的批判和继承。邓小平对于封建道德意识的批判和对中国传统美德的称赞屡见于他的文章和讲话当中。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关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四有”人才的思想，具有十分明显的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以天下为已任”、“天下为公”这是中华民族所历来强调的理想和抱负。历代的思想家都十分强调立志，无志则无学，亦难以有所成就。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集体主义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显著特点。邓小平认为，在“四有”之中，理想和纪律最重要，弘扬了中国道德伦理思想的精华，而且这一思想，也是出于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的总结，建立在共产主义的科学理想和政治法律的纪律之上，具有十分重大的实践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邓小平把精神文明的建设看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他一再强调，我们不仅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文化，我们更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精神文明。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建立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之上的。邓小平在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时说过，“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脱离物质文明的建设，邓小平又说：“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正是在改革基础上的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和观念的变革是紧密相连的。所以，邓小平还指出：“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精神文明的建设还离不开民主法制的建设。良好的道德风尚必然是建立在较完善的民主与法制基础之上的。邓小平在表述“两手抓”的时候，强调了政治法律的意义。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等等。邓小平说，“我们使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精神文明建设，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建立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之上，而且还要为物质文明的建设服务。社会主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

同上，第142页。

同上，第379页。

同上，第156页。

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与物质文明互相促进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从邓小平精神文明思想所包含的内容，特别是“四有”人才的培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以及社会主义新道德、新伦理的确立来看，其明确的目标就是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为有效地加快经济建设服务的。可以说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主题，就没有邓小平精神文明思想。

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互关系的思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执着于思想文化上所谓“触及灵魂”的革命，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也使得传统道德伦理思想走出了“伦理至上”的误区，产生质的飞跃。

第十一章 民主、法制与传统政治理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需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精神文明的建设，必须依靠民主与法制，这就是邓小平所反复强调的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以惩治腐败、打击各种经济犯罪，促进社会安定的内在含义。这是因为，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建立在完善的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上。与此相应，政治制度的建设，又是经济建设的保证。所以，邓小平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正因为政治建设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建立一个高度民主的社会制度，又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邓小平说：“我们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

邓小平对于民主与法制作了大量的论述。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民主与法制思想的指导下，建国四十余年的历史中，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体制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健全。邓小平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论述，抓住了中国社会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对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完善和发展。

1. 建立民主与法制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中国，正值社会变革的转折时期。经过十年动乱，我国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遭到了空前的劫难，创伤累累。首先，极左思想的影响依然严重存在。“两个凡是”试图继续“文革”中的错误，个人崇拜、领袖被神化，党的民主制度，集体领导原则被严重破坏，“左”的、僵化了的的思想继续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其次，“文革”中实行的所谓“大民主”方式，实质上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行“大批判、大体罚、大诬陷、大揪斗”之实，“四大”的影响依然存在，公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社会秩序还相当混乱。群众运动的方式，使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迫害。再次，由于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都没有制定出来，大部分领域的立法还处于空白状态，有法可依无从谈起，法律不被重视。在执法过程中，政策大于法、红头文件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权力不受制约的状况较为普遍。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职能部门大部分陷于瘫痪。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其四，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受到了严重破坏。从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过以后，直到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中间有十年没有召开过全国人大。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闭幕后，直到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召开，中间又中断了三年。地方各级人代会更是如此，大多数地方各级人大前后长达十三、四年没有召开。至于人大的各项职能的发挥就更无从谈起。

“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发展前途的大事。“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6—257页。

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正是在这样的深刻背景之下，邓小平从国家政治建设的战略高度提出了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过一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思想、观点。1961年邓小平主持起草《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其中提出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这是邓小平企业经济法制思想的具体体现。作为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体系的确立则集中于粉碎“四人帮”以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根据我国民主和法制实践的需要而适时阐述，并随着实践的逐步发展而不断完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的民主法制建设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拨乱反正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思想解放为突破口，完成由动乱向四化建设新时期的转变。主要举措有：第一，通过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思想解放的先河，从而结束了两年的徘徊，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从而较为顺利的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第二，恢复党内民主生活，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曾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又说：“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反、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鉴于此，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民主讨论，作出决定”。

第三，提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加强法制。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方面，邓小平指出“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表明对公民权利的高度重视。在加强法制方面，邓小平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初步提出了民主的制度化 and 法律化的制度建设问题。同时，邓小平还对加强立法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

同上，第114页。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5页。

同上，第229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同上，第146页。

同上，第146页。

求，并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

第二阶段时值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实、完善、发展，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思想体系。它的基本框架包括：

第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实行西方代议制民主，“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我国1982年宪法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规定了领导职务的限任制。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接选举扩大到县一级，并普遍实行了差额选举。

第二，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内生活的民主化。邓小平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即指出，党的各项工作，包括对敌对势力的斗争，“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正是遵循邓小平的这些思想，1981年6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规定了“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章中也明确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宪法同样明确规定，各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一原则规定在建党史上是第一次，表明党对宪法法律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和高度重视。

邓小平还提出了废除党内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意见。对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邓小平指出“这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他建议设顾问委员会作为“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在倡导和推行干部退休制度方面邓小平身体力行，中顾委及各级顾委也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干部离退休制度已经得到确立。我们党制定了《关于党的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改善了党内民主生活。在邓小平的倡导下，确立了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干部的原则。

第三，提出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从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对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必要性、改革的内容、目的和要求以及实施步骤的系统、精辟的论述，到1986年邓小平多次明确提出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他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施。”并且具体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0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1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0页。

同上，第41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并在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发展和完善民主制度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奋斗目标。

第四，加强法律建设，扩大人民民主权利。有法可依是法制建设的前提条件，邓小平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并坚持从地方实际出发，开展地方立法活动。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即对立法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正是在邓小平立法思想指导下，我国立法步伐大大加快，至今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已制定法律二百余件，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立法更是数量巨大。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具备了有法可依的条件。

通过各种途径，扩大人民民主权利，这是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又一侧重点。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邓小平指出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参政议政的途径和手段更趋多样，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也日趋广泛、完善。以行政诉讼法为代表的一批法律，如著作权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法律法规，将法律调整的范围不断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渗透。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已经大大加强。

综上所述，邓小平民主与法制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前期的拨乱反正阶段和后期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前一阶段以解放思想为突破口，由一系列“破”与“立”的内容构成，从而初步纠正“文革”乃至“文革”之前，我国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上的“左”倾错误。后一阶段则以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为重点，注重基本制度建设，并逐步加以深化和完善。正是在邓小平民主与法制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2. 坚定不移地进行民主与法制建设

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民主法制的基本思想和原理，同时，它又深深植根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深厚土壤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十分重视和强调民主和法制的基本制度建设。

同上，第178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

同上，第147页。

同上，第322页。

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我国民主与法制的历史传统及其建国几十年来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我国历史上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人治，缺乏民主与法治的传统与精神，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二是建国以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既有成绩可资总结，更有惨痛的教训值得记取。为此，要彻底清除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树立法制的权威，健全民主制度，关键的问题是要加强基本制度的建设。邓小平反复强调了“制度建设”这一根本，可谓抓住了民主法制建设的症结所在。

在吸取过去民主法制建设的深刻教训时，邓小平揭示了以往不足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建设的匮乏，在评价毛泽东个人功过及晚年错误时，邓小平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中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在分析官僚主义的成因时，邓小平将其归结于体制的缺陷，“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

过去的传统带给我们的多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建国以后的失误应该主要的、根本的归结于制度的缺陷、弊端。包括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包括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的僵化体制；包括在封建主义土壤上不断滋长出来的特权主义、“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包括封建主义的人治思想。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紧紧扣住了制度建设这一关键问题。

对于民主和法制的基本制度建设的目标和途径，邓小平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正是在实践中贯彻了邓小平民主法制的这一基本思想，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稳健、成效显著。在领导体制改革和建设方面、在人事制度建设方面、在民主决策制度方面、在国家机构改革方面、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方面、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方面、在完善立法、执法、法律监督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建设。正是抓住了制度建设这个根本，使我们党和国家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同上，第297页。

同上，第328页。

同上，第330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

同上，第336页。

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能够贯彻始终，能够顶往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使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进入了稳健，全面、平衡发展的轨道。诚然，民主与法制建设仍然是渐进的、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有了民主和法制的基本制度作保障，前进道路上的挫折和风险就会缩小，反复就会减少。

第二，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十分注重民主与法制和经济建设的相互关系，注重处理好经济与民主法制建设的主次关系、相互依存和平衡发展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同时政治又对经济产生反作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主与法制服务于、服从于这一中心，保障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顺利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并且这种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得以深化。比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三大报告对党的根本任务的表述，可以看出这种认识层次上的提高。前者将党的中心任务表述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后者则表述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从“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到“富强、民主、文明”，其中的语序变化及内容的增减反映了党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现阶段的认识更趋成熟、深化。它要求以国富民强为本，政治上民主制度作保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稳步发展，也即以经济建设为主轴、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为两翼，协调配合，同步发展。

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决定了我们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此邓小平提出了判断我们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是三个是否“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衡量民主与法制对经济工作的成效判别。这一标准是与实事求是的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相统一的，同时又是对实践标准的具体化，反映了邓小平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深层认识。

而且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是政治建设的基础。例如，他在论述对敌专政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可见，在处理经济建设与民主法制基本关系时，邓小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本，“扭住不放”，并始终不改初衷。

基于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辩证认识，不能不看到政治对经济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关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依存与协调发展关系，邓小平曾经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离不开与其相关方面的积极配合。我们经济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最终达到全体劳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同上，第89页。

动者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经济建设始终离不开一整套适合其自身发展需要的科学、高效的管理规则和程序；离不开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才智的充分拓展。这里面就包含了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协调、配合。诸如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各级人民群众通过代表或者直接参与国家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管理，通过建立制止不正当竞争法律及其运作规则，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正常生产秩序，等等。

邓小平民主法制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民主法制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法制观的社会主义范畴的民主法制观。为预防并及时纠正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中“左”的或右的偏差，邓小平十分强调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质的规定性。为此他提出了必须坚持以下两个统一的原则。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与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抵制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

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发展民主、健全法制的统一，以确保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正确方向，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和无政府主义的泛滥。

社会主义民主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日民主的新型的民主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把握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使社会主义民主能够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预示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为此我们要改革现行制度中不尽完善的方面，但是这样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不能脱离中国实际，不能实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

我国长期以来以小生产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成为无政府主义滋长的深厚土壤，因此反对民主的极端化和无政府主义同样是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偏离四项基本原则而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的严重后果，邓小平指出：“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那样，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斗争就等于白费，中国就将重新陷入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正是在深刻总结历史教训，尤其是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的偏差的基础上，邓小平谆谆告诫我们要分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健康、积极、稳步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在本质上优越于资产阶级民主，但由于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短暂，社会主义本身还处于不断探索前进的过程之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供依循，同时，社会主义民主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越性也必须置身于整个世界发展的大背景，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借鉴世界文明的现实成果。因此，在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必须大胆地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其中包括民主法制建设的部分成果。正如邓小平所揭示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241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6页。

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这里所指的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当然应该包括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反映客观规律的内容，邓小平讲过干部退休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实行得比我们好，像反映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大量的法律，我们可以大胆借鉴、吸收，为我所用。

第二，坚持民主与纪律、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为了切实保证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实现真实的民主，必须强调民主与纪律、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是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是由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实现这种结合才能切实把握住民主的度，才能有效地防范或“左”或右的偏差。“‘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的民主”。

为了实现四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必须充分保障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同时又要特别重视政治局面的稳定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稳定，而要达到这种稳定就必须要有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意志和行动。而民主与法制、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正是保证这种统一认识、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基础。

3. 对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民主首先和主要的是指国家制度，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国家制度意义上的民主和法治从来就是作为专制和人治的对立面出现的，是对专制和人治的否定。考察中国二千余年的国家史，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二千余年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实行专制和人治的社会。从国家形态上讲是非民主、非法治的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以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为特征，从国家制度上看是专制统治，与之相适应，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以“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君权至上”、“宗法主义”等为主要特征的专制主义思想。而诸如“君轻民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贵贱、均贫富”等民本主义思想则处于从属地位。

并且，这些观念只是作为“仁政”的表现，强调的是“为民作主”，而不是“人民作主”，与现代民主精神有本质区别。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和发展的过程，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和否定的过程，它对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启蒙和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由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从酝酿、产生到发展、成熟，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历时仅七十年。这与漫长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6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9页。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

的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思想的统治相比，其影响不能不显得短暂而脆弱。

中国封建专制的漫长历史，不仅使封建主义在历史的延展变迁过程中得到不断的磨砺，日趋发展、完善，形成独立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使之渗透到社会文化、教育、习俗等各个层面，成为人们世代沿袭的习惯和信奉的道德规范，正是这一漫长的专制统治历史，造成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特有的顽固性。

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构成了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指导思想，它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其一，宗法思想指导立法。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成为指导立法、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宗法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家长制的“孝”。“不孝”成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十恶”中属于维护宗法方面的条款就有“恶逆”、“不孝”、“不睦”、“内乱”等，占近一半。其二，皇权至上，法自君出。皇帝是最高的立法者和审判官，既有权立法也有权废法，凌驾于法律之上。“十恶”大罪中触犯皇权的就有“谋反”、“谋大逆”和“大不敬”等“三恶”。其三，坚持等级特权，主张同罪异罚。等级制与宗法制相结合形成“任人唯亲”的世袭制。法律赋予封建贵族、官僚和家长、族长以特殊的法律地位，享受各种法定的和习惯的特权，规定按照不同品级享有议、请、减、赎、官当等减免罪刑的定制。第四，重德轻刑，重义轻利。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提倡德主刑辅，重道德重教化，轻视法律的作用。由于自然经济的长期存在，重农轻商成为传统，在法律思想上则形成重义轻利。它的长期作用严重抑制了人们的权利观念，阻碍了中国司法的发展。

从以上中国法律思想的基本特征中可以看出，中国封建主义法属于人治的法，而不是法治的法。战国时期曾经出现过儒家与法家之间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论争，但两者都是在肯定君主专制统治的前提下对治国方法的不同争论，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方面。儒、法两家可谓殊途同归。因此，法家的“法治”仍然属于“人治”的范畴。

近代含义的法治是作为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人治的对立面出现的。法治的基本含义包括：其一，现代含义上的法治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它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法治和宪政紧密相联，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其二，法治的核心是国家不仅仅通过法律进行统治，而且它自身也为法律所支配，即以“权力制约权力”。其三，法治的直接目标是取消专横和特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由此可见，作为“人治”对立面的“法治”之法，并不是一般所言的法律，因为人类社会自有阶级存在以来就有了各自的法律（成文或不成文的），而是专指具有民主政治意义，体现大众意志的法。根据这一标准考察中国法律思想史可以进一步印证中国封建法律的本质特征是入治之法而非法治之法。首先，传统中国没有民主政治，奴隶制、封建制社会如此，先秦以前的政制即使有别于秦汉以后的专制体制，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贵族专制体制，其次、封建制度下的中国没有宪政，在晚清政府颁布《重大信条十九条》以前，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皇权从来不受法律的支配，相反皇权凌驾于法权之上。而保留大量封建专制内容的《重大信条十九条》，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也成了一张废纸。第三，中国封建法不是取消特权，而是赋予这种特权以法律化、制度化。

邓小平对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人治思想影响的深刻反思，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实践失误的深刻检讨，使其对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作用的长期性、顽固性有着充分、清醒的认识。

埋葬封建制度这一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观念习俗却不可能随之消亡，消除这种思想文化的积淀将是长久而复杂的过程。革命和建设任务的繁重和迅速推进，使我们党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没有充分认识到消除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而封建主义却凭借小生产方式的基础，凭借深厚的文化土壤，不断渗透于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之中。回顾历史，不难判断当代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与封建主义的君权至上、当代的“一言堂”、家长制作风与封建主义的宗法主义，当代的干部职务终身制与封建特权等等之间的天然联系。正如邓小平所揭示的那样，“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封建社会重刑轻民、德主刑辅的法律传统，也是导致我国民间等司法发展滞后，公民权利保障法律体系的匮乏，法制观念淡薄的重要根源之一。邓小平提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影响，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并且将这一方针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确立民主与法制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框架中的战略地位。

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与毛泽东民主法制思想作为中国民主法制实践的理论结晶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同时，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对毛泽东晚年的部分民主法制思想的修正，赋予了毛泽东思想以时代新意，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民主法制思想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政体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统一战线思想、群众路线思想，以及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创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民主集中制原则等基本制度和原则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根据毛泽东法制思想确立的人民调解制度、“死缓”制度、管制制度、劳动改造罪犯制度、人民陪审制度等法律制度，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原则。

毛泽东晚年由于偏离了他自己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导致其对阶级斗争形势、经济建设形势的错误估计并由此导致在民主法制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失误，这些失误成为酿成“文革”历史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前期民主法制思想的同时，汲取了毛泽东晚年在民主法制思想方面的沉痛教训，对他的错误思想作了修正。

第一，关于阶级斗争理论。

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毛泽东国体思想的重要内容。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

邓小平立足于中国现阶段阶级状况的现实，彻底摒弃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科学地提出了阶级斗争的新理论，即“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都提出和确认了“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科学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6页。

命题。即：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可能激化；但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这是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所确立的一个历史前提。

第二，关于民主问题。

关于民主的本质特征问题，毛泽东认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反映了毛泽东对民主制度的相当程度上的轻视，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观，提出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而民主最本质的内容是国家制度。

关于民主的形式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大民主”的四大形式，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毛泽东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当时他用这种方式对付官僚主义，以后愈来愈向“左”的方向发展，发动了用“大民主”对付党内的“修正主义”、“四不清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系列运动。“文革”中“四大”又有了新的的发展，加上了“大串连”的“五大”。“四大”成为“文革”中群众运动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助长了小生产者的自发性，助长了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从而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四大”无视法律的规定和道德的约束，允许和鼓励公开的人身侮辱和造谣诬蔑，甚至走向了残酷的人身迫害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极端，造成了民主与法制的大倒退、大破坏。由于历史的局限，粉碎“四人帮”后制定的1978年宪法仍然肯定了“四大”的形式。

邓小平对“四大”作了这样的结论：“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根据邓小平的这一结论，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宪法条文中，取消了“四大”的内容。与“四大”的所谓民主方式不同，邓小平提出了用法制的手段进行斗争，强调民主与法律和秩序的统一。他提出要“同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进行有效的斗争。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关于健全民主制度，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的领袖人格意识在“文革”前后逐渐抬头，他希望凭借领袖个人的威望，充分调动起亿万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是他的这种主观愿望被林彪、“四人帮”利用后，领袖被神化，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导致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领导原则被践踏。

邓小平一贯主张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他指出“列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1页。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7页。

同上，第371页。

同上，第359页。

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

“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在总结“文革”教训时，邓小平指出个人迷信，家长制等等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作祟，“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邓小平反复强调从制度改革。制度建设的高度，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从根本上杜绝“文革”式悲剧的重演。

第三，关于法制建设问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仍留恋于过去群众运动的年代，到“文革”时期，毛泽东倡导的“大民主”方式渐渐演变为群众运动的主要形式，公检法被砸烂，法律权威扫地。毛泽东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口号，使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群众专政使一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迫害。社会主义法制出现了大倒退。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即提出了恢复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并且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思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表明其对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高度重视。

受中国传统法制“德主刑辅”、“重德轻刑”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历来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而忽视必要的法律制度、规范的建设。他主张用说服教育的方式处理各类矛盾，对犯法分子所采取的压服手段也是作为说服的一种辅助。毛泽东曾指出，人民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教的辅助手段”。他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也体现了这一精神。重视教育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对道德教育的重视的同时，却对规范化的、制度化的法律和规范表现出轻视和忽略，在立法方面，我国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期，没有基本的法律。在民事、刑事审判工作中长期以政策代替法律，以“红头文件”代替法律。公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淡薄。至今在民事、行政、经济诉讼中“和为贵”的调解结案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能不视为这种教化长期作用的结果。

邓小平对法制的高度重视具体到了立法、司法、普及公民法律意识等各个方面。对依法保护公民民主权利、加速中央和地方立法、依法惩治腐败，保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普及法律常识教育、对培养司法干部队伍、教育青年人遵守法纪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

综上所述，邓小平在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尤其是在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方面，纠正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批判了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专制和人治的思想内容，他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把握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思想，从而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9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5—336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4页。

第十二章 “一国两制”与传统民族统一观

台湾、香港和澳门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只是在近代，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从当代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这一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思想。按照这一构想，中英、中葡已先后就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达成协议。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对中国文化体系中国家统一观念的继承，又是同以往时代“具有非常不同内容”的一种新观念、新思维，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是当今世界最富于想象力和最具时代特征的全新政治思想之一。因此，这一理论在中国文化变革中意义是深远的。

1.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

中国人民历来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爱国传统。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与必然趋势。

台湾、香港和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是国与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上一世纪英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以所谓“割让”或“租借”的名义把香港占为己有，澳门也是葡萄牙人利用中国当时处于被压迫、受屈辱的地位而强行占有的。这五个问题的性质，都是一个中国恢复对其行使主权的问题。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退据台湾，人为造成台湾海峡两岸的分割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在国际上的崛起，对于集中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完成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尊严，是义不容辞且必须完成的使命，也是她一直不懈努力着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走向了现代化建设的振兴之路。三中全会公报特别提出：“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已开始了这个重大政治工程的设计。他强调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

邓小平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这一伟大使命，是非常及时而又富有远见的举措。进入80年代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时机已日趋成熟。

从国内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国民经济进一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举国上下，生机勃勃。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访京团时，指出：“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从国际上看，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改善取得重大进展。继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

197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8—59页。

1978年8月12日，中日双方又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底，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美国政府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79年1月1日，中美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在台湾问题上，海峡两岸存在着共识基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双方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都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以发展经济为重点，相互合作对双方的经济发展都有利；大陆和台湾同胞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生活习尚，骨肉亲情，血浓于水，人心思统一；从历史上看，大陆和台湾紧密相连，命运与共。1986年9月，邓小平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说：台湾与大陆的统一，“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

那么，应采取什么方式来实现国家统一呢？邓小平认为，“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全新的科学构想，其形成和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

1984年7月31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

1978年下半年，中共形成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邓小平在会见国外一些著名人士时，提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投资可以不动，但祖国要统一。

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开宣布中国政府准备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指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方法”。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向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谈话时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这些实际上已初步有了以“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以后，这一设想逐渐具体化。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以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进一步阐明了台湾和祖国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明确提出统一后，“台湾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1982年1月，邓小平接见海外朋友李耀基时，曾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到中国政府

同上，第30页。

同上，第170页。

同上，第67页。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1979年2月1日《人民日报》。

1981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转引自《我国的改革是一场革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455页。

收回香港后，“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

同时，我国宪法也给“一国两制”赋予法律保证。1982年12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章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至此，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已基本上形成。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与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杨力字教授谈话中，具体提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六点办法”。

1984年2月22日，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邓小平指出，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把他统一祖国的构想再加以理论概括，简称为“一国两制”的方式。这样，“一国两制”的科学表述正式形成。

其后，邓小平反复重申“一国两制”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政策，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构想的具体内容、理论依据、国际意义等，从而使之得以丰富和完善，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一国两制”理论指导下，中英、中葡就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进行了谈判，并取得圆满解决。从而这一理论进入实践阶段。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年5月27日换文生效），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是一部结合香港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最高法典，它把“一国两制”下香港的制度和政策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为今后长期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1988年1月15日换文生效），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也已于1992年3月出台。

总之，“一国两制”的理论和政策，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也是在实践中得以逐渐完备的，它将继续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2.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一国两制”这一全新的、富有智慧的科学构想，为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一个最佳方案。这个新概念的涵义，在邓小平近年来的许多论述中有比较系统的阐述。中英、中葡关于香港、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及中国政府制定公布的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的内容，也都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这个理论的具体内容。

“一国两制”的一般涵义，是指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分裂国家的统一，在中央政权机关的领导下，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允许这个国家的一个或几个地区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同其他地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

同上，第84页。

区不同。两种制度在一国之内长期并存、和平共处，互相促进，共同繁荣。邓小平说：“一国两制”的涵义，“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包括下述几方面：

第一，“一国两制”的出发点是和平统一祖国。邓小平指出：“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两制’，‘共同开发’”。

第二，“一国两制”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即统一后的香港、澳门和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内实行两种不同性质的制度。邓小平说：“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确定了它们是中国的一部分。以这个方针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实行的制度等，一切都不变，只有一条，必须确定是中国的地方。”“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原则性，是不能动摇的。坚持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和统一，坚持只有一个中国，是“一国两制”最根本的前提。

第三，“一国两制”是指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台湾、香港和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邓小平指出：“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而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则“更宽”，“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内容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第四，“一国两制”至少“五十年政策不变”。邓小平说：“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同时又强调：“要真正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也即“一国两制”的“五十年不变”的政策是以中国“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为基础的。可见，“一国两制”是一项长远的战略决策，两种制度的并存具有长久性和稳定性。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8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72页；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4页。

198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8页。

同上，第86页。

同上，第30页。

同上，第215页。

同上，第218页。

第五，“一国两制”的实行以宪法和法律作保障。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证了“一国两制”政策的合法性。全国人大据此通过了香港、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后实行的基本法。这是以宪法和法律来保证特别行政区的繁荣与稳定。1987年4月，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示：“基本法是个重要的文件，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一经提出，便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按照这一构想先后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后，“一国两制”更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赏。这一举世瞩目的创造性战略构想，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其现实意义也是极为重大的。从国内来看，它将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早日实现。从国际上看，它对实现分裂国家的和平统一、对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提供了新的尝试和经验。

第一，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创举，是对马克思主义若干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一国两制”是和平共处原则的运用和发展，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典范。和平共处思想是列宁在苏俄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后提出的。1954年，中印两国政府首倡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把它运用于处理一国之内不同制度的地区之间关系，这是对和平共处原则的灵活运用和创造性发展。邓小平说：“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

“一国两制”是统一战线理论在现实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统一战线思想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和进行建设的重要理论武器，是我们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法宝之一。“一国两制”的提出，使我国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有了新的内容。首先，它是民族的爱国的统一战线，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到第一位。其次，它进一步明确和扩大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代表时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前提，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爱祖国，爱香港。”“不是有个口号叫‘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吗？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这个统一战线是广及全中华民族，包括所有具有爱国心的炎黄子孙及外籍华人的大联盟。

“一国两制”的构想丰富和发展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实行这一政策是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新途径和新形式。它没有改变中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结构模式，但对传统的单一制国家构成模式而言，是一个新的突破。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别行政区”的“自治”形式，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新发展。

第二，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个新模式。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1—222页。

同上，第96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2页。

同上，第76页。

收回香港、澳门的主权，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态度，但应当看到香港、澳门目前的社会现实情况。大部分港澳人民一方面赞成在适当时候收回主权，使中华民族蒙受的历史耻辱得以洗雪；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保持现在的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愿意降低现有的生活水平。中国政府正是从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香港人民意愿出发，而提出“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实现祖国统一的。这种方式有利于统一祖国的大业，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有利于发展中英、中葡关系。这种方式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对大家都有利”。

“一国两制”也是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的最好方式。这一方式考虑了台湾的历史和实际。“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统一后对海峡两岸都有好处。首先是能促进两岸经济的共同发展，能共同振兴中华民族。其次，台湾安全有了保障。台湾孤悬海外，一日不与大陆统一，就有一日的不安全，“不知那一天就会被人拿走了”。再次，能恢复民族尊严，台湾和大陆可共享民族荣誉。而且，一个统一、稳定发展的中国，也必将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是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

二次大战以来，世界上存在的一些国际争端曾引起局部战争或较大规模的战争爆发点。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并按这一方式成功解决了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这为一些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树立了一个新的榜样。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的实行，“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采取什么办法。”

“一国两制”的战略决策，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参加中英联合声明草签的英国代表团团长、英国驻华大使查理德·伊文思说：“联合声明体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个富有想象力的构想，并且证明了和平谈判是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的最好办法。”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这一构想是邓小平“最有天才的创造”。金日成同志说：“朝鲜南北双方可以学习香港的方式，各自维持现行的经济制度不变，实行和平统一。”完全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必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威力。

3. 对传统民族统一观的继承和发展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而且具有极强的民族凝聚力。根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广阔的地域上，从文化特征分类，已构成五大区域、六大系统，形成百越族文化、东夷族文化、羌戎文化和华族文化等。各个文化系统个性鲜明，又相互渗透，从而构成中国文化的更大系统。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6页。

198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8页。

1984年9月27日《人民日报》。

198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1985年1月28日《上海译报》第83期。

文化的相互渗透，通过部落之间的交往，逐渐合并而进行。例如轩辕氏联合以“熊、罴、貔、貅、\$、虎”（《史记·五帝本纪》）为图腾的各部落，打败了炎帝、蚩尤等部落。在战争过程中，部落逐渐趋向于融合、统一。图腾也产生了融合。例如“龙”的图腾，身躯是蛇，长有兽类四脚，马的头和鬣、鹿的角，鹰的爪、鱼的鳞和须。这实际上是以蛇图腾为主体融合了其他多种图腾的融合体。龙以后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与此相应，多神也融合成一个统一的神。这个神在殷商时代叫“帝”或“上帝”，周朝就叫“天”。西周时确立了天为百神之大君”的观念。

周公旦在远古各种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把民与天联系起来。孔子好古敏求、“述而不作”，总结和发展了前人思想，成为一个“集大成”者（《孟子·万章下》）。孔子奠定了儒学的理论基础，并首倡“私学”，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随后，经过先秦的百家争鸣、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到来明理学，形成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铸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民族精神和性格，而统一的文字与浩瀚的史籍，更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

中华民族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还十分重视民族的统一。在远古部落联合的基础上，到了西周建立了广大统一的国家，同时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的思想。以后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对于民族统一思想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孟子主张“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认为统一之后才能安定，荀子一再称道商汤、周武“天下为一”的业绩，认为“天下不一，诸侯欲反”（《荀子·王制》）。吕不韦说：“一则治，两则乱”（《吕氏春秋·不二》）。《春秋·公羊传》把“大一统”作为其政治思想的主旨，传文开篇便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代董仲舒发挥了孔孟“大一统”的主张，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到了唐朝，面对严重的藩镇割据，韩愈极力主张以武力削平。柳宗元从理论上论证了封建制（分封制）被郡县制代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天下会于一”（《柳河东集·封建论》）是历史的进步。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认为秦一统中国是“势之所趋”（《读通鉴论》卷1）。

到了近代，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许多仁人志士为国家统一而奔走。康有为说，“中国只可一统，万无分立之理，更无分为联邦之理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孙中山，更是为国家的统一奋斗了一辈子。他说，“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统一起来才是“真民治”，才能“与列强共跻于平等之域”。

纵观历史上这些主张，尽管提出的背景不同，出发点各异，但都反映了人民对国家统一的重视、渴求。

中国历史的长河虽然曲曲折折，但统一之趋始终是主流，早在夏、商、西周王朝时，局部的统一便已实现。春秋战国，“五霸强，七雄出”，诸侯纷争，但“合一之势”是不可阻挡的。公元前221年，“秦皇扫六合，终于归一统”，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西汉东汉王朝都持续了这一统一的局面。此后出现三国鼎立，但归于西晋。经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93页。

《孙中山选集》，第521页。

北宋实现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元朝统一全国后，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有出现长期的分裂状态。辛亥革命后，在北洋军阀时代虽出现了实际上的四分五裂局面，但名义上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统一的时间要比分裂的时间长得多。即使在几个政权并存时期，谋求统一还是各政权所尽心尽力的。君权神授思想促使历代帝王去取得一个完整的统治范围，以此来印证其统治的权威性。政治的分裂既非统治者所乐意，更非人民群众所愿接受。因为分裂带来的是生活的不安定与生命的无保障，历代政权反对分裂割据的斗争无不受到人民的拥护。唐代平定“安史之乱”和铲除藩镇割据是如此，清代平定西南“三藩之乱”、征讨叛乱活动亦是如此，各族人民“携酮酪，献羊马，绎络道左”。

在重视统一、追求统一的思想下，历代帝王都力求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巩固其统治。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为依据来加强其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推行郡县制，直发展到焚书坑儒。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化君权。明朱元璋为强化集权，废丞相制，集全国军、政大权于君主一身，又大兴文字狱。

这种从政治到文化全面集权的思想是私有制下封建帝王“家天下”观念的体现。中国古代的统一观正是建立在帝王至上的基础上的，“王者无外”。但由于历史推演和朝代的兴衰更替，统一的具体形式并非千篇一律的。在整体统一的名义下，统治者因国力局限及统治的需要，往往会采取较为灵活的统一方式。

一种是通过小政权对中央政权的称臣纳贡来达到总体上的统一。如朝鲜、越南建立独立政权后，始终是向中国称臣纳贡的，在形式上连新君登位都必须向中国报告以便得到认可。但实际上它们有自己完整的国家机构，其内政、经济一般不受干预。像西汉后期匈奴臣服中央政权，但在领土上各自独立。

一种是中央政权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新征服区实行特殊政策，形成羁縻政区。在这些地区虽也和正式政区一样设置州县，但一般不征赋税徭役，不派运行行政官员，而由当地的部族首领世袭，治理其内部事务。如汉朝在西域设立的都护制。在清朝，西藏办事大臣统辖下的地区里，若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均由大臣处理，或上报朝廷，而其内部则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大臣系统的机构不加干涉。

当一个政权的领土包括农业区和牧业区，国民有多种民族成分，疆域有新的扩展时，不管统治者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会在某些地区建立特殊的政区，实行特殊的政策。契丹政权建立后，为适应境内各民族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采取了“胡”、汉分治的办法。中央设置南北两面官。“南面官”仿“汉制”（唐朝封建制度）统治以农业为主的汉人和渤海人。“北面官”实行“国制”（奴隶制）统治以畜牧业为主的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这就有效发展了社会经济，直至一个强大的辽政权的建立，统一北方达200年之久。

可见，在一个国家中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行政制度（包括经济、赋税、刑法制度等），并不妨碍国家的统一。相反，只要运用得当，结果必然会维护和加强统一。清朝能最终确立统一中国的政权，与它成功地实行适

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分不开的。

总的来看，一个高度集权的统一国家是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国家形式。这种统一的模式和思想影响了后世在统一观上的价值取向。无论在文化传统上，还是政治理论上，总有这样一种传统观念左右着人们，这就是，举凡在一个国家实现统一以后，大体上实行的都是一种制度。纵然有例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现象，但这种并存是不稳定的。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担负起反帝反封建争取革命胜利、结束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的重任。1922年党在“二大”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蔡和森在党的机关报《向导》上著文说：“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要求国家的统一。”经艰苦奋斗，到1949年迎来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大陆获得了真正统一。毛泽东说：“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毛泽东一生部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他始终把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少年时，读了一本描写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几十年后，他还能回忆起其书的开首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读了之后，对国家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毛泽东判断新的局势，指出民族矛盾已超过阶级矛盾而上升为第一位了，所以及时改变策略，推动建国国共合作，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机。共和国成立后，在国际舞台上，他为维护民族利益进行不懈斗争。由于特定的环境，建国后外交上我们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但即使是对苏联老大哥，在涉及到主权问题和民族利益时，他不畏压力，决不让步。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搞中苏联合舰队，毛泽东断然拒绝，谴责他这是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

在对待台湾问题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民族大义出发，态度鲜明。针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公开武力插手台湾问题，周恩来在1950年6月28日严正声明：“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在50年代上半期，中国人民一面从事抗美援朝的斗争，另一方面致力于武力解放台湾。1954年8月，为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中央决定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并于次年初首先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其后国共双方发生了多起大规模的空战、海战和炮战。1958年，我军猛烈炮击金门等岛屿。此时美蒋在金马防卫上发生争吵。美国想压服蒋介石从金马撤退，实行“划峡而治”。出于整个民族利益的考虑，我军决定让两岛暂留在国民党手里，并建议“停止炮击，举行谈判”。同年10月，由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两个文告先后发表，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台湾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重申我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进一步阐明了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的有关设想。文告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

《蔡和森文集》，第771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6—757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195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决。”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和探索；其实早已有之；在 1955 年 4 月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 1956 年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又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 同年 7 月，周恩来在接见香港记者曹聚仁时，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愿望，说“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同年 9 月，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政府应当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我国领土台湾。

可见，以和平方式来实现祖国统一是毛泽东等领导人争取的目标。但总的立足点是以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这是由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的。不论是武力方式或和平方式，解放后的台湾都要改变那里的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一国一制”。

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里，国际上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尖锐对立，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领域全面对抗。“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妥协调和的余地，建国后，我们走的是一条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成分，不加分析地完全排斥资本主义因素。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当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确立两种制度在一国之中长期和平共存的思想，是不现实的。

对香港问题的处理就有所不同。中国政府要在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这是必然的，而且认为，香港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和发展对我们国家是有利的。1957 年 4 月，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阐述对香港的政策时，说：“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但究竟采取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同英国政府妥善解决香港问题？怎样才能有效地使大陆经济同香港的企业家合作？这些重大方针和政策当时都还没有、也不具备客观条件。

实践的发展，呼唤理论的创新，新理论的形成，新概念、新范畴必然会应运而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的构想。这一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继承了中国传统统一观中优秀的合理的内容，又吸取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关于统一问题的正确思想。更主要的是，它在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创造性地提出具体统一方式的新思维，从而形成了一种崭新的观念。

首先，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在坚持只有一个中国、主权必须统一的前提下提出的。这是对传统的重视国家统一的观念的继承。毛泽东极力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这些观念作为中华

1958 年 10 月 6 日《人民日报》。

1954 年 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

1956 年 6 月 29 日《人民日报》。

1984 年 5 月 17 日北京《华声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53 页。

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客观上就会影响到后人的思维方式，也是新时期的共产党人所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不管以何种形式来完成统一大业，首先必须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必须坚持国家主权的不可分性和统一性。这是实行“一国两制”政策的根本前提和根本目的。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国家的概念，随着历史的演进，已深植于中国人民的内心深处，成为人民所追求，也是唯一能接受的一种观念。

而且，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是超越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考虑的，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没有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这个出发点来构想，而是依据实际情况，看实行哪种制度更能促进整个国家的安定和繁荣。“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而是要“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这是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体现。

第二，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诉诸武力来实现国家统一。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主要是建立在统治者赫赫武功的征服上。特别是处于朝代替换时期，一个新的统一王朝要产生，必须依靠武力去推翻旧王朝和结束分裂混乱状态。秦皇汉武的伟绩，元帝清祖的功勋，无不如此，虽然也有像“和亲”政策一类的和平方式，但不是其统一的立足点，而是一个暂时的权衡措施。大陆和台湾在1949年后形成的是截然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要立足于和去求统一，是双方都不情愿的，都只能“吃掉对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方式，但不是作为主要方式而提出的，台湾方面也没有接受。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则是把和平统一视为一个基本宗旨。是在大陆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前提下，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而选择的统一方式。用和平方式，有利于保持台湾和香港的稳定，用台湾、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主体经济的一种补充，建立包括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是建立在我国长远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战略思考。

第三，“一国两制”构想告诉我们，两种截然对立的社会制度可以在一个国家之中和平共存，共同发展。按这一设想统一祖国后，香港、澳门、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大陆主体则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历朝是强调中央集权统治的，从上到下形成一整套严谨、专制的制度。历史上也确实存在着一国之内两种制度共存的国家政体形式，但它们的出现，或是历朝统治者力量薄弱，鞭长莫及造成，或是某些地区特定情况致使，诸如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等等。这种“两制”也只能是两种私有制间的共存，如奴隶制和封建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而“一国两制”付诸实施后，将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间的共存。

第四，“一国两制”是一项长远的战略决策，具有稳定性。历史上存在过的“两制”并存的例子，都是统治者迫于局势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暂时权宜之计，具有过渡性。当中央政府有足够的实力加强其统治时，或者“两制”中的任何一位统治者的地位出现更迭时，这种“两制”并存局面便很可能被改变。而“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在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建立并得以巩固；且中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总体力量较之台湾及香港、澳门具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由中央政府主动和自觉提出并实施的一项特殊的基本国

策，它具有国家宪法和具体法律的保证。因此，如果三个特别行政区之间或中央与特别行政区之间发生矛盾和争纷时，双方均应诉诸宪法和法律来解决，而不至于出现危及“一国两制”大格局的状况。所以，“一国两制”是一个带全局性的长远政策，两种制度的长期并存具有稳定性。

显然，邓小平的民族统一观基于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也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邓小平以其宽阔的胸襟，从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兴盛这个大局着眼，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的主题，不再固执于意识形态的分歧，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去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对中国传统的民族统一观作出了重大的发展，而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设想在国际事务中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十三章 和平发展新主题与传统国际观

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洞察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明确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科学论断，突破了人们长期固守的一些观念，为我们党和国家调整对内对外政策、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所以，这一思想的提出，其意义不仅仅限于外交领域，正如我们在前面已屡屡提到的，它对于邓小平建构整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都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1. 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

国际政治格局，是世界各国间相互往来关系形成的一定结构及其表现形态。它是所属时代的各种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这种矛盾运动不断变换着国际政治的内容，从而使国际政治呈现出不同的格局。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国际政治格局及其变化是正确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客观依据。

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国际环境中。这个环境制约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导致在国际战略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特别是在战争观上认识有很大失误。

刚成立的新中国面临的是东西方严重对立的国际局势，整个世界陷于冷战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一再强调，目前战争的主要危险、现代战争的主要根源来自帝国主义。“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但在60年代以前，毛泽东等领导人还是认为世界大战是有可能避免发生的。尤其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全面转入了和平建设时期。1956年4月，毛泽东经过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冷静分析，指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之所以这样判断，一方面认为是社会主义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另一方面是认为，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困难处境，决定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趋势。“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然而到了60年代及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和我党对世界战争的看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认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存在，及它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不可避免地要掀起一场新的大规模战争。因而强调准备应付世界大战。

1964年8月，毛泽东指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并作出大小三线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标志着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由原定的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为中心，转向以加强国防实力、加速三线建设准备打仗为中心。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项批示中明确指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次年7月，中共中央转发总参、总政《民兵工作会议纪要》又进一步提出，必须加紧备战，立足于打，准备早打、大打，准备打常规战争，也准备敌人把核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军队和全国人民都从思想上、物质上、政治上加紧

毛泽东 1956 年 7 月关于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讲话。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23 页。

战争准备。毛泽东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要求各项基本建设不能过于集中，重工业建设要注意“山、散、洞”原则，重要城市和重要工业基地都要有必要的防空设备等。这实质是一次国民经济的大调整，符不符合战备成了安排各项建设首先得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及党中央作出这种结论和决策是有历史背景的。60年代后，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中苏关系破裂，从1964年起，苏联开始在中苏、中蒙边境大量增兵。中印边境于1962年发生大规模战争。1964年，美军直接介入越南战争，从南线对我国构成巨大压力。1962年，台湾国民党当局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加紧武装袭扰活动，并于次年8月制定了“光复大陆”的具体措施。中国的东南西北都在国际反华势力的威胁之下。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对世界战争能否避免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我们对国际形势和周边局势认识得不很全面，估计得过于严重。

其实，6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改变了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形成了三个世界鼎立的局面。“第一世界，指美国和苏联两个具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毛泽东敏锐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但是，他没有看到，三个世界之间的联系与矛盾，已大大制约了战争的危险。例如，美国一直设想利用中国来牵制苏联，并且明确反对苏联对中国实施核突击的考虑。

由于对国际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这还是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出现反复和失误的重要因素之一。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反过来又夸大了对战争危险的严重估计。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

从7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东西欧独立自主的倾向进一步发展，第三世界崛起，美苏争霸虽然仍是世界局势动荡和恶化的主要根源，但是，制约战争的因素在明显增加。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已经成为全球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呼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开始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同时他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把握世界局势发展的转机。

早在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就认为，“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

1978年9月，邓小平强调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把这一内容作为中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

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25页，注释第42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同上，第250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7页。

同上，第127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1980年1月，当时世界上发生了阿富汗事件，伊朗问题等，80年代一开始就给人以充满危机的感觉。邓小平仍然认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的，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

1984年2月，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有个想法，……用和平方式。”

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

1984年10月，缅甸总统吴山友访问我国。邓小平在会见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没有这两个问题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意义。”

1985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明确表述了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指出：“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他进而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从而基本阐明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观点。

2. 和平、发展新主题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不仅揭示了国际形势的现状，而且富有指导性地提出了世界人民走向和平与发展的道路。

第一，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有40多年未发生世界性大战了。尽管局部的小规模的战争持续不断，但总的趋势是向和平方向发展的。“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邓小平指出：“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是因为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因素。

其一，第三世界的崛起和扩大，超级大国已不能为所欲为地操纵国际政治的发展。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

同上，第56页。

同上，第96页。

同上，第10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

际环境。“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它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二，西欧、日本和东欧也开始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人民和欧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后又都受到超级大国的控制。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国力的增强，西欧、东欧、日本独立自主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正如邓小平所分析的那样：“欧洲是决定和平和战争的关键地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东欧、西欧都需要发展，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

其三，“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还都下敢打。”首先是因为这两家拥有的武器力量，都足以毁灭对手，“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而且，“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超级大国军备竞赛导致的“核均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们之间大规模冲突的发生。

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使世界性战争推迟或避免战争的条件大为增加。但要使和平局面有根本保证，还有赖于解决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经济问题。“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

第二，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南北问题”，亦即“发展问题”。它实际上表现的是北方发达国家与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经济关系的不平等的问题。

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前大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战后，它们相继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但经济地位却没有变化，殖民时代形成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存在。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和以垄断为基础和国际金融体系至今仍维系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60年代中期以前，南北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问题开始突出。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的坐标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南北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南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其二，“南北问题”不解决，势必会严重影响到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邓小平指出：“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

同上，第10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同上，第233页。

同上，第127页。

同上，第249页。

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发展问题，也难以解决。”“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所以邓小平说：“南北问题不仅是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

“南北问题”十分突出，还表现在它与“东西问题”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之中。和平是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发展又是和平的最根本保证。南方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势必造成这些国家和所在地区局势的动荡，为大国的插手和干涉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增加对地区和平与稳定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现实威胁和潜在威胁。反之，若北方国家能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公正、合理地解决好“南北问题”，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

“南北问题”如此突出，在国际政治全局中具有如此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所以，邓小平强调指出：“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第三，中国是解决和平和发展问题的重要力量。

建国后，中国政府制定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在外交政策上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

1984年，他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中国维护世界和平、搞好经济建设的战略思想。他说：“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要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

“我们现在是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因此，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

1985年3月，针对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的不正确看法，邓小平指出：“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有力量，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大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同年4月，又向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强调：“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

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和影响。在1982年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关于停止军备竞赛和实施裁军的四条具体措施。这些主张和建议对后来美苏裁军进程，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上，中国政府立足于和平的方式，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为许多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1985年，中国政府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9页。

同上，第106页。

1986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同上，第50页。

同上，第57页。

同上，第104页。

同上，第10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页。

第四，走向和平与发展之路。

如何走向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在各种不同场合的谈话中有许多的论述。

其一，“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导致当代世界局势动荡的主要原因，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所以，中国不搞集团政治，不依附于任何集团，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

其二，加强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实现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邓小平指出，解决“南北问题”，一方面，“当然要靠南北对话”。另一方面，“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南方国家以一个声音说话，会大大改变南北力量的对比，所以，“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

其三，“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邓小平指出：“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中印两国首先倡导的，最初主要用以处理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欢迎和接受，并被用来处理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在80年代，邓小平又提出用这一原则处理一个国家内部问题，从而形成其“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抓住了当今时代的本质，表明世界已进入和平和发展的新时期。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和资本的高度国际化，已使发达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达到空前的程度，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主要通过协商、对话等和平方式来缓解相互间的矛盾。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重任。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条件就是必须保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南方国家为打破旧的经济秩序，对发达国家的斗争，也主要使用经济手段，坚持对话和合作的方式。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也以共存下发展经济的竞争取代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截然对立。

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是指导新时期中国内外政策的纲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进行大胆而稳步的改革。由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建设，要发展经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坚定地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原则上，适时地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以和平与发展为目标，努力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所有这一切，正是基于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论断而作出的重大抉择。

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时

同上，第56页。

同上，第128页。

同上，第56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

同上，第96页。

代特征的新论断。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问题曾作出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为追求高额垄断利润，相互之间必然会围绕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进行斗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就必然会引起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经济基础，使帝国主义战争绝对不可避免。从而把本世纪初的时代看作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根据高科技条件下国际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新的变化，结合考察了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和趋势，在 80 年代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这意味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已成过去，标志着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论的确立，从而为世界各国人们指明了今后一个长远时期内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奋斗目标。

3. 对传统国际观的发展

中国远古，就有“协和万邦”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处于乱世，百家争鸣，儒、道、墨等都不主张战争。墨子设想的“尚同”社会是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世界，主张以“非攻”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政策。老子更是主张“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不争”。甚至孙子也指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孙子·谋攻》），不主张穷兵黩武。儒家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学说，追求的是以“仁”为本，以“和”为用，追求世界的和谐。所以，孟子设想不用战争的方式来统一天下，提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主张的是“仁战”。当然，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要实现这样的理想是很难的，但是，上述思想对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思维影响甚大，中国长期的统一与安定与此不无关系。

中国统一以后，尤其是汉唐时期，中华民族的文明更是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中国对周边民族和国家大都采取和平政策，经济、文化的交往也相当频繁。正是以“仁”为本、以“和”为用的“厚德载物”的胸怀与性格，使得中华民族大量地吸收各种文化，如佛学等，加以融合；同时又向周边民族与国家传播了中国的文化。甚至异民族的入侵，也往往被中国先进的文化所征服、所同化。

但是，明末清初以后，一方面西方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因素增加，经济实力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长时期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失去“汉唐气象”，强化了盲目自大的心理。明代曾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只有中国值得称羨，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甚至鸦片战争以后，天朝帝国沦落的同时，畸形的民族虚骄心理并未完全改变。盲目自大，导致闭关锁国，看不到整个世界的发展态势，自然谈不上有什么国际观。

鸦片战争爆发，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逼迫中国面对现实的世界。有识之士开始提出“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但是，近百年来自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一个个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心理

创巨痛深。在人们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另一方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主义也开始滋长，出现了义和团等盲目排外运动。但是，无论如何，中华民族要从民族压迫的苦难中站立起来，除了前仆后继的斗争与反抗，别无选择。因此，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国际观念，其主流受到了以生存竞争为特征的社会进化论的深刻影响，中国与世界主要的是对立与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眼光远大，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共领导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建国以后，毛泽东等十分注意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且提出了“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富有创见的原则。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由于中国当时所处的特殊的国际环境，也由于毛泽东等所绷紧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弦，两者互为因果，过重地估计了国际和周边地区的形势，在准备战争思想的指导下，不仅忽视了经济建设，而且造成了尤其是与经济发达国家的隔陵。

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当代世界时代实质的深刻把握，是对毛泽东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提出了三种世界和平力量的新观点。不但整个第三世界是和平力量，作为发达国家的第二世界是和平力量，而且作为第一世界的美国和前苏联的人民也是和平力量。这就从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发掘和阐明了世界和平力量，是从整个人类根本利益的高度来审视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把全世界人民看作是历史的主人和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

这还表明，中国观察国际问题及参与国际活动，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主要标准，而转向务实与多样性。1986年9月，邓小平指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突破了以社会制度来划分世界的思维模式。

这还体现了一种全球意识和时代意识。邓小平正是从全球角度来分析世界形势，从而把握住了世界的主要特征；正是从时代前进的角度来看社会发展，从而把握住了世界的主要趋势。这是一种以开放的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态度来考虑的国际战略宏图，跳出了单纯从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来观察问题的思维方式。

这还反映了国际舞台上的竞争是经济实力的较量的强烈观念。在国际事务中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来确定立场的方式已经不适用了。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力量，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在国际舞台上开展外交活动。中国也只有通过振兴经济，才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在克服了封闭的民族主义的狭隘心态的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厚德载物”、以“仁”为本、以“和”为用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在当代国际条件下的弘扬光大。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之

一。邓小平不仅从世界的相互依存与发展的角度去观察与思考国际问题，不再拘泥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且，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共同开发”的建议，对于解决现在的国际争端都是一个极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因而在海内外受到了普遍好评，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这里，我们还想附带评论一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 1993 年在《外交事务》夏季号上发表的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的有关观点。该文主旨是在论证今后一个阶段，世界的形势将继续以“冲突”为主要特征，而且其根源是由于文化的不同引起的。该文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他把现今的文化分成“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而且在“非西方文化”中又特别突出地提出“儒家—伊斯兰的联合”，并且认为“儒家与伊斯兰的军事结合已经形成”，而这种“异文明间的种族暴力冲突的升级最危险，也最可能成为导致世界大战的原因”。这是亨廷顿依据已过时了的“西方中心论”而作出的违背时代潮流的结论。其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东方文化的隔膜和敌视而产生的偏见。他根本不了解儒家文化以“仁”为其核心，主张“和为贵”，提倡“普遍和谐”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千百年来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现代中国更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根据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更将始终不渝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以，亨廷顿的结论是极其荒谬的。

第十四章 非凡的个性与作风

长期以来，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那就是：只将研究的注意力放在思想意识领域，指出此位或彼位思想家比前人多说了些什么，满足于称赞思维上的创新，却没有关注民族文化的真正的实践的变革以及为这些变革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实干型人物。在世界史学潮流转向社会经济的时候，传统文化研究的缺陷便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反观邓小平，我们或者说，他为我们这些研究者改正自己的错误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同时，他也是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改造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光辉典范。党的十三大报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条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在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建设、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党的十四大报告说：“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两段话是对邓小平功绩的恰当总结。

邓小平在开创中国文化新阶级的过程中，体现出了鲜明而独特的个人风格和作风。如果作个最粗略的对比，也许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以诗人的浪漫精神和幻想、热情打破了一个旧世界，邓小平则以实干家的实干精神，扎扎实实地建设着一个新世界。他具有一切建设新世界的伟人应有的素质：踏实、肯干、大度、豁达、新意百出而又不脱离实际、重视历史又放眼未来、举重若轻而又严谨慎重……总之，他有着非凡的领袖气质，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他的风格和作风，构成了他对中国文化新阶段所做贡献中的有机的一部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格理想始终是文化理想的组成部分。伟人不仅以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影响人世，同时也以他们的个人人格垂范后人。伟人的标志不仅在于做什么，而且在于怎样做。孔子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他的“仁”、“礼”的立张，同时他还以“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六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的谋道不谋食、勤勤星星同时又乐天知命的人生形象和理想，感染了后来无数的儒生。诸葛亮留在后人心中，不仅仅是治平西蜀的政绩，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风格、作风。从这个意义上，探究邓小平在开创中国文化新阶段时的风格和作风，意义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我们认为，邓小平非凡的风格和作风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于邓小平的整个理论之中，也是邓小平非凡风格的基本点。而从风格的角度透视，我们可以发现，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邓小平

的身上，突出地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承认现实，正视现实。

承认现实，正视现实，这个实事求是的最基本的前提，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国际、国内、省、县形势都是一片大好，这一类每篇文章、每个报告都相同的开头套语，正昭告着实事求是精神的泯灭。“现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类一段时期中每个中小学生会写的词句，也表明了当时的中国人不能放眼正视世界状况。“文革”之中，这种歪曲现实以适应政治需要的荒谬宣传达到了它的顶点，我们长着一双眼睛，却看不到世界、中国和自身。

承认现实、正视现实，在原始人也许不难，但到了虚幻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全面地对一切社会现象给予当然的解释的时代，承认现实便成为一件需要勇气、甚至需要承受各种压力和痛苦的事情。“文革”时期，我们把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心、革命的中心、人类社会的楷模，在严密的封锁制度下，我们无从得知世界各国人民的真正生活状况。在这样一个时候，邓小平首先把中国落后的事实赤裸裸地摆在中国人民眼前。早在1977年5月，他就说：“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技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他说：“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1978年9月，他说：“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这些说法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宣传工具逐步向香港、东欧开放，再介绍西欧、美国乃至台湾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才彻底打破了“文革”以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和自欺欺人的心态，人们才开始清醒认识现实和自身，这同样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判明中国落后的同时，需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二年间错误理论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的定势，它更需要排除的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在面对世界时的尴尬、愤恨等种种焦虑。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天朝处于世界的中心已是三千年来不争的心理事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孟子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从秦汉始，中国就认为自己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中心。直到清代，这种世界观依然延续未改，因此，郭嵩焘直言中国不如西方，就遭到守旧官僚乃至一般百姓的唾弃，他卸职回乡后，地方官员傲不为礼，大街小巷贴满斥骂他勾通洋人的揭贴，晚年受尽寂寞和凄凉。从承认西方的科技先进，到承认西方的政治制度先进，再到承认西方文化的先进，每一步无不伴随着极端的喧哗与嘈杂，主张此说者无下面对强大的压力。要使中国从天朝第一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不啻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0页。

同上，第128页。

在现代，由于奇迹般的革命的成功，中国人的自我膨胀感又被重新认同，中国从政治文化意义上重被认为世界秩序的中心和楷模。正是邓小平，向人们展示了世界的真正面貌，冒着在政治、文化上被人误解、批判的危险，承认了现实，正视了现实，使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了坚实的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次伟大的革命。中国经济从较落后走向高速发展。而十三大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理论，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结出的硕果。

正视现实、承认现实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那就是正视历史、承认历史遗留的一些现实问题。在这样的基础上处理历史的遗留问题，就使得各方面更容易接受，更加圆满地解决问题。香港、台湾、钓鱼岛等问题的处理便是在邓小平实事求是的风格下进行的。对香港的主权，邓小平明确地宣布，不需讨论。但是，从今天的现实出发，在收回主权之后，“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我们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制定我们在十五年中方针政策以及十五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对他们也有好处。”对台湾和香港，邓小平后来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主张，这是正视现实、承认现实的清醒的做法。“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对解决国际争端，邓小平还提出一个“共同开发”的办法。钓鱼岛问题，邓小平就说：“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

还有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些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我党的历史上更没有先例的作法，如果没有实事求是、正视现实的精神，是根本不可能做出来的，如果用理论来推演，更加不可想象。“一国两制”最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现实主义精神。

第二、不争论，干实事。

邓小平颇为自豪他说过：“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这样居功不疑的姿态，在这位实在的政治家的身上是不多见的。这也正说明了不争论在邓小平实事求是风格中的重要地位。

不争论的第一件典型事例是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正如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所说的：“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页。

同上，第59页。

同上，第87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7页。

同上，第374页。

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于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的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在当时，邓小平这种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独特方法，对干部的震撼力极大。几十年来极“左”的一套，严重地禁锢了广大人们尤其是干部阶层的聪明才智，凡事先从“主义”上着眼是他们的共同特征。“辛辛苦苦三十年，一退回到解放前”，生动地反映出当时他们的心理状态。可以想象，在那样的情形下，如果先行辩论，决出新老体制孰优孰劣，再行推行新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不争论”、“允许看”的方法，突出地体现了他高超的领导方法和非凡的风格。他坚信，广大农民是最了解怎样搞好农业生产的，一些清醒的基层干部、尤其是60年代初有过相关经历的基层干部是支持责任制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是能显示它的威力的。果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一举扭转了我国农村生产多年停滞徘徊的局面，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这正是邓小平坚信真理在手、不屑争论的体现，一个胜利者的高度的自信，对人民群众的判断力的坚信，就是这次“不争论”的深刻内涵。

而不争论的另一件典型事例，是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1980年正式设置的。四年后，邓小平前往特区视察，肯定了特区的成绩。邓小平在1987年6月欣慰他说：“现在我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实际上，情况远没有这样乐观。直到视察南方讲话，仍然可以发现党内、国内还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者的存在。否则，也不用邓小平再三断言特区姓“社”不姓“资”了，“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有些人一直来在问：是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呢？还是要贫困的社会主义？当然他们不会说后半句话，但是，前半句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后半句。邓小平历来对“文革”中那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一类口号深恶痛绝。他非常看不惯有些理论家、政治家，用“左”的大帽子吓唬人，说什么“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正是因为如此，冒着种种非难，邓小平本着“不争论”的原则，主持开办了特区，支持发展特区。这是针对“文革”以前将意识形态功能放在一切之前的重要反拨，是邓小平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根本思想的体现，是对那些惯用“左”的棍子、帽子的理论家、政治家的极端蔑视。这是邓小平“不争论”的又一内涵。

不争论的第三件典型事例是市场经济问题。邓小平自1979年11月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以后，始终予以坚持。但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观总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人们的思想上禁锢极深。邓小平没有强行推行这一观点，而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程度的提高，循序渐进地加以引导。从而我国经济改革中逐渐地由计划经济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

同上，第37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9页。

同上，第372页。

论开始多了起来。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所以仍提“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是因为在党的文件中已经明确，不会引起新的争论。随后，他明确指出，“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直至1992年初，他在视察南方讲话中再一次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这一事例表明，邓小平的“不争论”不仅是坚信群众的实践，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框框，还体现了邓小平十分尊重人们的认识水平、接受程度的现实的态度。这三个事例共同构成了邓小平“不争论”的完整内涵。

不争论是与于实事紧连一起的。归根结底，是一个用语言来影响世界、还是用行动来影响世界的问题。本来，一般地说，思维和行动是人密不可分两种能力，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有先哲探讨知与行的关系。程朱以为知先行后，王阳明则倡知行合一，王夫之主行先知后，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则以为知难行易。到今日止，这种主张先从改革人的世界观开始、改革了人的世界观就能改革社会的思想模式仍有相当的市场。尤其是“文革”中极端重视意识形态的做法，使语言戴上了神圣的光环，语言较之行动具有某种优先权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改造世界，毫无疑问，还是要靠行动。邓小平就是重视行动甚于重视语言的实干家。他朴实的观点，正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沉默寡言，善于决断，善于实事，不说空话。这种鲜明的个性，给中国从空言到实干的转型起了深刻而重大的作用。

2. 开放、创新

开放与创新，也是邓小平风格的基本要素。开放是指以博大的胸怀开放性对待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创新则是以他人的经验为借鉴，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打破旧的不合实际的各种条条框框。正是在这一贯姿态中，表现出了邓小平作为伟人的特性。

第一、开放。

开放，在邓小平的风格中，决不仅仅等于经济上对外开放，而是应该说，对外开放是邓小平整个开放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并非唯一的部分。开放，是指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全世界一切文明的优秀的成果，以“拿来主义”的做法，吸取精华，扬弃糟粕，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它所反对的，是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划地为牢、自我禁锢的心态。开放的风格，在邓小平的大力提倡和身体力行下，已经部分地成为我们民族的新风格。

早在1977年8月，邓小平出来重新工作不久，就谈到了开放的问题。他不是谈经济问题、而是在讨论科学和教育工作时谈到反封锁的态度的：“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同上，第312页。

要提倡学术交流。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个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我们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把对待封锁的态度提到那样的高度，反映了邓小平对开放的思考非常深入且一直没有中止。而 1978 年 3 月的《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在科技领域首先打出了开放的旗帜：“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在这里，邓小平流露出一副世界性的眼光：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科技水平低下，我们才需要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先进了，也需要学习外国。这就大大有别于一般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做法，而把全人类放在一个共同的基石上。既然同是人，总可以相通，总可以相互学习。这种开放性的胸怀是搞阶级斗争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而正是这一点，奠定了邓小平的整个开放思想的坚实基础。

从此开始，邓小平提出了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外资等一系列思想，并且创办了经济特区。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邓小平的开放思想在国内形势的飞速发展的同时，又有了大幅度的创新。1984 年 11 月 1 日，邓小平说：“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这里说的开放的广度，尤其是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列入开放的范围，更显示出邓小平的睿智和远见。遗憾的是，近年国内在这方面似乎没有迈出够大的步伐。当然，要对第三世界开放，也许需要一个历史的契机，不过，邓小平的思想无论如何值得深刻领会，而近年来我们对于亚洲四小龙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邓小平指出的前进方向的。从开放的深度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经营方法。”

这比起 80 年代初期强调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根本性的突破。尤其是自邓小平视察南方以来，市场经济作为一个独立主体摆脱了似乎是天然的资本主义的附庸地位，开始为社会主义所用。而关于市场经济的种种知识又不仅仅是经营方式或管理方法所能涵盖的，如此，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我们在开放上必须更加增大力度、提高深度，真正把一切有利于我们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我们民族在开放上又往前迈了一大步。如果回顾一下 80 年代以前我们那种谈“洋”色变、谈“资”色变的社会状况，我们便可明白自己的进步到了什么程度，整个文化的开放性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57—58 页。

同上，第 91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99 页。

同上，第 373 页。

到了什么程度。

实际上，我们民族的闭关自守决不仅仅是近几十年的新毛病，相反，它恰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保守性的根深蒂固的表现形式之一。邓小平曾就这个问题作过简单的追溯：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如果我们再看看鲁迅的论述，当会更清楚些。“遥想汉人多少阔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当然，究竟是国力衰弱引起了闭关自守，还是闭关自守使国力衰弱，在这里一时难以说清。但传统文化在这一方存在重大的缺陷则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邓小平在变革民族封锁关闭的传统文化中所起的伟大作用。一个古老的民族，一个世界上的大国，其领导人应该胸襟宽广，人民对外界毫不惧怕，才有泱泱大国的气度，才有希望充当历史的弄潮儿。

第二，创新。

要把一个历史悠久、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搞好，势必不能亦步亦趋，萧规曹随。毛泽东当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靠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路。邓小平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各方面都要探索新路子。创新的必要性有目共睹，难的是如何创新。总结一下十多年伟大实践的历程，大致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创新风格主要有两点：

一是创新与实际相结合，时时注意新路与实际情形的吻合，少做纯理论的推导而重与实践的接轨。如果把邓小平与毛泽东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当更能说明问题。当然，毛泽东也十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是毛泽东确也有天然的哲学家气质。每当革命发生重大转折时，他总能够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井然有序地分析新阶段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前途等等一系列问题，阐明社会各阶级在当时的态度、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用这种方法，科学地指导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阶级的革命斗争。但是，在毛泽东的晚年，他仍然执着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坚信党内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必须发动疾风暴雨般的又一场革命时，他与实际情形的差距就非常远了。确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人类文明之路上的创新。但是这种创新不与实际情况相结合而是严重背离，结局只能是犯重大的错误，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邓小平正是以晚年毛泽东的错误为鉴，坚决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时刻注意一切从实际出发，少搞纯理论的推导，在改革初期，提出“猫论”、“摸着石头过河”、“干了再说”等一系列思想，这些思想的实质，都是坚持不在事情发展的开端搞一套完整的理论，免得理论使实践削足适履，而注重理论随时回到实践中作检验。正是在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反复循环中，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基本形成，并且成功地指导了我国的改革。

正是因为这样做，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才没有犯大错误，而且一发现问题不对就赶快改。一个伟大的理论常常掩盖着很多实践的盲点，相形之下，邓小平的做法更为可取，尤其是在中国这么一个情形极其复杂的古老国度。

邓小平的这种风格特点，本质上也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如果说，19世纪的思想家们善于构筑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以求包罗万象，20世界的思想家则捣垮了庞大体系的基石，将真理变得更加具体。创新由此更承认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自己更可能犯错误。问题只在于犯错误不要紧，改得快就是了。所以，相形于纯理论的推导，邓小平更提倡在实践中创、冒，等到实践中确已做出成绩，看准了，再在理论上加以提高。他说过：“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啊，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这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承认自己会犯错误，就更加提高了实践在创新中的地位。这是邓小平成功创新的一大法宝。

二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邓小平说过：“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

他还说：“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这一方面最好的例子还是农村改革：“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邓小平还高度评价乡镇企业的发展，非常推崇群众的创造性：“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各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的。”邓小平在多种场合，以各种角度讲群众的创造性，把党的群众路线真正落到了实处。

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需要前提的，那就是，在什么方面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文革”乃至“文革”前的一段时间，我们也讲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但当时重视的是群众在“革命”即阶级斗争方面的首创精神，而阶级斗争搞得轰轰烈烈，群众得不到什么实际利益，群众的首创精神自然也无从发挥，得志的只能是一些热衷于搞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有一些见风使舵、谄媚献媚的小人，不把立脚点落实到群众的实际利益，群众就无从真正发挥首创精神。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果断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坚持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伟大的实践光辉的特篇》，1992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8页。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真正得到发挥。农民先是全力种田，取得粮食丰收，再是兴办乡镇企业，现在全国各地涌动的民工潮，既是资源配置优化的好例子，也是群众为改善自身生活水平的新招。归根结底，群众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首创精神，目前党中央能够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无不与把立足点移到人们实际利益有关。而这一点，也是邓小平一贯强调的。

3. 非凡的作风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团的核心，邓小平有着非凡的工作作风。这些非凡的作风一方面显示出他的特殊个性，同时也与中华文明史上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作风类似。它构成了中国文化新阶段的一个有机部分。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不可能不在邓小平非凡的作风中得到巨大的启迪。

第一、重视人才，善用人才。

人才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来政治家最重视的问题之一。毛泽东也曾说过：党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便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从70年代复出以来，便不遗余力地强调干部问题，强调应该选拔一些靠得住的接班人。早在1975年，他就说过：“现在有些省提拔个省委书记都觉得困难，我看不会那样难吧。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一大堆，为什么连个省委书记也找不出来？我想问题恐怕是没有注意或者注意不够。”在抓整顿期间，他狠抓领导班子的建设，用了几个人才，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指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老同志的经验、立场当然不成问题，但是他们精力毕竟不够了，更需要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1979年至1982年中，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并且主持通过了建立顾问委员会、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办法。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现人才、使用人才便有了新的内涵。在这里，不仅仅是依照老经验办事的问题，而是老经验能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问题。“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说‘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而“一般地讲，老年人习惯势力多一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考虑问题凭自己的经验。”这样，选拔年轻人才的出发点便突破了学习经验的局限，而更加放眼世界、放眼现代化、放眼未来。他用人胸怀开阔，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以前多次调动工作时不带人，连勤务员也不带。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他强烈呼吁，“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

第三代领导集体就是这样组建起来的，并且稳定了大局，促进了经济和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0—221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242页。

同上，第300页。

社会的发展。邓小平挖掘人才，不求全责备，而是看主流，用了以后，自己在旁边，自觉让位，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应该说，在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过程中，邓小平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为大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当然，人才决不仅仅是党政领导机构的人才。中国不仅应该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也应该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经济管理者、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只有整个社会都能使人才脱颖而出，国家的现代化才有希望。邓小平所以也经常强调发现各方面的人才，解决知识分子的困难，制定一系列鼓励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他说过：“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人才问题，别的不说了，今天就讲两点。第一，能不能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实解决，要真见效。第二，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他十分重视科技的发展，因此也十分重视科技人才，重视知识分子，在全社会培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视察南方时他提出，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正是在这样的方针指引下，许多专业人才脱颖而出，社会出现了勃勃的生机。

第二，过去争论一风吹，向前看。

在本世纪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同时伴随着众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在拨正历史航向的时刻，如何解开怨结、聚集力量，便成了领导人物的第一大难题。邓小平用他明快、直截的工作作风，提出了过去争论一风吹、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基本做法，解决了众多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又鼓起了前进的勇气，极大地推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初进。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理兄弟党的关系是非常不易的。苏联共产党有一段时间充当了世界革命的领导角色，难免做过一些指手划脚瞎指挥的蠢事。我们党在极“左”思潮泛滥期间，也对许多兄弟党发表了指责性的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了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我们先后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意大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以及欧、亚、非与拉丁美洲的一些共产党恢复和发展了关系，1989年，又与苏联共产党恢复了关系。他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很多空话。”过去需要回顾，也需要讨论，但“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历史问题要讲，讲了，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8—109页。

同上，第378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页。

“这些问题一风吹”，“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

对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等等的关系，邓小平本着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长明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原則，也采取了向前看的做法。像我国与印度长期以来存在着矛盾，还爆发过边界战争。两国人口加起来有 17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邓小平指出，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要看到 50 年代中期合作得很好的友谊，解决边界问题，“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对一些领土争端，邓小平提出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合资经营，共同得利。在香港和台湾的问题上，主张“一国两制”，保护民族的共同利益，所有这些，都是本着不纠缠历史旧帐、向前看的精神，解决历史问题的典范。

中国国内的情况当然与国外有很大差异，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解决许多历史冤案，就无从调动广大人民、干部的积极性。但是，邓小平仍然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工作的基本方针。他指出，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些，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文化大革命”，1978 年，邓小平说要总结，但不要匆忙去做，直到 1985 年，才彻底否定了“文革”。这样不至于引起剧烈的社会震动，又清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种高明的领导作风，确实是值得后来者借鉴的。宋代的党争与明末的三大案之争，其间恩怨，一时确也难以说清。但统治者未能及时制止党争，而是卷进纠葛之中，越弄越糟，不但澄清不了是非，反而弄得国破家亡。古代的低下与现代的高明，其差距确不可以道里计。

第三，果断处理重大问题

邓小平工作放手，平常沉默寡言，遇事不轻易表态，但是，面临重大问题时，他果断坚决，当断则断，毫不手软，保证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这种将刚柔、虚实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作风，是很值得人们学习的。

早在 1979 年，当党中央已经提出当前及其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后，一些地方出现了闹事现象，如冲击党政机关，静坐绝食，阻断交通，破坏工作、生产和社会秩序，游行示威，还有人提出一些反动的政治口号，与外国敌对势力勾结。对这种情况，当时也存在着疑惑和犹豫。因为林彪、“四人帮”时期确实遗留下许多社会问题，不民主的状况确实存在。种种复杂的现实原因，使人们难以清晰地作出判断。邓小平则明确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可能提高，经济也不可能发展。他果断地制止了萌发于全国各地的混乱，统一了思想，指明了方向，让中国这艘航船稳固地在前进的路上航行。1987 年，1989 年，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91—295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9—20 页。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7—148 页。

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邓小平果断地作了决定，避免了事态的扩大，排除了干扰，保证了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在 1989 年后，极“左”的东西在一段时间内得以蔓延。特区建设被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市场经济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形式主义猖獗，纠缠理论是非而不办实事。这股风气挟一时之余威，似乎占尽上风。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略与大无畏精神，在视察南方途中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果断地抨击了极“左”的东西，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坚决地扭转了整个不良态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邓小平的非凡的作风内容是多方面的。他的胆略、魄力、远见都是超凡的，他的胸襟又是极其宽广的。在这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罗列全部的细节或内容。只要看到，邓小平的非凡风格和作风，凝结着古老中华的智慧，也有鲜明的时代内容，同时有独特的个人印记。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本来流转，使中国文化在新世纪放射出夺目的光辉，而它本身也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文明之花。

结 语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的历史，外国人习惯称之为“邓小平时代”，而就其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而言，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自然，在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形成并指导着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使得中国文化得到创新、走向了现代。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所蕴含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来源于他丰富的生活经历，在中华民族的土壤和氛围中所凝结成的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思维特点和个体心理特征；来源于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吸取；来源于他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整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的深刻理解；来源于对民族大众的需求、智慧的深切关怀和尊重。由此，构成了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皮肉联系。

前述各章，较详尽地论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以及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发展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这里，就上述内容试作如下的概括：

1. 邓小平与中国哲学思想的演进

中国传统哲学是从人的主体立场出发，将宇宙与人生、自然与社会整合考虑。一方面，思维与认识不仅以人之主体实践为最终目的，另一方面，对世界变化与运动的理解是被充分置于谋求天道与人道之相互和谐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它就具有两个极为显著的特点，一是在认识论方面重知行，重实践；二是在方法论上强调阴阳为道，辩证思维。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精神几乎在所有的思想流派中都有所体现，尤其强调认识的实践性和实用性、实效性。中国传统哲学发达的辩证法思想，充满了民族思维的自身特点。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传》），“万物负阴而抱阳”（《道德经》），这是中国哲学强调变易、辩证与和谐的基础。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哲学上述两大特点，从而在强调主体实践和辩证思维方面打上了中国哲学的烙印。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尤其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关于“黄猫、黑猫，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和“要照辩证法办事”的著名论述，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显著特征。

邓小平提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的观点，对于中国认识论思想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认识论、其知行观是建立在伦理实践、身心体履的基础之上的。例如王阳明所说：“如言学孝，则必服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传习录》中）中国传统哲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将个人主体的道德修养的完善与社会主体的完成与显现联结在一起，所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毛泽东撰写《实践论》，对中国古代知行观作了科学的总结，他指出：“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也就是

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实践置于第一的地位，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检验认识的标准；毛泽东还把实践作为“社会实践”进行认识，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伦理践履及其对社会的作用，而是把人民群众看作社会实践主体，并提出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实践形式。

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显然，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正确地认识世界，更在于正确地改造世界。前者为“知”，后者为“行”。只有通过“行”（实践），才能确定主观的“知”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在。所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实践本身又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经验性，实践的形式繁复多样，有的实践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是对人类社会漫长实践的高度概括，是具有严密逻辑的理性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是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上的，它自觉地指导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并且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离开了这个本体，人们的认识就容易被实践中的表面的、片面的或暂时的现象所迷惑。长期革命斗争的胜利实践，使毛泽东过度地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大跃进”时期，他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心主义观点予以相当程度的欣赏；他偏爱三大实践形式中的阶级斗争实践，尤其执著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陷入了唯心史观的泥淖。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自然带有中国传统知行观过于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伦理的作用的某些痕迹。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论述，在价值评价这个环节上对中国社会的主体实践作了界定，规定了当前我国社会实践的基本方向，从而使本体论和认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中国的传统哲学真正确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邓小平进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使中国哲学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气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曾居世界领先地位，并有许多蜚声中外的科学技术巨著，如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元代王桢的《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但是，至近代，当西方在科学技术上迅猛发展的时候，我们却大大地落后了。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主流，重视人伦关系而轻视自然的知识。《论语·子路》中记载了孔子对樊迟请学稼的否定，所谓“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乐记》）。

毛泽东重视生产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而且，他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视的。1963年，他在听取聂荣臻同志汇报1963—1972年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搞上层建筑，为了发展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在这一年，他在一个批语中把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并称为三大革命实践活动。但是，在毛泽东晚年，由于片面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科学技术有所忽视。学校教育以培养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成长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目的，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反对所谓“智育第一”、“白专道路”，否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这些观点折射出中国传统哲学重视人伦和轻视自然的思维定式。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同时这也是根据当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对社会进步的

巨大作用，根据当前国际上的经济竞争实质上已经是科技的竞争的时代特点而提出的新思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思想的确立，弥补了中国传统哲学偏重人文精神而轻视自然知识的缺陷。杨振宁先生在《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认为，“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中抗拒吸取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但是这种抗拒在今天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识。”在当代世界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高度渗透的趋势中，中国哲学强调关联性、有机性、创造性与和谐性的特点，在哲学与科技领域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邓小平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充分反映了他的思维特征充满着中华民族所固有的辩证法精神，而这种辩证法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哲学方法论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论述；尤其是邓小平大力倡导的对外开放、和平发展新主题的战略思想，其中所透析出来的开放性思维与整体性思维的特点，是对传统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古代传统辩证法是朴素的、直观的，道家以阴阳变易为基础，老子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重视事物矛盾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特别重视事物对立面的互相转化，如所谓“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等等；孔子从人道角度提出了人生修养的“执两用中”、“致中和”的“中庸”态度，强调事物的度与和谐。这种思维具有强烈的整体性，其形成来自于对天人一体的强烈信念。毛泽东、邓小平的理论，都具有这种注重矛盾运动的整体性思维的特征，他们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发展了中华民族的辩证思维。毛泽东著《矛盾论》，着重谈方法论问题，这是中国辩证法思想发展的一座丰碑。他使得传统的对经验事实的实用化的朴素概括和抽象的思维，具有了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使得整体直观的思维模式建立在具有坚实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从而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实现了向现代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的变革。但是，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血亲伦常等级的社会结构之中，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而其整体性的思想却又有其封闭性，这就是老子所谓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老子忽视矛盾转化的条件性，他对矛盾转化的论述极易导致相对主义，例如庄子。另一方面，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在政治与战争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发展，又具有兵家辩证法的特征。在这里，强调的是矛盾的斗争与转化。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思想亦具有浓厚的兵家辩证法色彩，他的军事著作和策略著作，同时也是辩证法的名著。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肯定孔子中庸思想的意义，以反对两极性思维。毛泽东特别强调对立统一规律，他的《矛盾论》就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展开的。60年代以后，毛泽东逐渐认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就是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与否定之否定都不是基本规律。对于这一观点，目前学术界存在分歧。但是，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指的是矛盾转化的发展与联系的过程，离开了这个过程，矛盾运动就成为无休止的自我循环。那么，辩证法的形态又退回到了直观的、具有主观随意性的朴素

见《中国科学基金》1994年第2期。·999·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5—147页。

见《毛泽东哲学批评集》，第505—50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形态。一方面，矛盾的对立和斗争绝对化了，毛泽东晚年又把对立统一规律简单化为一分为二，在政治领域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中庸之道，所谓“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另一方面，由于否定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依存，其思维又趋于自我封闭，唯我独尊，陷入形而上学的误区。毛泽东晚年辩证法思想中的不足，与中国古代兵家辩证法的传统和封闭的自然经济基础当有所联系。

邓小平对于辩证法的贡献，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其整体性的思维走出了传统思维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狭隘空间，而与高科技、信息化的现代社会联系起来，形成了开放性的、创造性的思维。这就是敢于破除迷信，大胆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开创性地建构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在邓小平的全部理论中，对外开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邓小平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邓小平把对内改革也称为对内开放。这样在经济建设上也改变了小而全的、条块分割的以及闭关锁国的思维定式，这也是邓小平开放性思维的重要体现。第二，其整体性的思维纠正了毛泽东片面强调矛盾的对抗与斗争的缺陷，在重视矛盾的斗争性的同时，也十分注意矛盾的相互依存及其同一性。例如，重视多种矛盾的协调与统一，诸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的统一，发展经济与政治稳定的统一，建设物质文明与建设精神文明的统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和共同富裕的统一等等，这一思想内在包括了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深深刻意蕴，与以往的“钢铁元帅升帐”、“阶级斗争为纲”在经济和政治上急于求成的极端思想大异其趣。更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根据当前世界发展的客观实际，从矛盾斗争中寻求共性，建立起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国际战略和“一国两制”的民族统一政策，在国际领土争端问题上提出了共同开发的新颖设想，他所提出的改革开放决策也是基于吸收人类共同文明的强烈信念，而不拘泥于传统的关于姓社姓资的旧框框。上述思维是对中华民族注重整体、和谐的思想在现代意义上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2. 邓小平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变革

中国是一个重伦理的国度。中国古代尤其是以伦理为本位，特别强调用道德来评判社会生活、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使得传统哲学与政治都带有极浓厚的伦理色彩。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我国的伦理思想十分丰富。其中既有反映封建道德的伦理思想，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也有大量反映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伦理思想，如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推崇仁爱原则、强调“厚德载物”，强调整体精神、公而忘私，重视修养践履、强调道德的主体能动作用等等内容。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关于公私之辨、义利之辨和理欲之辨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与变化。

邓小平关于坚持“两手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是重视道德伦理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认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同上，第117页。

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上述内容，即属道德、伦理的范围。邓小平特别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他强调要抓思想政治工作，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抵制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他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和重要目标，反映了我国历来重视道德伦理教育的传统，也是对毛泽东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方法等思想内容的继承。

同时，邓小平也扬弃了中国传统伦理本位的思维方式。他认为精神文明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层意思是，精神文明的建设要为物质文明的建设服务，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另一层意思是，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建立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之上的，“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他还认为，精神文明的建设，必须与法制建设结合起来。所以，他又时常把“两手抓”作“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阐述，他主张“使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精神文明的问题。这样，就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道德伦理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与意义，这是对传统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而且，邓小平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也是对当代世界现代化经验的总结，对世界的现代化理论是个重要贡献。

邓小平关于“四有”人才的论述，弘扬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内容的精华。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他又说，在“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邓小平的上述论述，可以说集中地概括了中国古代传统伦理思想内容的精华。

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是中国优良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先秦儒家所强调的孔颜乐处，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已经凝聚成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有的价值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这种追求在人生价值观中的体现。因而，它总是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人生哲学相互联系，同乐以忘忧，艰苦奋斗的态度共同发展，具有舍身取义牺牲精神。

强调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思想，也是中国优良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诗经》中的“夙夜在公”，《书经·周官》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到贾谊《治安策》的“国耳忘家，公耳忘私”。都强调着一种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宋明理学家们所提倡的“义利之辨”和“理欲之辨”，在剥除其为封建专制服务的消极一面之后，可以看到其中渗透着一种为国家、为民族的公利而应当牺牲个人私欲的强烈要求。顾炎武提出的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同上，第156页。

同上，第110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所写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都表现了追求“廓然大公”的高尚境界的道德要求。

邓小平多次提到，“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所谓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一贯强调的抱负、志向的具体体现，当然，这种抱负、志向的最高目标，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邓小平强调纪律，强调的就是公而忘私的精神和民族凝聚的精神，没有纪律，就会是“一盘散沙”。邓小平多次说过，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那时的人民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当中。他断言，这种理想和纪律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邓小平关于培养“四有”人才，强调理想和纪律的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这是因为，人的素质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和目的，邓小平从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中发掘了富有生命力的内容，而且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不妨再引用杨振宁博士的一段话：“注重忠诚，注重家庭人伦关系，注重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青年。（与此相反，西方文化，尤其是当代美国文化，不幸太不看重纪律，影响了青年教育，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他认为，干科学需要四个条件，即才干、纪律、决心与经济支援，纪律与决心就包括了集体主义与理想精神。可见，弘扬中国优良的道德伦理传统，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是对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重大变革，邓小平的这一观点，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第一，承认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在这一前提下把人们的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结合起来。他说：“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因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同时，他又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第二，以鼓励“先富”为手段，以“共同富裕”为目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3页，第3卷，第318页。

同上，第167页。

《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

同上，第337页。

同上，第351页。

目的。”显然，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在伦理价值观念上与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辨”、“理欲之辨”是密切联系的，而且还反映了传统平均主义理想和现代社会主义理想的冲突。

“义利之辨”、“理欲之辨”是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孔子重义，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应无条件地服从“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另一方面，孔子也不反对求取个人利益，“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见利思义，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孔子甚至把利作为义的基础进行论述。《论语·子路》中谈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些思想都是极有意义的。但是，同样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有着重要影响的老庄则主张“无知无欲”，追求“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后世的一些儒者，如汉代董仲舒提出了“正谊而不谋其利，明道而不计其功”的命题；如宋代的程朱理学则把“存天理，天人欲”作为自己的道德纲领。这种片面抑制利欲的人生价值观和建立在小农基础上的平均主义理想交织在一起，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着消极的影响。

忽视物质利益原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征。“穷则革命富则修”，是毛泽东多次阐述的观点。1956年底至1960年初，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认为，“穷是跃进的动力”这句话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中国土改以后，农民不敢“冒尖”，以穷为荣，以富为过，这是一个好现象。1960年，他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又说，人穷好些，富了就要注意，中国富起来也容易出修正主义，这一观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多次强调，并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似乎舒适、享受、漂亮以及一切对美的追求都是资产阶级的，而安贫、粗陋、单调和恬淡寡欲才是无产阶级的象征。毛泽东对物质利益原则十分反感，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教科书中不强调政治挂帅，只是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们走向个人主义。这里，他把物质利益同个人主义等同起来加以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把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和奖金，作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大加挞伐。毛泽东否定物质利益原则，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号召人们“斗私批修”，以建立一个纯洁无瑕、无私无欲的理想社会。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中，人们不计较个人的利益，追求道德的高尚，强调身份的平等，因此，本能地要求平均主义。另一方面是表现为对抽象的、甚至是虚幻的“理”的执着。在毛泽东那里，这个“理”就是没有“资产阶级法权”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因而强化了意识形态的色彩，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陷入了精神万能、道德决定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的泥淖。给我国的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挫折。联系到毛泽东早年鄙视逐利、追求圣贤人格，主张伦理革命和对新村理想的热烈追求，由此可见毛泽东晚年的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重义轻利、崇俭黜奢的价值观的联系。

邓小平对毛泽东晚年伦理价值观的否定和对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突破，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物质利益原则符合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动机背后的经济原则是社会发展的最本原的动力，而按劳分配原则的制定正是对物质利益原则的尊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伦理价值观，在邓小平的改革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不是贫穷的认识、生产力标准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思想紧密联系。这一价值观念的提出，直接揭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中国农村的生产责任制就是建立在这一价值观念的基础之上。而且，这一价值观念又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必须重视人们的物质利益，以作为各种经济杠杆的原动力。所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也就是先富带后富价值观念的另一种表述。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是否必然要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经济杠杆与理想道德确实存在着矛盾。这里，我们应该全面地理解邓小平的伦理价值观念。重利并非轻义，主张利义的统一；先富并非两极分化，主张以共同富裕为目的。邓小平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如上所述，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极大的意义。

3. 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完善

《大学》“八条目”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是究天人之际的哲学探索，诚意正心修身是“内圣”人格的伦理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以致“外王”的政治目标。这里的哲学、伦理学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不仅仅是儒家，墨、法、道等学派中心内容也都是经邦治世之道，纵横家与兵家更是如此。可以说，正是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倾向，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其核心自然是君权至上的专制主义。孔子早就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韩非子也认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乃“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但是，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也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民众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所以，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孟子甚而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梁惠王下》）的观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还发挥了“民本”思想的积极方面，开始赋予了一定的民主主义色彩。如王夫之提出了“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读通鉴记》卷五）的观点。

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与西方政治理论的发展过程相比较，还具有“重视人伦”的特征。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宗教神学的不发达，中国文化一切以现实的人事为中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尤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社会政治等级关系往往是血缘宗法伦理关系的延伸和扩大，所谓君仁、臣忠，就是父慈、子孝不断推衍的结果。由于古代政治思想的政治与伦理的一体化，所以在政治的运行上特别强调道德教化和人治。儒家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强调“唯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所以“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第十九章》）。

邓小平是当代中国伟大的政治家。他谦虚他说自己在经济问题上是个外行，他讲经济问题，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发扬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例如，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务实作风；

以民为本，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重视道德伦理的教育，主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强调任人唯贤，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选拔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作为十分迫切的重要工作来抓等等。上述方面，既反映了邓小平的个性，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特点。

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这是对传统政治理论的重大突破。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现实人事，这是其优点。但是，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长期以来特别重视政治伦理、而忽视生产经营，这又是其缺点。“学而优则仕，士而优则学”，有泛政治化的倾向。毛泽东思想形成并成熟于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之中，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因此，革命的战略策略不能不在毛泽东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在革命胜利之后，尤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到来，党的工作重心自然应该从政治革命转向经济建设，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地指出生产建设是个中心工作，1958年又强调了要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而且，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然而，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运动，却置经济规律于不顾，采用了政治运动的手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理论加以误解并教条化、绝对化，政治更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一切价值取向的根本，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四人帮”则到了把革命和生产加以对立的荒谬地步，形而上学猖獗。所以，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并没有转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也不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紧紧扭住这个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把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我们工作得失的标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突破了中国传统以政治为本的治国理论，使政治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推动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邓小平强调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对传统政治理论的重要发展。中国社会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法家从治民之法、役臣之术、居君之势等角度具体论述君主专制的条件；儒家的礼也在于维持封建的等级制度，毛泽东十分注意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特别重视传统的重民思想。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是他毕生的执着追求。1945年7月，他在对黄炎培的谈话中说过，共产党能够摆脱中国历史上政治兴衰治乱的周期律，这就是我们找到了民主的方法。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结合于中国实际，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发挥一切积极因素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名的政治理论著作。1957年7月，他还提出了“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民主建设目标，这一思想为邓小平以后所反复强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4页。

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夏季的形势》。

调。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民主的也就是大众的。以后又说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那么，民主就与群众运动相同，尤其是毛泽东晚年，热衷于发动骤风暴雨的“大民主”运动，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灾难。另一方面，毛泽东片面地强调集中。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组织的高度集中是必要的。建国以后，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应该向进一步的民主化发展。但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越来越严重，也更加强调中央集权。在他的晚年，家长制和个人崇拜更是严重地发展，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

邓小平历来重视民主建设。1941年4月，邓小平所写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是一篇值得重视的论述民主政治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是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反映在共产党内、党员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党政关系；文章指出，三三制的政权形式，必然产生民主政治斗争，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所以这种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年5月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时候，没有采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提法，而是引用了张闻天《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一文的提法，多了一个“民主的”。张闻天在该文中说：“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集中地谈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更是积极倡导民主，把民主看成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建国30周年的讲话中，把高度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的要求，并对封建主义残余进行了猛烈抨击。邓小平认为，民主政治的建设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1986年他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中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对传统政治理论的重要完善。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最大之辨是礼法之辨，儒家主张礼治、重道德教化，法家主张法治、重严刑峻法。其实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其基本精神仍在于人治。法家的“法治”并不等同于现代法治精神，君主的个人意志可以置于法律之上，以吏为师，只重刑法而轻视民法。中国古代政治一般是王霸并用、礼法并施而以礼统法。这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的，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8—21页。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因此以道德伦理为其本位。它要求当权者不仅要有高高在上的威势，而且还要具有伦理的人格魅力。如果说重视民心、注重道德教化、严于律己、执法严明等等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的精华，那么，一味重视人治就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违背。尤其是在人治基础上产生的封建特权观念与宗法观念相结合，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民主建设。

毛泽东多次强调宪法与法治意义，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但是，他对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视是不够的。尤其是在他的晚年，欣赏个人迷信，追求君师合一的圣人人格，期望通过自己的号召力，来最广泛地发动群众，进行翻天覆地的“革命”。其结果践踏了民主。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此，他主张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克服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也就是法制化，因此，他特别重视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对建国以来政治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毛泽东民主观的最重要的补充，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理论得到了新的完善。

4. 邓小平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飞跃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道德置于首位。但这并不等于说无视经济的存在。其实，在春秋之际，当时的社会仍主三事并重。《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晋国郤缺言：“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所记齐国晏婴之言：“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这里的正德是提高品德，利用是便利器用，厚生是丰足生活。除“三事”之外，又有“三不朽”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鲁叔孙豹言，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其中“立功”，旧注以“禹、稷”当之，禹疏导江河，“后稷作稼”，可见也重视物质生活。春秋末年，以儒家学说为主，强化了道德的意义。但是，经济毕竟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众多的思想家在论述伦理和政治问题时，也不能不正视经济问题。所谓“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而不能自持也”（《商君书·农战》）。但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几乎都强调“农本商末”，主张“令民归心于农”，实行崇本抑末，务农重谷的政策。尤其是法家，他们“一民于农战”的政策，对工商业的抑制到了近乎扼杀的程度。

以农为本，崇本抑末的思想，是以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反映。在中国古代，农业的稳定确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稳定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但是，正因为这一思想带有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所具有的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特点，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经济成份开始

有所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时，其消极作用就至为明显。

中国古代也有少数重视工商业发展的思想家，如西汉桑弘羊提出“富国何必用本农”（《盐铁论·力耕》），主张本末并利。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市民阶层人数渐多，一些思想家对商人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例如王阳明在1525年为商人方麟（节庵）所写的一篇墓表中认为，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以后，黄宗羲更提出：“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明夷待访录·财计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受到外来的强烈刺激，大多数先进的思想界都主张农工商皆本，孙中山还提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宏伟计划；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甚至主张“以商立国”。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新变化。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就向全党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毛泽东提出工业化的发展方向，这是在现代条件下，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建国以后，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他还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适合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他指出了前苏联重工业建设中牺牲农民利益的重大弊端，在1956年所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了工农业并举，从而确立了“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这里还应当提到毛泽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设想。1956年12月间，针对当时出现的“地下工厂”和“地下商店”的现象，毛泽东在同工商联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质还不足。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10年、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20年、100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样定息也有出路。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的赞同。上述设想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也是一个大胆设想，并给以后的中国改革以一定的启发。邓小平后来在谈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也认为可能是比较好的思路。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并没有实施。他很快又被“大跃进”的设想所激动，试图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去推进经济的跃进，以改变生产关系的方式，例如，以纯而又纯、“一大二公”的体制去促进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经济的政治化。其误区还在于他把马克思关于计划经济的设想绝对化、教条化。马克思曾设想未来社会将有计划地组织全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列宁在1906年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对立的两种社会基本制度来看待。但是，以后经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列宁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主张“采取市场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

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351页。

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的经济形式”以实现国家经济计划。但是在列宁逝世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又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不自觉地揉进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以商为末的观念，轻视价值规律，抑制商品经济，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以至于“人民公社”制度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五七工厂”等等，几乎都带有强烈的自给自足倾向，有的就是放大的“小农经济”，造成条块分割的经济格局。更不能正确地认识参加国际分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邓小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次重大飞跃，市场经济思想是建立在重视商品和商品经济前提之上的。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是加入流通过程的产品，也就是进入市场交换的产品。支配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首先在市场交换中发生作用，并且通过调节市场和流通来调节生产，实现资源的配置和流动。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展开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就是充分吸取了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依靠日益发达的市场竞争机制促进经济繁荣的经验。邓小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理论勇气和魄力。这不仅摆脱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根深蒂固的鄙视商品生产的自然经济观念的束缚，还冲破了关于姓“社”姓“资”的长期困扰。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为全党所接受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重大飞跃，由于这一思想在邓小平的整个理论体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它还同时要求哲学思想、伦理观念和政治理论的一系列变革，如前所述，生产力标准的思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念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提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5. 邓小平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源远流长。根据考古发现，在远古时期，例如龙山文化时期，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的范围内，多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点，正是这种文化的共同点，形成了以后夏、商、周三代时期的统一国家的基础。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包容性。《谷梁传·僖公四年》中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是多元的。除中原文化以外，尚有东夷文化、三苗文化、戎羌文化、北狄文化、百越文化等等，这些文化相互交融、认同，凝聚成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任何外来强大的势力只能侵占或征服它的土地，却难以征服这个民族的文化与人心。

中华民族所具有的这种强烈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基础，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关心社稷生民、维护民族独立，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从屈原在《离骚》表现对于楚国存亡的强烈的责任感；到顾炎武高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成为爱国主义的主导精神。

民族主义的思想还强烈地反映在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问题上。春秋时期，王纲解纽、诸侯力征，周边小国侵扰内地问鼎中原。于是，“尊王攘夷”、“夷夏之辨”的思想开始在中原姬姓诸侯国中盛行。每当民族矛盾尖锐之际，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向来不主张对外进攻，崇尚和平。《尚书·尧典》讲“协和万邦”，《孙子兵法》也认为用兵打仗是不得已之事。史载汉宣帝时，匈奴内部大乱，汉王朝并不乘人之危，而是“辅其微弱，救其灾患”（《汉书·萧望之传》）。在民族政策上，唐太宗制定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资治通鉴》卷193）的政策，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

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是中华民族意识及其精神的具体体现。如前所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有多方面的内容。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集中体现在《易传》的两个命题上：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者主张刚健有为，强调民族的独立性、主体性和主动性；后者表述了以宽厚之德包含万物的精神，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不仅主张天人之间、人际之间或者个体心理和精神的和谐、平和，在国与国之间也主张修好和睦、和平共处，讲究以“礼”来调节，“礼之用，和为贵”。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大批的共产党人正是从民族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并在新的基础上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联结起来，克服了盲目排外、愚忠思想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使民族主义得到了提升。毛泽东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和能力。在抗日战争中，他正确地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了侵略者。建国以后，他自豪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以后又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要有较大的贡献。在国际交往中，他顶住了外国的压力，维持了民族的尊严，尤其是制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局面。当然，出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同时国际形势仍处于二战后的冷战阶段、中苏矛盾的激化，从而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不可避免，因此，毛泽东总是较多地从矛盾对立冲突的角度去处理民族统一问题、制定国际外交战略。例如，1963年以后他曾多次批评所谓“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些，对反动派和气一些，对修正主义和气一些，对亚非拉人民的援助少一些）的国际外交政策，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国际纲领。

邓小平既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是一爱国主义者。他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多次强调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尊心和自信力，他从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坚定不移地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邓小平的贡献在于，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代国际的新特点、新形势，果断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提出了以“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民族统一大业的新构想。“和平发展”新主题与“一国两制”新构想是紧密相联的，后者正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邓小平说，“一国两制”新构想可以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解决国内问题中的运用；另一方面，这一新构想对于解决国际争端

也具有重要意义，有些地方可以采用“一国两制”的方法，有的地方还可以采用“共同开发”的方法。

显然，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正是前述主张整体、和谐和开放的思维特征在民族观上的反映；从而又弘扬了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刚健有为的民族主体性意识和厚德载物的民族宽阔的胸怀。当然，邓小平对传统民族主义的弘扬决不是简单的重复，传统民族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封闭的社会基础之上的，追求的是一种静态的和谐；邓小平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开放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强调的是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全民族团结一致，积极开展对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竞争，以振兴中华民族。所以说，邓小平关于国际战略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是传统民族主义的发展。

6. 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以上论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五个方面的意义。应该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是全方位的，它是中华民族思维走向现代的集中体现。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江泽民说：“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使这一理论深入到广大民众之中，其意义也就是使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观念、新思维，进一步在广大民众中达成共识，成为中华民族的新传统。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说过，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毛泽东都提供了一个基础。正如我们在文中所多次强调的，邓小平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首先就表现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其核心是紧紧抓住了“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还全面继续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及其实践。其中还包括毛泽东自己没有实行过的好的设想。邓小平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因此，割裂与毛泽东思想的联系，就无法真正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旧的思维定式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消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也经过了风风雨雨的涤荡。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前，面对突变的国际风云，面对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震荡和利益冲突。有

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1月24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人连篇累牍地撰文，实际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推动“毛泽东热”的名义上，肯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到“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理论”中寻找理论根据，提出反和平演变要从经济这个根反起。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尖锐地指出：“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旧的生活方式也制约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改革是深入到社会生活每一层面的革命，不可能不存在着问题、失误和困境。中国改革的深入，面临着人的素质严重滞后的问题。邓小平曾强调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应该看到，当前我国民族的整体素质并不高，居民的文化程度构成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目前的中国社会，奢侈之风、迷信、赌博、无度消费、陋巷文化消费等司空见惯；政府官员的腐败和社会上经济犯罪，都已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1989年，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就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

所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破除旧的思维定式和生活方式的消极影响，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促使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现代化，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

当代的世界进入了跨世纪的历史时期，发达的西方各国和处于现代化过程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时代的选择。人类文化发展的演进规律揭示了创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已论证了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变革的趋势。我们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必须学习邓小平实事求是的胸怀和胆略，不拘泥于本本，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有创新的精神，同时把继承传统的优秀文化和借鉴国外的文明成果结合起来，使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得到完善、丰富以至于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正如江泽民所说的：“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同上，第15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0页。

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1月24日。

后 记

本书被列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组织完成。

本书是在我们参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开始构思的，实际撰写时间也将近两年。其间，院长王凤贤研究员始终关心着我们的课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谢宝森研究员、方民生研究员、谷迎春研究员也予以指导和帮助，杨金荣副研究员参加了本书的讨论，郭浴阳和戴亮等同志，也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支持。

本书由丁晓强、卢敦基具体设计；丁晓强撰写了绪论，第一、三、八、九章，第十章第三节，结语；汪俊昌撰写了第二、七章；周海文撰写了第四章第一、二节，第十二、十二章；卢敦基撰写了第四章第三节，第十四章；解力平撰写了第五、六章；王光银撰写了第十章第一、二节；章晶撰写了第十一章；全书由丁晓强统稿。

本书属开拓之作，难点也颇多。我们在研究中尽了努力，自觉有些新意，然一定存在不少的缺点，有许多内容可以进一步琢磨。也着抛砖引玉的态度，敬请专家学者批评，并希望看到有更好的作品问世。

本书参考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这里就不一一注明了。

作 者

1994年11月于杭州马腾路

